

「2024 寫高雄－屬於你我的高雄歷史」

出版及文史調查獎助計畫

研究成果報告書

計畫案名

日治時期高雄州立屏東高等女學校的學生調查：

以日治時期學籍簿為中心

執行單位

蔡蕙頻

結案日期

2025 年 12 月

（研究成果報告書僅供參考，未經作者同意請勿引用）

日治時期高雄州立屏東高等女學校的學生調查：

以日治時期學籍簿為中心

摘要.....	1
一、前言.....	2
二、日治時期臺灣女子教育：以高等女學校為中心.....	5
(一) 日治時期臺灣女子中等教育與高等女學校	
(二) 屏東高女成立始末	
三、屏東高女日治時期學籍簿典藏情形.....	12
(一) 日治時期屏東高女的學籍登錄管理	
(二) 學籍簿典藏情形	
(三) 學籍資料著錄情形	
四、屏東高女學生背景分析：以學籍簿為中心.....	26
(一) 民族	
(二) 本籍	
(三) 出生地	
(四) 居住地	
(五) 家庭背景/家長職業	
五、屏東高女與在地社會的連結.....	51
(一) 屏東高女與屏東地區臺人社會	
(二) 屏東高女與屏東地區日人社會	
六、高女教育對個人生涯之影響.....	68
七、結論.....	74
徵引書目.....	77

摘要

本文旨在透過屏東女中所典藏的日治時期學籍簿來勾勒屏東高女的學生組成，並嘗試進一步說明該校學生與地方社會之間的關係。

經由本文的分析可知，屏東高女的日籍學生每屆皆約占三分之二，臺籍學生佔三分之一，臺籍學生多數是屏東本地出身，而日籍學生本籍則以九州地區最多，但其多數是在臺出生的灣生，且居住於屏東地區，落實屏東高女為屏東地區子弟提供教育管道的使命。

此外，無論臺籍或日籍，她們絕大多數來自地方上層社會家庭，日籍家長的職業以擔任官公吏或受雇於民間會社者為多，臺籍家長從商或具地主身分者比例較高為特色，不過後期擔任公職的比率攀升，特別是擔任教職者，顯示具近代教育經驗的家長比率增加之後，以其學歷從事教職等公職成為臺人社會的趨勢。

最後，本文試圖從學生的出身來說明屏東高女與在地社會的關係。臺籍學生不乏出身地方大家族者，她們的家長多半自身即擁有近代教育的經驗與學歷，並藉以謀得社會地位與收入均佳的職業，或是獲得人脈等資源，因此他們對於子女的教育採取樂見其成的支持態度。

此外，屏東高女的學歷也為就學者個人的人生帶來重要的影響，這類影響可分三類說明。首先，部分的學生選擇在畢業後繼續升學，無論是就讀同校補習科，或是至臺灣其他地區求學，甚至負笈日本本國就學，屏東高女的經驗與學歷都是她們向上求學的重要基石。

其次，由於日治時期臺灣女性的就學率不高，就學管道也有限，高女學歷在臺灣已相當亮眼，即使學生畢業後未選擇繼續升學，無論是選擇就業或結婚，屏東高女的畢業證書也是她們可運用的資源，經統計，歷屆畢業生中，超過三分之一進入公家機關服務，且其中選擇執教鞭、進入小公學校任教者高達近八成，比率極高。

第三，屏東高女的求學經驗也為學生提供了自我能力探索的環境。部分學生在學期間盡情發展自己的興趣，養成特定能力，畢業後仍持續耕耘，假以時日不但在達成個人的自我成就，其影響力甚至擴及地方社會，直到戰後仍持續在教育或政治等領域有所貢獻。

關鍵詞：屏東高女、屏東女中、學籍簿

一、前言

日治時期臺灣共計成立 23 所公私立高等女學校（以下簡稱高女），其中，在高雄州下便有高雄高女及屏東高女。然而，同樣作為戰前大高雄地區培育女子菁英的學校，相較於高雄高女的校史、校地已有多篇相關研究問世，屏東高女的校史似乎相對受到人們的注意較少，還有極大的空間值得我們進一步探究。諸如，在地理位置上，屏東高女雖然不是當時日本帝國最南端的高女（位於地理位置最南端的高女是高雄高女），但它亦非如蘭陽高女這般，雖與臺北州其它高女同屬一州，卻因山脈阻隔、地理空間獨立而必須獨立設校，也不像花蓮港高女、臺東高女或澎湖高女為該行政區唯一一所高女。屏東平原與高雄市區之間並無山脈屏障，嚴格說起來，屏東高女與高雄高女的距離相隔也不算遙遠，為什麼要在高雄高女之外，於 1932 年在屏東另設屏東高女？該校的創校始末如何？而屏東高女的學生又是哪些人？她們來自哪裡？這所高女和屏東在地社會有什麼聯結？臺、日人學生之間是否存在差異？這些疑問都一一待解。

所幸上述問題能在今日得到解答。屏東高女自 1932 年創校以來，每年辦理招生及入學，是高屏地區最重要的女子學校之一。該校在戰後改制為國立屏東女中後，校方仍保存日治時期各屆學生的學籍簿，學籍簿集結了謄錄每一屆學生個人基本資料的學籍資料卡（以下簡稱學籍卡），該生在校期間成績、身高體重、學生性格、個人表現等，也都詳列在學籍卡上，因此學籍簿可說是研究在校學生身分背景最重要的史料。作為校史研究的一部分，本研究擬從學籍簿著手，解析屏東高女學生的特色，作為未來延伸研究之基礎。至於教職員、教學情形與校園生活等面向，則留待未來另行探究。

有關日治時期女子教育的研究成果，概可從「女子教育政策及推行情形」、「各校校史之爬梳與研究」，以及「對臺灣與地方社會的影響」等三方面分述。女子教育政策及推行情形方面，游鑑明《日據時代臺灣的女子教育》堪稱是最重要的經典之作。其研究從三個面向切入，第一是女子教育政策，爬梳女子教育政策從建立、變遷到大致定調的歷程，並說明政策落實後的實務；第二是社會對女子教育的反應，早期眾人多懷有女子無才便是德的觀念，對女子教育不甚重視，後來才漸漸轉為支持，態度轉趨積極；第三是以女學生為主體，探究其校園生活、畢業後的動向與社會參與。游鑑明指出，日治時期透過女子教育體系，塑造了一批與往時不同的新女性，但是整體而言，接受近代教育的女性人數仍少，且臺、

日人之間仍存在差異，女子教育仍有其侷限。¹

游鑑明之研究為讀者勾勒出日治時期女子教育的基礎面貌，全面性地討論從教育政策到教育實務，再到社會變遷的脈絡，是本文極為重要的核心參考資料。而游氏長期對近代中國及日治時期臺灣女子教育、職業婦女及重要人物等女性史議題投注心力，可視為其對女子教育的延伸關懷，無論是口述歷史或學術研究，成果均稱豐碩。

此外，山本禮子對日治時期臺灣高女所做的研究也具有高度參考價值。她在《植民地台湾の高等女学校研究》中，先闡述了日治時期臺灣女子中等教育的變遷，再分析臺灣人就讀的女子高等普通學校及專收在臺日人的高女的辦學情形、學生就學狀況，以及畢業生的動向。她接著再進一步聚焦，分別以臺北第三高女、臺北第一高女和臺北第四高女為例，具體爬梳作為兩個不同民族女子教育的頂尖學校是如何運作的，以及作為殖民最末期成立的高女，相較於其他學校的特殊性。最可貴的是，山本禮子試圖透過解讀她對畢業生所進行的口述訪談，來呈現高女的校園生活，並留意學校教育對臺灣社會的影響。作為全書的末章，她以靜修高女為例，說明越接近戰爭動員的殖民末期，基督教學校對於殖民當局所面對的衝突與妥協。⁴相較於游鑑明的研究，山本禮子的研究更加關注民族之間的差別，深入地觸及日籍學生的校園生活及其回憶。不過，作為臺灣高女的全面性研究，山本禮子並未特別關注同樣以臺籍或日籍學生為多的高女，彼此之間細微的差別，也未特別關照屏東高女的情形，有關高女之研究仍有發揮的空間。

卓姿均同樣從女子教育政策出發，討論一九二〇年代前後高女之設置，她認為歷經兩次〈臺灣教育令〉修正、日臺共學等政策轉變，高女的設置在 1924 年達到高峰後進入停滯狀態，直到 1937 年才又再度迎來下一次高峰，並以臺北第三高女、新竹高女與蘭陽高女等三所學校為例，說明政策與地方社會對高女設置的影響。⁵

至於有關各校校史之爬梳與研究。整體而言，此類研究大約有兩種不同的情況，一種是 2000 年以後臺灣文史系所大量出現，或是在重視鄉土、強調本土教育的思維下，學院內的歷史學系研究生以高中、女中、或國小等地方上的學校作為研究對象，這類整理各校校史而撰成的碩士論文數量龐大，有些改寫、出版為

¹ 游鑑明，〈日據時代臺灣的女子教育〉，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87 年。

⁴ 山本禮子，《植民地台湾の高等女学校研究》（東京：多賀出版，1999 年）。

⁵ 卓姿均，〈日治時期臺灣高等女學校之設置〉，《臺北文獻（直字）》，204 期（2018 年 6 月），頁 103-145。

專書，有些學校則由該校對校史懷抱熱忱，或具歷史學專業訓練的教師編寫成校史，如高雄高女、北一女中均出版有相關研究。⁶

另一種則是由於一九八〇年代以來，鄉土意識崛起，終於使得戰後長期堅實不移的「反日」思維在一九九〇年代以後出現鬆動，⁷全臺各地，從小學到大學，都有日籍校友帶著思念的愁緒回到曾經在此就讀過的母校。解嚴後日漸重視臺灣史的時代潮流，以及日籍校友的來訪，皆促成這些歷史悠久的老校開始回顧自己的歷史，他們除了將校史的起點由 1945 年向前推移至日治時期的創校年代之外，也逐一盤點那些過往校園曾有過的人事物並加以記錄。這些成果，在學校創校逢 80、90 等重要整數周年校慶時被集結為一本本的紀念專刊，若是 100 周年校慶，則更是值得大書特書，出版以茲紀念與慶祝。因此，無論是公立或私立學校，以十年為單位的周年校慶出版品琳瑯滿目，不勝枚舉。例如，前身是臺北州立第一及第三高女的臺北市北一女中、中山女高，校史悠久且不乏頭角崢嶸的校友，不少人日後成為政商名流的夫人，或是本身就是各領域的成功人士，因此無論是校史或特定人物的相關研究，均在所有高女中堪稱最亮眼豐富，⁸除了屏東高女之外，其他像是彰化高女、⁹嘉義高女、¹⁰臺南高女、¹¹蘭陽女中¹²，以及私立的淡水高女¹³，也都有相關的研究。

⁶ 如曾任高雄女中教師的許聖迪撰寫《帝國最南—高雄高等女學校》、北一女中歷史科教師蔡蔚群所撰的《追尋北一：台北第一高女的光與影》等。許聖迪，《帝國最南—高雄高等女學校》（高雄：行政法人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2017 年）。蔡蔚群，《追尋北一：台北第一高女的光與影》（臺北：蔚城，2025 年 4 月）。

⁷ 林初梅，〈臺灣鄉土教育思潮中的「日本」：鄉土教材及教科書如何詮釋「日本統治下的臺灣」？〉，《臺灣學誌》，2 期（2010 年 10 月），頁 108-109。

⁸ 人物的部分，如津田勤子記錄三高女畢業生陳勤的校園回憶，或是中研院臺史所對裁縫名家施素筠的口述歷史等。津田勤子，〈一位「新女性」的夢想與糾葛—以三高女校友陳勤的生命故事與文藝作品為中心(1922~2017)〉，《臺北文獻（直字）》，204 期（2018 年 6 月），頁 147-185。許雪姬、吳美慧，《一輩子針線—一甲子教學：施素筠女士訪問紀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14 年）。

⁹ 李昭容，〈彰化高女：日治時期中臺灣臺籍女性菁英的搖籃(1919~1945)〉，《臺灣文獻》，72 卷 3 期（2021 年 9 月），頁 193-236。

¹⁰ 蔡元隆、陳佳慧，〈日治時期嘉義中學校與嘉義高等女學校校歌、校徽的符號意象及其教育意涵之分析〉，《新生學報》，24 期（2022 年 3 月），頁 93-110。黃文榮，〈日治時代嘉義高等女學校初探〉，《嘉義市文獻》，21 期（2012 年 7 月），頁 33-70。黃文榮、蘇佩儀、葉羿玟、何明明、吳宛蔡、黃巧蓓，〈戰後嘉義女中的發展(1945~1974)〉，《嘉義市文獻》，24 期（2016 年 3 月），頁 195-219。

¹¹ 如：鄭莘蓓，〈日治時期臺灣女子的中等教育—以臺南高等女學校為例〉，國立嘉義大學應用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22 年。

¹² 陳昱芯，〈蘭陽女中之校史與校友生命史(1938-1968)〉，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2017 年。

¹³ 張至琦、向薇潔、呂明秀，〈日本時代的淡水中學校與淡水高等女學校—純德女籃發展之歷史〉，《高應科大體育》，4 期（2005 年 9 月），頁 36-53。姚聰榮主編，《淡江中學校史》，（臺

研究者整理出各校的發展梗概後，陸續將研究焦點轉向高女所實施的課程、學校建築、制服等議題，像是蔡雅薇分析高女學生制服的特色，¹⁴蘇信宇與蘇嘉惠則同樣注意到學校建築，前者關心全臺灣的中學校與高女的建築物，¹⁵後者則將焦點落在臺北州轄下的高女建築上。¹⁶課程方面，許峰瑞討論 1922 年至 1945 年之間臺灣高女的圖畫教育，¹⁷瀧澤佳奈枝以臺北第三高女為例，關注臺灣的女子技藝教育，¹⁸陳建森著重臺東高女對臺東地區軟式網球的推動，¹⁹林玫君、²⁰金湘斌²¹等人則長期關心女子體育的情形。這些研究雖然都非以屏東高女作取材對象，但皆能使我們更加深入地認識高女校園生活。

最後，有關女子教育對高女畢業生本人及家庭、地方社會所帶來的影響，前述有關訪談高女畢業生的口述歷史裡，在校接受的教育如何成為個人往後人生經歷的養分，往往是訪談的重點之一，而畢業生們多半也會述及在校期間教師在學問之外，對女學生教養的要求養成自己良好的生活習慣，特別是在學校的校史出版品，這樣的說法處處可見，不勝枚舉。

而洪郁如《近代臺灣女性史》則從宏觀的角度對女子教育的影響提出解答。洪郁如先談到日治時期女子教育的趨勢演變，她援引駒込武的觀點，認為日治時期統治者基於警戒臺灣人與中國革命之間的連結而採取「協力運作主義」，將臺人士紳納入體制內，教育即為其中一環；女子教育最初以技藝教育與國語教育為主，但隨著臺灣士紳對教育的期待不斷提高，官方也必須重視女子教育的需求，

北：臺北縣私立淡江中學，1997 年）。李建嶠總編輯，《國立彰化女中九十週年校慶特刊》（彰化：國立彰化女子高級中學，2009 年）。

¹⁴ 蔡雅薇，〈日治時期臺灣高等女學校的制服〉，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8 年。

¹⁵ 蘇信宇，〈臺灣日治時期中學校與高等女學校建築之研究〉，國立成功大學建築學系碩士論文，2000 年。

¹⁶ 蘇嘉惠，〈日治時期臺北州立高等女學校建築初探〉，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建築系碩士論文，2017 年。

¹⁷ 許峰瑞，〈1922 年至 1945 年臺灣高等女學校圖畫教育研究〉，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藝術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0 年。

¹⁸ 瀧澤佳奈枝，〈日治時期臺灣的技藝教育—以臺北第三高等女學校為中心〉，淡江大學日本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 年。瀧澤佳奈枝，〈植民地臺灣における技芸教育—臺北第三高等女学校を中心に〉，《臺灣教育史研究會通訊》，40 號（2005 年 9 月），頁 20-27。瀧澤佳奈枝，〈植民地期臺灣における「女性像」の形成—第三高等女学校における技芸教育からの一考察〉，《臺灣教育史研究會通訊》，30 號（2003 年 12 月），頁 2-9。

¹⁹ 陳建森，〈臺東高女三女將與臺東女子軟式網球運動(1940~1961)〉，《臺東大學體育學報》，16 期（2012 年 6 月），頁 21-38。

²⁰ 林玫君，〈日治時期的臺灣高等女學校學生與臨海教育〉，《師大臺灣史學報》，11 期（2018 年 12 月），頁 55-97。

²¹ 金湘斌、張文威，〈天然足世代的興起：臺灣女子體育運動的歷史新頁(1915~1928 年)〉，《體育學報》50 卷 4 期（2017 年 12 月），頁 469-486。

增加女子中等教育的空間，但在課程上逐漸降低技藝導向的課程，轉而提高普通教育的教學內容。1919 年〈臺灣教育令〉實施以後，普通課程與技藝課程的比例逆轉，養成臺灣女子的「國民性格」成為教育重點，1922 年修正〈臺灣教育令〉之後，這個教育重點更加強固。要言之，洪郁如認為，透過高女等學校選拔制度，接受近代教育的「新女性」階層於焉誕生，她們通常出身經濟條件較佳的家庭，屬於在地上級階層，再加上學歷取代了纏足成為女性的文化資本，她們在臺灣共構出一個上層階級、近代文明與帶有日本色彩所交織而成的「高女文化」。²²這是對高女中的臺灣人學生所做出的宏觀觀察，那麼，在臺日人呢？她們是否也有同樣的現象？再者，這樣的觀點是否能夠運用在日治中期以後開校的屏東高女之上？本研究即在這些研究之上，以屏東高女的學籍簿為研究對象提出實證的觀察。

最後，本文欲將焦點往南移動，特別注意同樣位於高雄州境內的高女。許聖迪《帝國最南—高雄高等女學校》以高雄高女為研究對象，曾任高雄高女教師，自言「礙於生理因素一輩子無法成為雄女人，但自許有一天可以成為被崇拜的傲嬌紫槓雄女魂」²³的許聖迪，憑恃著其對該校的熱情，娓娓道來高雄高女的入學考試、師生、校園活動乃至於戰時下的校園生活，讓我們一窺日治時期二十餘年之間，這所高女如何屹立在帝國最南端。²⁴除此之外，許聖迪也先後撰有多篇以高雄高女為主題的學術論文，²⁵《帝國最南—高雄高等女學校》一書，可說是他多篇研究之及大成。

相對於高雄高女，當我們想要進一步探究屏東高女的歷史時，卻意外發現，不僅學界似乎未有以此為主題的研究，屏東女中也未曾出版任何校慶專刊或任何述及校史之正式出版品，更令人詫異的是，有別於戰前創校的各所高中網站至少揭露創校年代或歷任校長，屏東高女的網頁資訊上，即使是對該校日治時期的校史也未有隻字述及，創校年代、日治時期歷任校長等基礎資訊均付之闕如。²⁶本研究作為屏東高女研究的起點，並將以本研究為基礎，未來陸續進行屏東高女的其他延伸研究，期使日治時期臺灣女子教育的面貌更為豐富。

²² 洪郁如，〈「新女性」的誕生〉，《近代臺灣女性史：日治時期新女性的誕生》（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7 年），頁 139-201。

²³ 許聖迪，《帝國最南—高雄高等女學校》，封面內摺頁。

²⁴ 許聖迪，《帝國最南—高雄高等女學校》。

²⁵ 許聖迪，〈老照片看地景—日本時代高雄州立高雄高等女學校的校園景觀〉，《高雄文獻》，2 卷 4 期（2012 年 12 月），頁 145-153。許聖迪，〈從哈瑪星到苓雅寮：高雄高等女學校校地變遷與寄宿舍〉，《高雄文獻》，6 卷 3 期（2016 年 12 月），頁 39-59。

²⁶ 參見國立屏東女中網站 <https://www.ptgsh.ptc.edu.tw/home>，瀏覽日期：2024 年 3 月 21 日。該校網站並無校史專頁，「關於屏女／本校簡介」的頁籤之下，有關校史的資訊僅有「歷任校長」，並從戰後開始計算。

二、日治時期臺灣女子教育：以高等女學校為中心

(一)日治時期臺灣女子中等教育與高等女學校

日治時期統治者對在臺日人、漢人及原住民族的統治態度與教育目標不同，原住民族教育自始自終都自成獨立系統，無論在教學目標、修業年限、教材與教師選任等制度上，均與在臺日人及漢人不同，無法同一而論，因此本文所敘述的女子中等教育暫且略過原住民族的部分。

至於在臺日人與臺人的女子教育，在 1922 年第二次〈臺灣教育令〉發布前分屬不同系統。臺人女子教育部分，殖民政府來到臺灣後，很快地就意識到女子教育的重要性，當局在 1897 年於士林成立「國語學校第一附屬學校女子分教場」招收臺籍女學童，進行日語與手藝教育，這裡即是日治以後殖民體制內女子教育的起點。1902 年，它改制為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第二附屬學校，1910 年再改為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附屬女學校。²⁷這所學校雖然是一所初等教育機構，但由於日治初期女子受教育的觀念仍未扎根，女子教育需求不高，學生缺席率或退學的情形明顯。後來，因教育現場對女教師的需求，女子分教場的學生畢業後隨即被延聘為教師，女子教育的需求亦隨之大增。然而臺灣卻無相應的教育，直到 1919 年為止，專供臺灣人女性就讀的學校僅此一所。²⁸

1919 年，當局發布〈臺灣教育令〉，設置女子高等普通學校，將臺人就讀的國語學校附屬女學校改制為臺灣公立臺北女子高等普通學校，並新設臺灣公立彰化女子高等普通學校，臺籍女性終於有了另一所學校可升學了。兩校除了設有修業三年的實科之外，還設有修業一年的師範科以培養臺籍女性師資。1921 年，當局修正〈臺灣公立女子高等普通學校官制〉（勅令 135 號），將高等普通學校全數交由各州移管，此時公立女子高等普通學校改為州立，並新設臺南州立臺南女子高等普通學校。

另一方面，日治以來，在臺日人女性同樣缺乏小學校畢業後的升學空間，有意升學者只能返回日本本國，因此當局從 1904 年在臺北第二小學校設置女子補習科開始，進而頒行〈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第三附屬學校規程〉（府令 67 號），明定該校「以內地人女子施以高等普通教育為目的」，逐步發展在臺日人的女子教育，直到 1908 年臺灣總督府發布〈臺灣總督府高等女學校官制〉（勅

²⁷ 鍾清漢，〈日本植民地下における台湾教育史〉（東京：多賀出版，1993 年），頁 122。

²⁸ 鍾清漢，〈日本植民地下における台湾教育史〉，頁 165。

令 47 號)，成立招收日籍女性的高女，但修業年限較日本本國高女短。²⁹1917 年又另外在臺南成立臺南高女，從此臺北、臺南各有一所提供給在臺日人女性就學的官立教育機構。³⁰

1922 年，第二次〈臺灣教育令〉發布，本於臺日共學的精神，再度調整中等教育制度，並將各地的女子高等普通學校變更為高女，另設修業一年的講習科，延續其師培功能。在臺日人部分，1921 年廢除〈臺灣總督府高等女學校官制〉，改行〈臺灣公立高等女學校官制〉（府令 129 號），並發布〈臺灣公立高等女學校規則〉（府令 88 號）改制或新設高女，並設有補習科。綜合過去分別招收臺、日人的女子教育機構，1922 年改制的當下，臺北有第一、第二、第三高女（原臺人就讀的臺北州立臺北女子高等普通學校）、臺中高女、彰化高女（原臺人就讀的臺中州立彰化女子高等普通學校）、臺南第一、第二高女（原臺人就讀的臺南州立臺南女子高等普通學校）。³¹過去臺、日人各自依循不同女子教育體系，從此合而為一，高女制度可說是大致底定，接下來各州是各地的需求由州廳成立高女，直至 1945 年日治時期結束為止，臺灣各地總共成立 20 所公立高女，及淡水、靜修、長榮等 3 所私立高女。

此外，1919 年以前，國語學校附屬女學校規劃設置師範科、師範速成科及技藝科，但前二者實際上並未實施，因此由技藝科畢業生加以補充相當的教育後權充公學校女教員。³²1919 年，該校改制為臺北女子高等普通學校後新設師範科，繼續肩負育成公學校女教師的任務。³³

1922 年臺、日籍學生的女子教育體系整合後，由女子高等普通學校改制而來的臺北第三高女及彰化高女則附設講習科，以培養公學校女教員；³⁴臺北第一高女及臺南第一高女則在 1923 年設有修業年限一年的補習科，培育小學校女教員，³⁵其後進一步明定兩校在校期間若曾在選擇科目（選修）中修習教育課程的畢業生，通過成績考查後，可依無試驗檢定取得尋常小學校本科正教員或

²⁹ 鍾清漢，《日本植民地下における台湾教育史》，頁 102。

³⁰ 加藤春城，《臺灣教育沿革誌》（臺北：臺灣教育會，1939 年），頁 815-820。

³¹ 加藤春城，《臺灣教育沿革誌》，頁 842-870。

³² 臺灣總督府內務局學務課，《臺灣總督府學事第十七年報統計書》（臺北：臺灣總督府內務局學務課，1934 年 5 月），頁 23。

³³ 臺灣總督府內務局學務課，《臺灣總督府學事第十八年報統計書》（臺北：臺灣總督府內務局學務課，1921 年 7 月），頁 30。

³⁴ 臺灣總督府內務局文教課，《臺灣總督府學事第二十一年報》（臺北：臺灣總督府內務局文教課，1925 年 3 月），頁 28。

³⁵ 臺灣總督府內務局文教課，《臺灣總督府學事第二十二年報》（臺北：臺灣總督府內務局文教課，1926 年 2 月），頁 32。

公學校本科正教員之資格。³⁶1932 年屏東高女創設時亦循此制度，由補習科培育小公學校女教員。³⁷

(二)屏東高女成立始末

臺灣女子中等學校的設置，一開始校數極少，1919 年以前，臺籍學生就讀的總督府國語學校附屬學校女子分教場（即後來的國語學校第二附屬學校、附屬女學校）本科均屬公學校的基礎教育，1919 年以後，該校改制為臺北女子高等普通學校，並另設彰化女子高等普通學校，才算是補充了初等教育以上的女子教育。日籍女性所就讀的高女則至 1908 年始於臺北設校，臺南高女的設校則要等到 1917 年。由此可知，高女的設校直到一九一〇年代末期為止皆以北部為主，在女子高等普通學校成立以前，臺籍女性在完成公學校教育後，若要繼續接受中等教育，只能選擇報考國語學校附屬女學校手藝科，因此報載「吾臺女子教育。除公學校外。視為高等者。僅艋舺之總督府國語學校附屬女學校。以外概無所聞。」³⁸確實如此。

因此，屏東地區的公學校女子畢業生，若有心向上求學，此時除了背起行囊遠赴臺北等外地讀書之外，沒有別的選擇。³⁹即使是 1917 年以後自小學校畢業的日籍學生，若要就近升學，也只有臺南女子高等普通學校可報考。地方人士認為全島公學校女畢業生爭搶國語學校附屬女學校區區 150 個入學名額，必然有超過半數的考生落榜，因此 1917 年臺南、阿緱（屏東）、嘉義等廳參事、區長及有力人士前往總督府請願，萬請懇設臺南高女，「此舉大有益於地方女學。不但臺南三廳受其惠。即其附近各廳亦將振興女學也。」⁴⁰最後臺南女子高等普通學校如願開設，當年也為這三廳的考生於臺南公館開設考場，⁴¹表示屏東地區仍有希望接受女子中等教育者，但除了遠赴臺南報考臺南女子高等普通學校之外，⁴²只能

³⁶ 臺灣總督府文教局，《臺灣總督府學事第二十四年報》（臺北：臺灣總督府文教局，1927 年 10 月），頁 15。

³⁷ 臺灣總督府文教局，《臺灣總督府學事第三十一年報》（臺北：臺灣總督府文教局，1934 年 5 月），頁 13-14。

³⁸ 不撰著人，〈請設女學將為陳情〉，《臺灣日日新報》，1918 年 7 月 2 日，日刊 5 版。

³⁹ 不撰著人，〈請設女學將為陳情〉，《臺灣日日新報》。

⁴⁰ 不撰著人，〈臺南高女問題 南部請願者之困惑〉，《臺灣日日新報》，1917 年 2 月 4 日，日刊 5 版。

⁴¹ 不撰著人，〈臺南高女試驗 應募者百五十名〉，《臺灣日日新報》，1917 年 5 月 6 日，日刊 7 版。

⁴² 事實上，除了臺南女子高等普通學校之外，公學校女學生在畢業後，亦可選擇報考位於臺南的私立長老教女學。不過，依據學者洪郁如的觀察與研究，私立高等女學校的學生仍以基督教

選擇設校已久的私立高等女學校「長榮女學」。

1920 年前後是臺灣史的一大轉捩點，不僅臺灣地方制度上在此時改為實施州廳制，1920 年前後也歷經，兩次〈臺灣教育令〉的發布與改變，高女的設置也迎來高峰期。

在高雄州，1920 年地方制度變革後，南部地方歡天喜地迎接高雄州時代的到來，不過警察出身的首任知事富島元治走馬上任後，在面對記者的訪問，表示執政的首要工作是「物價的調節」，其次是「道路品質的改善」，接下來分別是「高雄醫院院長人事案」、「高雄住宅困難問題的解決」，以及「南支南洋發展的具體對策」，⁴³此時富島腦中的那張高雄州發展藍圖主要以民生為主，尚無教育規劃。

不過，在高女之前，州民先是對於設置州立中學校一事表現得非常熱心，只是面對各方的提問，富島知事接著在 1921 年做出這樣的表示：

高雄街有設置一所中等學校的必要，因此現下正在著手進行各方面的調查，但是此刻尚屬地方財政窘迫的時候，在此時要實行，不免困難。⁴⁴

1920 年以後，設置中學校及高女交由各州主導，開辦經費成為州廳預算的負擔，因此富島知事初以財政窘迫為由暫緩設置中等學校。只不過地方人士卻從就學需求加以考量，他們認為摒除就讀醫專及農林專門學校的人數，從高雄州前往臺北、臺南等地就讀中等以上學校的子弟超過 450 人，顯示高雄地區學子向學心旺盛，實有盡速設置中等學校之必要，⁴⁵甚至有政論刊物認為「擁有三萬人口的高雄，卻連一個中等學校都沒有，真是恥辱」，地方人士因此推動設置中等學校的請願運動。⁴⁶經過州廳的調查，高雄州向總督府提出設置中學校及高等普通學校的申請，⁴⁷本案在總督府的預算會議中獲得支持而露出曙光。⁴⁸

好消息傳來，州民感到振奮。經費的難題解決後，接著是校地與校舍的問題。州立中學校究竟要設在哪裡才好呢？教育課長大橋毅表示，既然是州立中學校，

徒居多，且對參加高等女學校考試的學生來說並非第一志願，在 1938 年私立高等女學校獲得官方承認之前，學生多半優先選擇公立高等女學校。

⁴³ 川上蒼村，〈面白き二州の對比 臺南州=高雄州〉，《實業之臺灣》，12 卷 10 號（1920 年 10 月），頁 55。

⁴⁴ 富島元治，〈所感〉，《實業之臺灣》，13 卷 6 號（1921 年 6 月），頁 13。

⁴⁵ 不撰著人，〈高雄州管内の旺盛なる向學心 現在中等學校に在學せる者 四百五十名の多きに達す 先づ中學校を急施せふ〉，《臺灣日日新報》，1920 年 12 月 8 日，日刊 4 版。

⁴⁶ 作者不詳，〈高雄噂の噂〉，《實業之臺灣》，13 卷 8 期（1921 年 8 月），頁 34。

⁴⁷ 不撰著人，〈高雄と中等學校 初年度經費四十五萬圓〉，《臺灣日日新報》，1921 年 6 月 24 日，日刊 1 版。

⁴⁸ 不撰著人，〈前途に曙光を認めた高雄州の中等學校 校舍は新に建築か〉，《臺灣日日新報》，1921 年 9 月 8 日，日刊 4 版。

理應設置於高雄，但校舍用地頗大，市街中無適合之處，恐需設於郊外，「然由經濟上觀之。設於屏東。諸般較為便利。」但「目下將設在屏東或高雄。尚未確定。」⁴⁹屏東也是中學校校地之選。然而最後因 1921 年發生在屏東街上的一場深夜大火，⁵⁰讓屏東人的熱切期待落空，1922 年，高雄州下第一所中學校在高雄街設校。

有了高雄中學校之後，高雄州民的下一步即是呼籲高女的設置。1923 年，高雄第二小學校落成開校，高雄第一小學校的學生部分轉移至第二小學校就讀而多出 6 間空教室，州當局釋出可能另設高女的消息，⁵¹儘管預定於 1924 年開始招生的基隆、新竹、高雄女學校及嘉義中學校的預算一度在日本大藏省的審議中遭逢卡關危機，⁵²不過最後各校仍在 1924 年正式成立，高雄高女成為高雄州下第一個高女，同年創校的還有位於屏東街的屏東農業補習學校。

屏東街民先是錯失設置高雄中學校的先機，兩年後又眼看著高雄街喜迎高雄高女，地方民眾雖然扼腕，但對於設置學校的熱意仍未消退。1927 年，新竹、嘉義兩街街民發起運動，醞釀升格為市，以此為契機，屏東商工會在 4 月 25 日召開臨時總會，討論 1928 年將由屏東主辦之全島實業大會、法院支部設置等案，⁵³其中有關教育的部分，在計算屏東一帶學生人數後，商工會提出三個訴求：其一為有鑑於屏東學子的就學需求，希望能在屏東成立一中學校，使屏東、潮州、東港、恆春各郡，甚至旗山郡的子弟都能就近就讀。其二為設置女學校的呼籲，有志者主張「又如高等女學。本年志願者亦有百七十餘名。若得設立屏東。雖須

⁴⁹ 不撰著人，〈高雄中學新建地〉，《臺灣日日新報》，1921 年 10 月 31 日，日刊 5 版。

⁵⁰ 作為設置中學校的明星地點，屏東街民滿腔熱血地希望中學校能夠落腳屏東，並且具體地提出將屏東郡役所建築充作中學校校舍的提議，且幾乎成為內定的決議。沒想到，1921 年 10 月 15 日深夜，屏東街上火警大響，聽到警報的街民們紛紛拿著工具奔赴火光沖天的屏東郡役所前一起滅火。這場暗夜火事源自於夜間留宿小使室（工友室）的原住民喝酒不慎，點燃火柴所致，結果導致眾人寄託在郡役所建築中的中學校設置之夢也一併被燒毀。雖然眾人發起中學校設置請願運動，也表達願意出資建設費的想法，但這份熱切的期待，終究還是隨著州廳傾向將中學校設置於高雄街的態度逐漸明朗而落空了。素水生，〈高雄中學校の懷古〉，《高雄州時報》，30 期（1933 年），頁 49。不撰著人，〈損害四萬圓中學豫定の屏東元郡役所焼く 六百坪の建物烏有に歸し 蕃人一名危篤、傷者四名 蕃公が臺灣酒を酌んだのが原因〉，《臺灣日日新報》，1921 年 10 月 19 日，日刊 7 版。不撰著人，〈中學設立期成運動 建設費は負擔すると屏東有志者の陳情〉，《臺灣日日新報》，1921 年 11 月 3 日，日刊 7 版。

⁵¹ 不撰著人，〈高雄の高女 新設は可能〉，《臺灣日日新報》，1923 年 8 月 21 日，日刊 2 版。

⁵² 總督府預計動用預備金成立基隆、新竹、高雄高女及嘉義中學校，但大藏省認為各校開辦經費非屬在臨時議會上提出追加預算之重大案件而可能拒絕，總督府研議，若大藏省不同意預算案，則改由高雄州以「屬國庫支辨之職員給」支應；若內閣閣議決議開校須延期一年，則督府將以私立學校的形式開辦。不撰著人，〈新設の中等學校 豫備金の責任支出で 新學期から開校すべく奔走中〉，《臺南新報》，1924 年 3 月 4 日，日刊 2 版。

⁵³ 不撰著人，〈屏東商工會 臨時總會〉，《臺灣日日新報》，1927 年 4 月 27 日，夕刊 4 版。

扣除高學二學級百名或七十名。然已設立於地方。其志願者定見增加。」第三則是屏東農業補習學校的升格。⁵⁴不過，這三個主張之中，作為農業教育的重鎮，屏東農業補習學校被視為是「中學校、女學校設置之前提」，⁵⁵最後如願在 1928 年 4 月升格為屏東農業學校，⁵⁶屏東街民大開祝賀會，沉浸在農業學校升格的一片歡聲之中，但屏東高女及中學校的設校此時依舊未盡人意。

辦校之際，經費及校舍校地往往是最大的難題，難產多年的屏東高女，在屏東農業學校可能釋出校舍而再次出現曙光。該校因規模擴大，校舍不敷使用，另在屏東歸來著手興建新校舍。1930 年，農校新校舍雖尚未落成，屏東街民早已開始運動屏東高女的設校，認為屏東的父兄長輩不放心女兒們搭乘火車前往高雄就學，且屏東、潮州、東港等地有志升學的女學生就有 140 名，若設置屏東高女，志願者推估更可達 250 至 300 名，眼下屏東農校即將遷至新校舍，舊校舍正好可以充作屏東高女之用，因此「希望能在下淡水溪以南設置女學校」，東港、潮州、萬丹、里港各地有力人士也發聲響應，⁵⁷設校呼聲再起，州當局同意進行相關調查。⁵⁸

1931 年 3 月，屏東農校正式遷至新校舍。⁵⁹屏東街上的舊校舍閒置後，6 月，屏東街代表先後向屏東郡守武田駒吉及當時的高雄州知事平山泰提出設置女學校的請願，⁶⁰並由屏東、潮州、東港三郡代表提出請願書，⁶¹請願團人數高達九十餘名，⁶²基本上這三郡的人口已經佔了屏東總人口的絕大多數。

7 月，由屏東街長渡邊發藏及屏東商工會代表等人組成的請願團至臺北向總

⁵⁴ 不撰著人，〈屏東運動設置中等學校〉，《臺灣日日新報》，1927 年 5 月 3 日，日刊 4 版。

⁵⁵ 不撰著人，〈州立屏東農學校 來る十日開校式舉行 屏東街の祝賀準備〉，《臺灣日日新報》，1927 年 9 月 5 日，夕刊 2 版。

⁵⁶ 「高雄州立屏東農業學校設置ノ件（高雄州）」（1928 年 1 月 1 日），〈昭和三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十五年保存第十卷司法文教〉，《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7377006。

⁵⁷ 不撰著人，〈屏東地方民の女學校設置運動 隣接各街庄の賛同を得て 近く陳述に著手〉，《臺灣日日新報》，1931 年 4 月 2 日，日刊 5 版。

⁵⁸ 不撰著人，〈屏東街に 女學校新設運動 地方の結束如何に依り或は實現に至らむ〉，《臺南新報》，1930 年 5 月 20 日，夕刊 1 版。不撰著人，〈屏東街新設 女學校運動 視地方結束如何或能至其實現〉，《臺南新報》，1930 年 5 月 21 日，夕刊 4 版。

⁵⁹ 著者不詳，《昭和十三年度高雄州立屏東農業學校一覽表（昭和十三年四月末日現在）》（出版項不詳），未標頁碼。

⁶⁰ 不撰著人，〈屏東地方民の女學校設置運動 隣接各街庄の賛同を得て 近く陳述に著手〉，《臺灣日日新報》。不撰著人，〈屏東運動設女學校 向知事陳情〉，《臺灣日日新報》，1931 年 4 月 17 日，日刊 4 版。不撰著人，〈屏東の女學校設置請願問題〉，《臺灣日日新報》，1931 年 6 月 26 日，日刊 5 版。

⁶¹ 不撰著人，〈屏東女學校の設置運動 三郡下代表より 請願書を提出〉，《臺灣日日新報》，1931 年 6 月 20 日，日刊 5 版。

⁶² 不撰著人，〈屏東女學校設置運動〉，《臺灣日日新報》，1931 年 6 月 21 日，日刊 4 版。

督府，就新設女學校、設置法院支部及架設下淡水溪橋等案向內務局長及總務長官陳情，並特別說明此三案中，尤其是女學校案，若未實現，對街民的子女教育有莫大的不便。⁶³沒想到，此去陳情未久，當局又閃電宣布到任僅半年餘的高雄州知事平山泰轉調臺北州知事，1931年9月起知事為野口敏治，平山泰離開高雄前，再度提及他在意卻未完的政務，其中即包含屏東高女設校，以及高雄中學校增班事宜。⁶⁴

此時正好也是總督府正在審議隔年預算的時刻，地方代表更為積極請願，平山知事雖然即將轉調，仍允諾協助向總督府交涉，希望納入預算討論。⁶⁵然而當時遭遇政府財政緊縮，除非極為特殊或重要的新政策案，絕大多數的預算提案均被刪減，⁶⁶高雄州也不得不依照各項提案的輕重緩急緊縮或節約預算。⁶⁷總督府預算在年底送至拓務省審查，對於可能因預算排擠而再度夭折的屏東高女設置案，在平山知事、新任的野口知事相繼努力後竟敗部復活，⁶⁸可能獲得總督府的財務挹注。10月，《臺灣日日新報》報導屏東設置女學校一事，在地方人士的積極陳情下，「當局亦考慮中。七年度。或得實現」，但高雄中學校增班則恐難以落實。

69

隨著進入拓務省的總督府預算審議在11月傳出可能順利通過的好消息，⁷⁰只是校舍的問題依然難解，即使建築工程緊急開工也絕對來不及開校，因此渡邊街長積極尋覓校地，召開臨時協議會討論臨時校舍，⁷¹為了趕上隔年的開校，不足的開辦經費二萬元地方人士也考慮以募資或舉債的方式籌措。⁷²

1931年12月5日，野口知事在高雄州協議會表示「關於中等教育，…（中

⁶³ 不撰著人，〈屏東街代表出北 向關係當局陳情 新設女學校、設置法院支部、下淡水溪架橋問題〉，《臺灣日日新報》，1931年7月30日，夕刊4版。

⁶⁴ 不撰著人，〈高雄州の 發展策を説く 臺北州知事に 榮轉した平山氏〉，《臺灣日日新報》，1931年9月12日，日刊2版。

⁶⁵ 不撰著人，〈屏東高女 本年難設 或計上次年度〉，《臺灣日日新報》，1931年10月12日，日刊8版。

⁶⁶ 不撰著人，〈來年度の督府預算 一億臺を割るは明か 行財政整理により 千五六百萬圓見當を捻出〉，《臺灣日日新報》，1931年10月2日，日刊2版。

⁶⁷ 不撰著人，〈高雄州七年度預算查定終了す 決定總額は六年度並か〉，《臺灣日日新報》，1931年11月17日，日刊3版。

⁶⁸ 不撰著人，〈屏東に女學校新設 來年度州預算に計上決定〉，《臺灣日日新報》，1931年11月27日，日刊3版。

⁶⁹ 不撰著人，〈屏東女學校七年度或得成〉，《臺灣日日新報》，1931年10月28日，日刊8版。

⁷⁰ 不撰著人，〈臺灣預算有利進行 政局已無可慮 太田總督談〉，《臺灣日日新報》，1931年11月27日，夕刊4版。

⁷¹ 不撰著人，〈屏東に女學校新設 來年度州預算に計上決定〉，《臺灣日日新報》。

⁷² 不撰著人，〈いよく開設の屏東高等女學校 經費其他の打合せのため 協議會を開く〉，《臺灣日日新報》，1931年11月28日，日刊3版。

略)此外,有關女子高等普通教育,僅有高雄高女,吾以為女子教育機關有進一步整備之必要,幸好我在總督府聽聞昭和七年度屏東高女的開辦經費已被計入,在此時節,真不可不說是福音。」⁷³又說:

屏東高等女學校的設置,眾所周知,是多年來的懸案,也是振興女子教育所需的緊急設施,然而基於財政與其他因素,使其之實現遙遙無期。這次被計入總督府的預算之內,更加確定它將在昭和七年度開校,因此,本州預算也必須隨之新編所需的經費。⁷⁴

野口知事的此番發言,可說是讓屏東地方民眾吃下定心丸了,這次終於可以笑臉迎接在地的高女。屏東高女終於在4月1日正式獲得設置認可,⁷⁵並暫用屏東女子公學校校舍做為臨時校舍,⁷⁶6月,屏東高女創校,16日,臺中師範學校教諭大森丈之助被任命為屏東高女首任校長,⁷⁷7月2日舉辦開校祝賀會,⁷⁸當時屏東商工會所舉辦的納涼廉賣會還因此配合延期兩天舉行,⁷⁹地方人士並決議以協議會的名義,對協助屏東高女成立的知事、州協議會員與其他盡力者表達謝意。⁸⁰屏東人多年來的心願,這次終於得償所望。

三、屏東日治時期學籍簿典藏情形

國立屏東女中(以下簡稱屏東女)前身為日治時期高雄州立屏東高等女學校(以下簡稱屏東高女),校內目前存有1932年創校以來第一屆至1943年第十一屆入學之歷屆本科生的學籍簿,以及少量的補習科學生資料,至於戰後改制為

⁷³ 著者不詳,〈州治概況並預算大要說明〉,《高雄州時報》,23號(1932年),頁12。

⁷⁴ 著者不詳,〈州治概況並預算大要說明〉,《高雄州時報》,23號(1932年),頁16。

⁷⁵ 「臺灣公立高等女學校ノ名稱、位置、修業年限及設立團體名中追加」(1932-04-19),〈昭和7年4月臺灣總督府報第1503期〉,《臺灣總督府(官)報》,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71031503a001。

⁷⁶ 高雄州,《昭和六年高雄州管內概況及事務概要》(高雄:高雄州,出版年不詳),頁136。

⁷⁷ 「大森丈之助外十三名」(1932-06-19),〈昭和7年6月臺灣總督府報第1551期〉,《臺灣總督府(官)報》,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71031551a004。第3頁。不撰著人,〈屏東高女校長決定 大森氏を任命〉,《臺南新報》,1932年6月17日,1版。不撰著人,〈屏東女學校 開校式と祝賀會 大森初代校長着任〉,《臺南新報》,1932年6月23日,夕刊2版。

⁷⁸ 不撰著人,〈屏東高等女學校 大森校長既抵在 開校式與祝賀會 定來七月二日舉行〉,《臺南新報》,1932年6月24日,日刊8版。

⁷⁹ 不撰著人,〈屏東商工會主催 納涼廉賣會 高女開校祝賀のため 豫定より二日間延期〉,《臺南新報》,1932年6月27日,4版。

⁸⁰ 不撰著人,〈屏東協議會 謝當局設高女 議案無異議可決〉,《臺灣日日新報》,1931年12月22日,夕刊4版。不撰著人,〈高雄設法院女學校 督府計上來年豫算 知事電謝各關係官員〉,《臺灣日日新報》,1931年12月30日,日刊4版。

臺灣省立屏東女子高級中學、國立屏東女子高級中學時期的畢業證書存根聯則完整保存。目前歷屆學籍資料均由該校教務處註冊組負責保管。

儘管戰後畢業證書存根聯上註記學生姓名、出生年月日、籍貫等資訊，是很好的研究材料，但其中涉及戰後初期學制調整，無法與日治時期並觀，再加上學籍資料數量龐大，鑑於時間與人力有限，留待未來逐步整理與研究，本文以校方留存之日治時期學籍簿為中心進行整理與探究。

此外，尚須針對本文使用之「學籍卡」、「學籍簿」及「學籍資料」做說明。

每位屏東高女學生入學時，校方會製作學生的「學籍卡」，一份學籍卡共二張，依序登載學生姓名、出生年月日、畢業學校、保證人等背景資料，也會註記該生在學期間各科成績、教師評語、身體檢查紀錄等相關資訊。學生編班後，各班學生的學籍卡將彙整為「學籍簿」，教師應於學籍簿上詳細登錄該學期學生人數、進留級、退學、休學、轉學情形，有時校方行政人員亦會再度確認並蓋章。遇有學生轉學、退學或休學時，該生的學籍卡將被抽出，另外收存於「除籍簿」中。此外，各屆畢業生另編有「名冊」（臺帳），少數班級另留有班級名冊，本文將這些與學生學籍有關之所有資料統稱為「學籍資料」。

雖然屏東女中保存的學籍資料類別不少，部分類別之下又有本科、補習科或專攻科之別，還有數本各班名冊，惟因所有學籍資料中，仍屬本科歷時最長，且學生人數最多，學籍資料也保留得最為完整，因此學生的分析仍以本科學生為主。

（一）日治時期屏東高女的學籍登錄管理

學籍簿是學校內最核心的學生學籍資料，那麼，這些資料是如何被做成與保管的呢？

學者許佩賢爬梳了公學校學籍簿制度的建立歷程。她指出，1898年臺灣總督府頒行〈臺灣公學校令〉成立公學校，但對於公學校應具備哪些簿冊，以及這些簿冊應具備怎樣的形式並無規定，反而是由各地方政府自行辦理。直到一九一〇年代，各校應具備的學校文書才逐漸固定下來，其中學籍簿為最重要的

學校文書之一。⁸¹身為日治時期臺灣教育史的核心研究者，許佩賢也曾實際運用第一手的學籍資料，勾勒出戰爭末期新竹地區公學校女學生的學習狀況，證明學籍簿在校史研究上確實有其重要性。

屏東高女成立的 1932 年，高女學制已實施多年。根據〈臺灣公立高等女學校規則〉，高等女學校內常備表簿應包含學生學籍簿、出席簿及有關身體檢查之表簿等，並以附表規範學籍簿內表格格式。⁸²學生報名高女入學考試時，須向校方提書申請書（願書），申請書載明姓名、出生年月日、畢業學校、族籍、出生地及戶主、保證人等各項資料。待錄取後，教師依其報名時填寫之資料填入學籍卡中，並登錄其小公學校成績及入學考試成績。此後該生在校期間各學年、各學期的各科成績也會謄錄於學籍卡中。此外，學籍卡也記錄學生的操行表現、出缺席情形及身體檢查結果，若有家庭訪問、家長會談、學生獎懲紀錄，同樣也會記載於學籍卡。

學籍卡依學生編班收存，若遇學生轉學提出轉學申請，在取得原學校校長的許可後，教師會將該生的在學證明書及學籍簿謄本移送轉入學校，正本則由原學校保存。⁸³此時該生已在原校失去學籍，稱為「除籍」，教師須於除籍生的學籍卡上註明該生何時因何緣由除籍，並將除籍生的學籍資料抽離原班另外編存為除籍簿。同樣地，學生若因死亡、休學、退學等緣由取消學籍，亦為除籍，同樣須於其學籍卡上註記時間點與事由，並抽存於除籍簿中。

另一種學籍異動的情形是轉入。遇有學生轉入時，教師會謄寫該生的學籍卡，並註記其轉入日期與原校名，再依照學生的學年，將該生學籍卡插入該學年的學籍簿中，而非依照其轉學年度。例如某生於 1935 年轉入屏東高女第二學年，其學籍卡將被納入 1934 年度入學、1935 年時已是第二學年之學生學籍簿中。

不過，由於學籍卡的謄寫與異動紀錄全為教師手寫作業，學籍卡註記的完整程度也相當仰賴教師的勤惰，有些教師對於學生的家庭背景、人格特質及在

⁸¹ 許佩賢，〈從學籍簿看日治末期公學校女生的學習狀況－以新竹公學校 1942 年學籍簿為中心〉，廖志堅總編輯，《從清代到當代：新竹 300 年文獻特輯》（新竹：新竹市文化局，2018 年），頁 148。

⁸² 常備表簿應有：1. 高等女學校關係法令；2. 學則、日課表、教科用圖書配當表及學校醫視察簿；3. 職員名簿、履歷書、出勤簿並擔任教科、科目及時間表；4. 學生學籍簿、出席簿及有關身體檢查之表簿；5. 有關入學考查及成績考查之文件；6. 資產原簿、出納簿及經費之預算決算相關帳簿並圖書、器械、器具、標本及模型之目錄；7. 往來文件。臺灣教育會，《臺灣學事法規》（臺北：帝國地方行政學會，出版年不詳），頁 542。

⁸³ 臺灣教育會，《臺灣學事法規》，頁 544。

校表現等各項紀錄皆相當仔細，甚至多次與家長晤談，並逐次記錄晤談大要，但也有些學生的學籍紀錄不完整甚至空白，或有學期成績謄寫不全的現象，學籍卡的誤編或登錄闕漏的情形，越到日治末期越為顯著，或許與戰爭末期為了配合戰時下學生動員，教師肩負的校務益加繁重，對於學籍資料的謄錄與管理變得捉襟見肘、有心無力有關。以下簡要介紹屏東高女學籍簿典藏情形。

（二）學籍簿典藏情形

1. 學籍簿

（1）本科學籍簿

目前屏女所留存的日治時期學籍簿共計 11 屆、24 冊，每屆學籍簿以班級為單位裝訂，雖未標示班級名稱或編號，但對照各年度《高雄州學事一覽》內屏東高女學級（班級）數，數量吻合，可知學籍簿係為各班一冊。

第一屆（1932 年入學）至第八屆（1939 年入學）學籍簿前後以襯有黑色布面的厚紙板夾裝學生學籍資料卡活頁，第九屆（1940 年入學）學籍簿則以黑色厚紙板夾裝，封面謄寫「某年度入學學籍簿」，第一至九屆學籍簿另標有「某回」，即屆數，並以上、下標示不同班級，第十、十一屆（1941、1942 年入學）學籍簿分為上、中、下三班，惟第十屆上、中兩冊無保留封面。

各年度學籍簿右側上下各穿二孔，以黑色棉質粗線穿綁固定。目前屏女已將固定用黑繩拆除，連同封面將學籍資料卡逐頁裝入透明資料袋中保存，方便翻閱。

此外，1943 年屏東高女仍持續招生，理論上應有第十二至十四屆（1943 年至 1945 年入學）的學籍簿。但可惜的是，就目前保存資料卻未見這三年的資料，且戰後該校行政人員曾依學籍簿謄錄為 1932 年創校以來各屆畢業生臺帳（清冊，詳如後文），也僅謄錄至第十一屆，顯示戰後初期該校確實已無保存 1943 年之後入學的學生學籍資料。至於是否與戰後初期學生資料混淆，或保存於校內他處，則待進一步尋找與整理。



圖 1：昭和七年度(1932)入學學籍簿（第一屆）封面紙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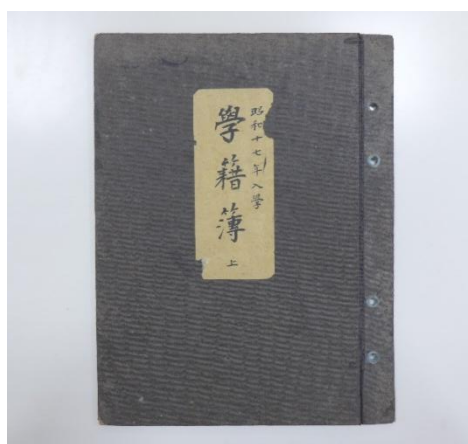


圖 2：昭和十七年度(1942)入學學籍簿（第十一屆）封面紙板

各年度學籍簿封面或封底內著錄有「學籍簿整理表」，分別依四個在學學年標示該屆學生的在籍數（學年始、學年末各記載一次）、退學人數、轉退人數、轉入人數、原級（留級）及休學人數、進級人數及出席百分率（出席率），此外，備考欄詳記該學年學生的異動情形，舉凡轉出、轉入、休學、退學等，均須記載，若為轉出或轉入，有時教師甚至詳列轉入或轉出日期與校名，或是註記休、退學的理由。備考欄的註記正確與否與教師登載是否詳實有關，不過大致可用來與除籍簿內的學生資料對照。



圖 3：昭和七年度(1932)入學學籍簿（第一屆）封面內登載之學籍簿整理表

該屆學生畢業時，表格後方註記畢業人數。表格下方蓋有膳錄教師的印章，表格上方則有校長、教務主任之章的欄位。

另外，觀察裝整於除籍簿中的學籍卡，判斷學生的學籍資料除了前述之外，應有另一張稱為「補助簿」的資料卡，詳載學生的家庭背景資料，諸如家庭所有成員與同居者（部分學生資料連傭人或僱人均有登錄）、通勤地點、

該地主人和學生本人之間的關係，以及學費提供者、家庭的宗教信仰、年收入、在校期間的好友、將來的期望等，均在登錄之列，有時甚至連每位家庭成員的居住地與活動情形都會被詳細記載下來，是了解學生出身的絕佳資料。然而此資料可能在學生畢業後被銷毀，因此各年度學籍簿均未留存補助資料。

姓名	住所	家族	同族	同居	居住	信託	家
長谷川 沙子	長谷川 沙子	長谷川 沙子	長谷川 沙子	長谷川 沙子	長谷川 沙子	長谷川 沙子	長谷川 沙子

圖 4：補助簿詳載學生家庭背景、居住地、在校友人及將來期望等各種補充資料

(2)補習科學籍簿

依據日治時期女子教育制度，在完成高女本科的四年學業之後，學生可再選擇留校修讀補習科一年。修讀補習科的本科學生學籍資料會加註一年補習科的成績紀錄，並抽離原班級，另行裝訂為補習科學籍簿。

目前屏女所保留之補習科學籍簿共有 2 冊，一冊封面上以書法字手寫註

記「昭和十二年度入學學籍簿 補習科」，未標年代，檢視其內容，應為 1932 年入學本科、1936 年入學補習科、1937 年畢業之學籍簿，封面標註「昭和十二年入學」，實則為畢業年度；另一冊封面上僅標示「補習科學籍簿」，觀察其內容，應為 1935 年入學本科、1938 年入學補習科、1939 年畢業之學籍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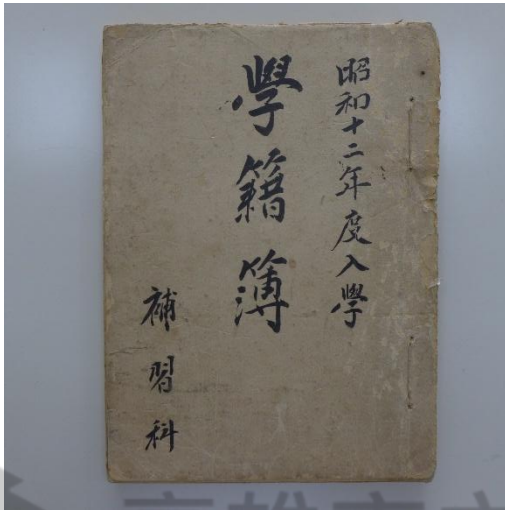


圖 5：1936 年入學之《補習科學籍簿》封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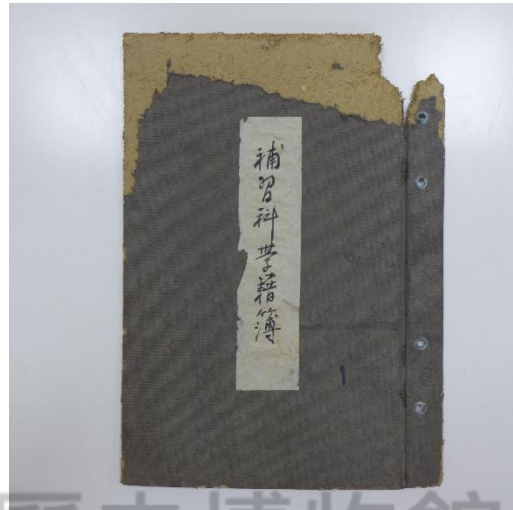


圖 6：1938 年入學之《補習科學籍簿》封面紙板

(3)昭和十九年入學 專攻科學籍簿

1943 年 4 月起，補習科改為專攻科，以二或三年為原則，惟可視各地情形設為一年。

屏東保留有 1944 年入學之專攻科學籍簿一冊，封面上手寫「昭和十九年度入學 專攻科學籍簿 高雄州立屏東高等女學校」，「學籍簿」為「學藉簿」之誤字。無論是封面或內頁，紙張的材質或裝訂方式，都明顯較其他學籍簿粗糙簡略，呈現出戰爭末期物資缺乏的現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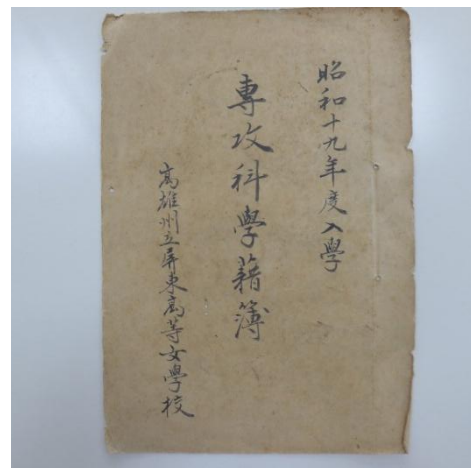


圖 7：1944 年入學之《專攻科學籍簿》封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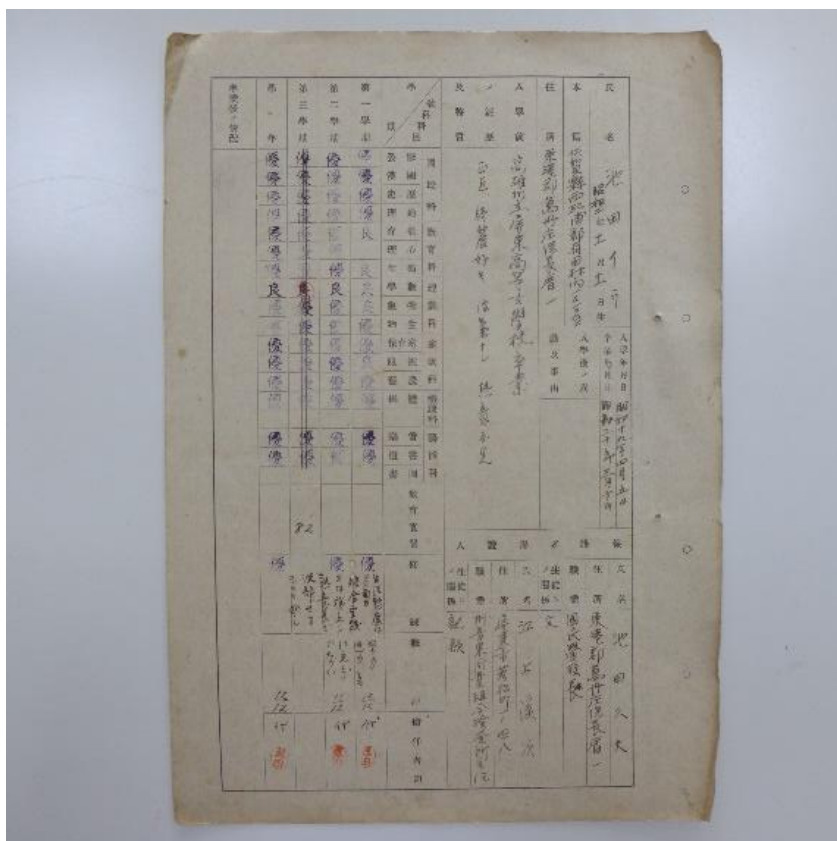


圖 8：1944 年入學之《專攻科學籍簿》內頁

2. 除籍簿

學生若因轉出、休學、退學或死亡等原因而取消學籍，稱為「除籍」。學生除籍後，該生在入學時所填列之學籍卡將被抽出，另裝訂為「除籍簿」，同時將除籍學生姓名與除籍紀錄謄寫於該年度學籍簿封底的整理表備考欄中，因此理論上學籍簿內備考欄的紀錄應該能與除籍簿的資料吻合。

屏女所保存之除籍簿共有兩份，其一之簿冊封面以朱字書寫「昭和七年度以降 除籍者學籍簿及補助簿」，另一本則僅於封面標記「除籍簿」字樣，未標年度。

兩冊除籍簿內學生資料卡皆未按年度排列，可見學生除籍後，除了將其資料另行抽存之外，似為隨意排列，推測當時並無嚴謹的歸檔規範。觀其內容，前者應為 1932 年創校至 1939 年間除籍學生資料冊，後者則為 1940 年至 1944 年除籍之學籍資料卡。

筆者進一步將之與學籍簿備考欄的異動紀錄加以對照，發現除籍簿中的除籍學生資料與除籍簿封底整理表所列名單雖大致吻合，但仍可見到少數無法對

應的情形，主要是有些是學生的轉出年度與學籍簿備考欄記載的年度略有前後年度的差異。到了 1938 年以後，由於學籍簿備考欄開始出現登載不全的情形，除籍簿內的學籍卡無法與學籍簿登載的異動紀錄相對應，而此現象越到戰爭末期越是明顯，顯示越到日治末期，教師對班務的掌握愈加捉襟見肘，勞心勞力。



圖 9：《昭和七年度以降 除籍者學籍簿及補助簿》封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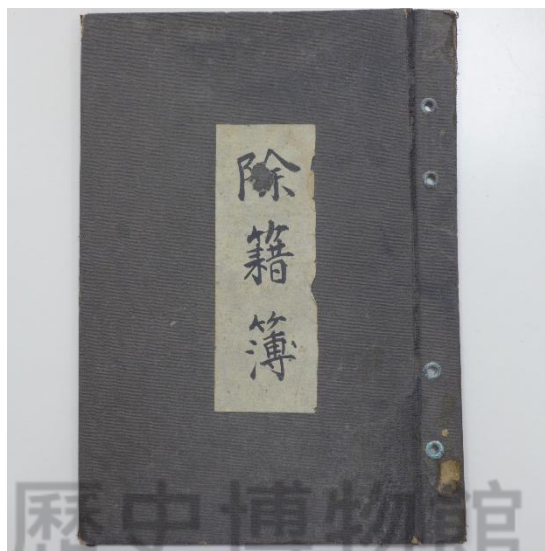


圖 10：《除籍簿》封面

3. 畢業生臺帳及其他名冊

有關屏女所保存之其他除籍簿，尚有畢業生名簿、臺帳及其他各別班級學籍簿，茲分述如下。

(1) 本科卒業生臺帳

此為屏女目前所藏最為完整的畢業生名簿，以毛筆抄寫自第一屆至第十一屆所有畢業生的族籍、姓名及出生年月日，日籍學生之族籍標示為其原籍所在的日本內地都道府縣，即使該生為臺灣出生的「灣生」，依舊標示原籍；臺籍學生則標示為其戶口所在的臺灣州、廳。

本臺帳有二處值得特別注意。其一，日治末期殖民政府推行改姓名政策，部分臺人配合改為日式姓名，本臺帳登錄者為其畢業時證書上所登載的日式姓名，惟族籍仍登記高雄州、臺南州等原籍地，因此無法從姓名來判斷該生為臺人或日人，而必須檢視其族籍。

其二，第十一屆為 1942 年入學，1946 年畢業，是該校跨越政權交替的一屆，因此有關畢業生的出生年月日，第一至十屆皆採行大正、昭和等日式紀年，獨第十一屆畢業生出生年月日改採民國紀年，該屆臺籍畢業生的族籍也改為高雄縣、臺南縣等戰後行政區名。由此可見，本臺帳應為戰後初期編成。

另外，日治末期改日式姓名的臺籍畢業生在戰後恢復中文姓名，部分改回原姓名者在戰後向屏女申請更改姓名，或是遺失畢業證書者，向校方申請補發畢業證書，或是畢業生死亡後家屬向校方申告者，本臺帳上亦留有相關註記。



圖 11：《本科卒業生臺帳》



圖 12：臺帳亦登載畢業生於戰後改回原姓名及補發畢業證書等紀錄

(2) 卒業生名簿

屏女所存之卒業生名簿尚有三冊，均裁切廢紙後，於紙上裱貼謄有學生姓名、生日、種族、畢業學校、家長及保證人姓名、地址的直式小卡，三冊封面上僅以毛筆書寫「卒業生名簿 屏東高等女學校」，未標年代。從學生資料判斷，此三冊應為第三屆畢業生名簿（1934 年入學）、第五屆畢業生名簿（1936 年入學）及第六屆畢業生名簿（1937 年入學）。惟學籍小卡為以膠手工黏貼，經年累月之下，各冊卒業生名簿均已脆化，紙張碎裂，不堪翻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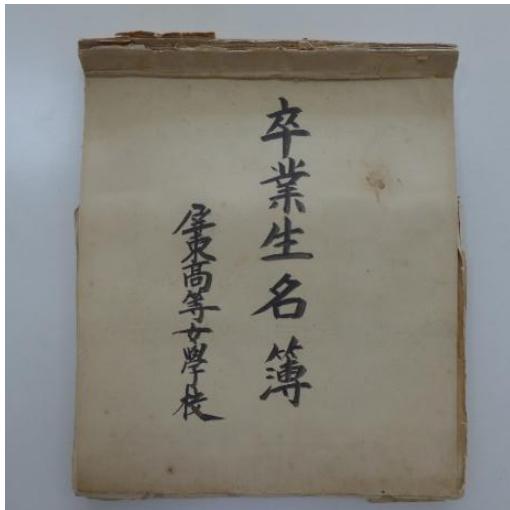


圖 13：1937 年第六屆《卒業生名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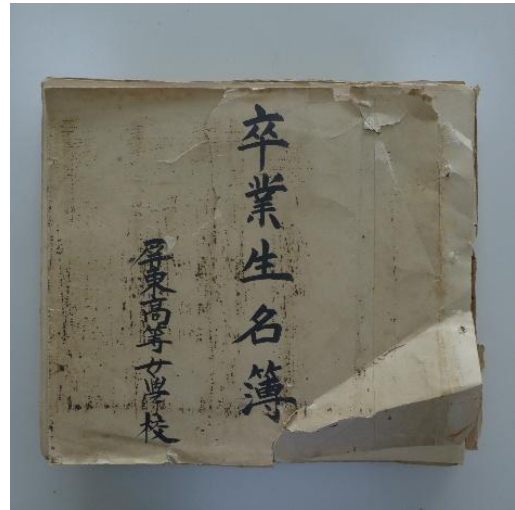


圖 14：1934 年第三屆《卒業生名簿》封面已脆化碎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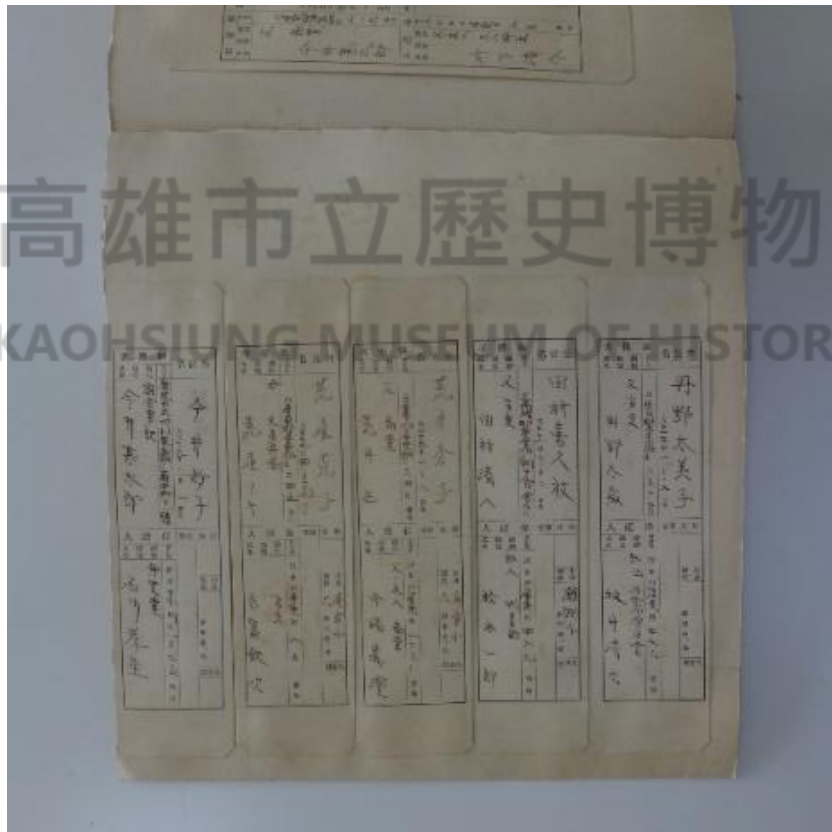


圖 15：《卒業生名簿》內頁裱貼学籍小卡

(3)其他名簿

除了上述各類卒業生名簿之外，屏東高女尚保存有《轉退及補習科並死亡生徒名簿》及《一年三組生徒名簿》。前者應為轉出、退學、死亡及補習科學生

學籍簿，惟內頁為多張學籍小卡重疊裱貼，不堪翻攝，因此難以逐一確認；後者為一年三班學生名簿，內頁所張貼之學生資料著錄不完整，未登記學生出生年月日及入學年度。屏東高女自 1941 年度入學者起增設為三個班級，然而本名簿所列學生皆非屬 1941、1942 年度入學者，推斷本名簿為 1943 年度以後入學者之班級名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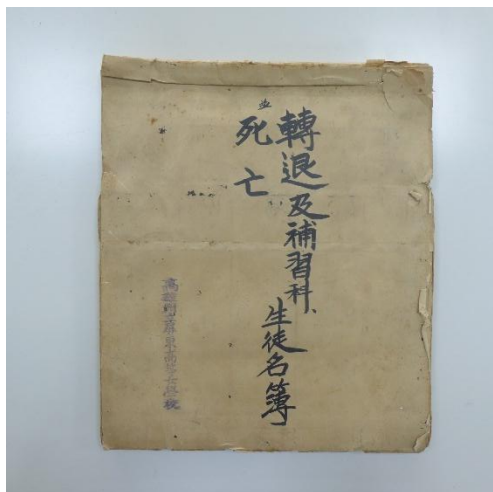


圖 16：《轉退及補習科並死亡生徒名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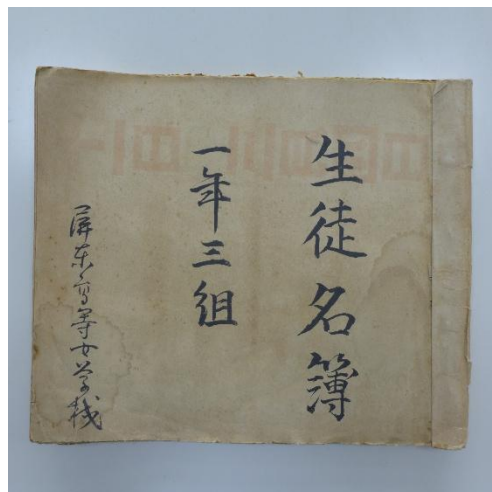


圖 17：《一年三組生徒名簿》

(三)學籍資料著錄情形

綜觀各式學籍簿，內容均為學生個人資料與在校表現，各簿冊大致依學生在籍與除籍區別之，因此以下說明學籍卡的登錄項目與著錄情形。

每位學生的學籍卡共有兩張四面，第一面謄寫學生個人資料，包含：

1. 學生基本資料：

包含姓名、出生年月日、族稱、原籍、居所、出生地、渡臺年月日、休學日期、入學前學歷、入學年月日、退轉學年月日、卒業年月日等，這是認識學生出身背景最核心的資料。

有關姓名，臺籍學生姓後加「氏」，如顏氏舜華、蔡氏金英。1940 年，日本殖民政府於二月十一日「紀元節」宣布實施改姓名政策，並修改〈臺灣戶口規則〉，受理臺人改日本姓之申請。⁸⁴屏東高女學籍卡中，年紀最長的改姓名學生為 1936 年入學的蘇氏進治，其改名為前川治子，1940 年改姓名政策實施時，她恰好就讀第四學年，因此有可能是配合政策而改姓名。此後屢見學生改姓名之紀錄，且皆會另行註記獲改姓名許可

⁸⁴ 間宮定吉，《臺灣改姓名の相談 改姓名に伴ふ 名義書換書式》（臺南：南方堂，1941），頁 1。

的日期，學生改姓名的情形在 1940 年後越來越多，1941 年以後入學的臺籍學生，甚至因入學前已改姓名之緣故而逕以日式姓名登記，此時光從姓名無法斷言該生是否為臺灣人，須搭配其原籍來交叉判斷。

此外，尚有少數學生戶主原籍原註記由臺灣改為日本內地戶籍，推測此種情形可能為戶主被日本人收為養子而改姓。

有關族稱，在臺日人學生的族稱標註該生為日本某縣的士族或平民，臺人學生則標註「福」或「福建族」、「廣」或「廣東族」，另有一名學生填寫其族籍為中華民國。不過未特別註記的情形也相當普遍，顯然學生的族籍對校方來說不算是重要的資訊。原籍、出生地及居所均各有註記欄位，原籍部分，日籍學生註記為其在本國的戶籍所在。至於出生地，由此可判斷該生是否為「灣生」，若為灣生，其「渡臺年月日」欄位通常為空白，也有誤記為其父祖來臺的日期。臺籍學生則不需填寫渡臺年月日。

2. 戶主及保證人資料：

學生入學時，須提供戶主及二位保證人資料。學籍卡上註記戶主及保證人之姓名、與學生的關係、職業，以及原籍與居所。戶主與保證人是了解學生家庭背景時非常重要的參考資料，戶主通常是學生的父親，但也會看到戶主是學生的祖父、叔伯或兄弟的情形，由此可了解學生家長從事的職業。保證人則多是戶主，或是戶主的兄弟、姻親、友人或同僚，多半選擇親友之中具有一定社經地位或經濟能力者擔任保證人，因此可藉此分析家長平素往來交誼的對象與階層。

3. 入學前資料：

包含該生就讀小公學校時的畢業成績、賞罰紀錄、入學考試成績及小公學校校長報告概要。

學籍卡第二面謄寫學生在學期間各學年、各學期、各科及操性成績，並註記排名。1943 年以前，各科成績以數字 1 至 10 評定，並以手抄登錄；1943 年以後則以「秀」、「優」、「良」、「可」等漢字註記，若為不及格，則以紅字書寫「不可」。各屆學生成績表裡只要 1945 年仍在學者，其該年度成績均未登錄，推測可能因戰爭末期校務受到影響，1945 年 3 月學年結束後，教師未能及時登錄成績。

此外，若該生在本科畢業後另修讀補習科一年，補習科成績亦登記於此

面。

學籍卡第三面為學生操行考查表，就學生性質、容儀、言語、動作、行為、習癖、特徵、訓戒、賞罰、役員（擔任班級幹部）、特技（特殊專長）等，依學年、學期登載。教師亦於此登錄「指導矯正方案」，說明該學校教師對學生行為提出的訓戒或建議。另有操行成績與備考欄位。

學籍卡第四面為學生出缺席情況與身體檢查情形。前者登記該生事病假及早退等出席情形，若請病假，會另行註記疾病名稱。後者則為各學年身高、體重、胸圍、體位、視力、聽力、鼻疾等各種檢查結果，若於學生於在學期間曾罹患特殊疾病，或身體上有明顯生理特徵，此處亦會註記。

最後是有關「補助簿」資料卡。如前文所述，補助簿進一步詳細載明學生的家庭成員基本資料與其寄宿地點、該地主人和學生本人之間的關係，以及學費提供者、家庭的宗教信仰、年收入、在校期間的好友、將來的期望等，有助於吾人更全面地了解屏東高女學生的組成。只可惜絕大多數的學籍簿中並未保存補助簿，因此後續分析屏東高女學生組成背景時，將以學籍簿及除籍簿資料為主，補助簿則做為參考。

本計畫已將屏東高女自第一屆（1932 年入學）至第十一屆（1942 年入學）之學籍卡依年度完整建置為學生資料一覽表。為完整分析學生背景及除籍原因，在建置學生資料時，除了學籍簿之外，也一併納入除籍簿。

另外，屏女所保存之日治時期學籍簿僅至第十一屆，按理來說應還有第十二至十四屆（1943 年至 1945 年入學）的學籍簿，但未見 1943 年度以後的學籍簿。

四、屏東高女學生背景分析：以學籍簿為中心

本研究為了對屏東高女的學生背景進行分析，目前已依據屏東高女所保存之屏東高女學籍簿及除籍簿建置完成各年度學生基本資料表，建置筆數高達 1,388 筆。這 1,388 筆學生資料是本科學生入學時留存的資料，實際上，雖然除籍簿的學生並未完成屏東高女的學業，但為了全面了解入學學生的樣態，本研究仍將之納入分析對象中。

此外，屏東高女除了本科之外，依照年度不同，尚設有補習科及專攻科，不過仍以本科的學生資料最為完整，人數也最多，校內雖留有部分補習科與專攻科的資料，但殘存的資料量極少，年度也有所闕漏。因此本研究暫排除補習科及專攻科的學生。

在進行屏東高女學生背景分析時，先簡述該校各年度班級數及新生人數的變化。

設立於 1932 年的屏東高女，創校之初設有 2 班，各招收 50 人，每屆新生約有 100 人，這樣的班級數一直維持到 1940 年，惟各班人數緩慢增加至 55 人，每屆招收新生約 110 人左右，九年之間大致相同，但因每學年均有學生退學、轉出入學或休學，因此各年度各班人數略有增減。

1941 年臺灣實施〈國民學校令〉，將小、公學校改名為國民學校，屏東高女也在這一年有了變化，新生班級增為 3 班，每班人數約 44 至 46 人，隔年各班新生人數再增加至 55 人。換句話說，屏東高女自設校以來規模及相當穩定，直到戰爭時期才進一步擴大。

以下將以屏東高女各年度學籍卡為基礎，輔以各年度《臺灣總督府學事年報》的數據資料，就本科學生資料進行分析，進一步勾勒屏東高女全體學生的樣貌。需先說明的是，考量到學生入學之後可能因為搬家、健康、結婚、生計等種種因素而退、休學，或是轉至其他學校，或從其他學校轉入本校，異動頻繁，人數變動不一，因此以下各項統計均以該年度在學學生進行分析，而非僅就新生進行統計。

另外，1941 年度入學學生學籍簿未登錄第四學年（1944 年度）成績，1942 年度入學學生學籍簿則第三、四學年（1944 年度、1945 年度）成績皆為空白，不過仍可推斷該二年度學生在 1945 年時應仍在學，故本文以學生的入學日期為判斷其是否在學的基準。

（一）民族

儘管戰爭時期部分臺籍學生因配合改姓名而登載日籍姓名，但仍可從學籍卡上的本籍判斷該生是否為臺籍學生。以下為各年度日、臺籍學生人數及比例一覽表。

表 1：各年度臺、日籍學生人數及比例一覽表

年度	臺人		日人		總和
	人數	比率	人數	比率	
1932	24	24%	76	76%	100
1933	54	30%	126	70%	180
1934	82	32%	171	68%	253
1935	112	32%	237	68%	349
1936	127	34%	243	66%	370
1937	132	34%	259	66%	391
1938	136	34%	259	66%	395
1939	141	35%	266	65%	407
1940	143	34%	275	66%	418
1941	155	32%	330	68%	485
1942	171	32%	358	68%	529
1943	144	33%	290	67%	434
1944	105	34%	204	66%	309
1945	51	32%	107	68%	158

1932 年屏東高女創校之始，全校僅有 2 班，學生人數不多，隨著各學年陸續補足，全校學生人數也逐漸增加，到了 1942 年在學生人數超過 500 人，來到日治時期學生人數的高峰，之後人數應是持續成長，但由於現存學籍資料缺少 1942 年度以後入學學生資料而難以計算，使得人數看似呈現下滑的趨勢，但班級數其實較 1941 年以前為多，因此人數下滑應非實況，全校學生應仍維持 500 人上下。

研究高女的學者山本禮子將日治時期的高女分成四種類型，並以 1925 年及 1940 年兩個年度的就學狀況來分析臺、日人在籍學生民族比率。第一種是 1922 年以前成立、供日人就讀的學校，如臺北第一、第二、臺南第一及臺中高女，此類學校仍以日籍學生為主，臺籍學生僅占約 3% 左右；第二種是 1922 年以前成立、供日人就讀的學校，如臺北第三、彰化及臺南第二高女，此類學校反而是以臺籍學生為主，日籍學生約佔兩成左右；第三類是 1922 年以後成立的高等女學

校，大致上日籍學生占近八成、臺籍學生占約兩成左右；第四類則是私立高等女學校，以淡水高女來說，日本人僅占全校學生數的 1% 以下，幾乎全為臺籍學生。

⁸⁵當然各校仍存在差異，例如同樣是 1922 年以後成立的高女，位於宜蘭的蘭陽高女 1940 年臺籍學生的在籍人數籍略多於日籍學生。

從表 1 可知，屏東高女是所以日籍學生為主的學校，臺、日籍學生的比例除了創校首屆相差較為懸殊之外，其餘各屆均大致維持日籍學生約佔 65% 至 68%、臺籍學生約佔 32% 至 35% 的比例，未有明顯消長，整體而言日、臺籍學生比率為二比一。若與全臺各地 1922 年以後成立的高女在 1940 年的在籍人數相比，屏東高女雖然仍以日籍學生為多，但臺籍學生的比例較他校高出許多，僅以些微比率次於虎尾高女。

值得注意的是，儘管屏東地區原住民「蕃地」面積廣袤，也設有多所以原住民學童為招生對象的公學校或蕃童教育所，但屏東高女的學生裡並沒有原住民。作為屏東地區女子教育的最高學府，何以屏東高女未曾有過原住民學生？這要從學制來解釋。

1941 年〈國民學校令〉發布以前，原住民學童就讀的是蕃人公學校或蕃童教育所，無論是學制、學科、教育目的或使用的教科書，均與日人學童及漢人學童不同。且根據數位原住民耆老的口述回憶，日治時期成績優秀的原住民學生在畢業後會直接被學校延聘而留校服務，直接成為老師。⁸⁶考量到這樣的因素，縱使資質優異的原住民女學童完成初等教育，其繼續就讀屏東高女的可能性與意願都不高，實務上，就目前所見，我們看到為了配合統治者的統治目的，僅有極少數的原住民學生後來進入師範學校或花蓮港高女、臺東高女就讀，畢業後返回原鄉擔任教師，屏東高女則無原住民學生。

此外，本文也關注臺、日人在入學考試時的競爭程度是否有差異。表 2 為 1935 年至 1941 年度屏東高女及高雄高女臺、日籍學生報考人數及錄取人數一覽表，1932 年至 1937 年的數據來自各年度《臺灣總督府學事年報》，1938、1939 年的資料則引自《高雄州教育一覽》，惟目前僅見 1940 及 1941 年的《高雄州教育一覽》，且此二年度也不再分列臺日人報考人數，故不列出。此外，由於屏東高女與高雄高女設立補習科的年度不同，再加上補習科為高女本科畢業

⁸⁵ 山本禮子，《殖民地台灣の高等女学校研究》，頁 54。

⁸⁶ 例如屏東瑪家耆老邱傳順在臺灣省文獻委員會舉辦的口述歷史座談會上做如此陳述。臺灣省文獻委員會，《屏東縣鄉土史料》（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6 年），頁 538。

生方得報考，與小、公學校畢業生可報考的高女本科不同，本表僅統計本科，不計入補習科及本科轉學生人數。少數年度包含朝鮮人及外國人報考，不過人數極少，僅個位數，也未有考生獲得錄取，因此同樣不計入計算。

另須說明的是，表 1 的統計資料來源為屏東高女各年度學籍簿，且計算的是各年度全校在學學生的人數；表 2 則引自各年度《臺灣總督府學事年報》及《高雄州教育一覽》，也以各年度錄取人數（即一年級新生）為計算對象，因此兩表的數據並不相同。

屏東高女各年度臺籍學生報考人數都多於日籍學生報考人數，不過錄取人數的部分卻完全相反，反而是被錄取的日籍學生是臺籍學生的兩倍之多，故從錄取率來看，臺籍學生的錄取率不僅低於日籍學生的錄取率，且除了 1933 年較高、1934 年微幅突破三成之外，長年皆處於錄取率僅一、二成左右的低迷狀態。如果再考量日治時期小、公學校所使用的教科書內容與難度都不同，臺籍學生若有志升學，通常得另外補習來加強課業，補足和日籍學生的程度差異，⁸⁷便能理解能夠在屏東高女入學考試中脫穎而出的考生，程度必然相當優秀。

屏東高女設校後，對高雄高女的報考是否造成影響呢？

表 2 顯示，1932 年以前，高雄高女的臺籍報考人數大約維持在 40 人至 60 人之間，錄取率介於二成至二成七左右；1932 年屏東高女成立當年，高雄高女的臺籍報考人數激增，錄取率也大幅降低，但其後報考人數便逐步由 40 人至近 90 人下降至 25 人至 40 人左右，不過錄取人數也隨之減少，錄取率則微幅高於 1932 年。

至於日籍考生的部分，屏東高女的日籍學生報考人數穩定維持在 70 人至 110 人之間，1937 年以前的錄取率大致維持在七至八成左右；高雄高女部分，1928 年以後報考人數也持續落在 150 人前後，即使 1932 年屏東高女設校，高雄高女日籍考生的錄取率也僅微微低於先前，錄取率大致持平。

1937 年以後，無論是屏東高女或高雄高女，臺、日籍學生的錄取率均下降，顯示較先前更為競爭。

綜合上述分析，原先高雄州下僅有高雄高女一所高等女學校，1932 年成立屏東高女時，高雄高女的臺籍考生突然間湧入，錄取率受到一些影響。之後，

⁸⁷ 例如蘭陽高女第三屆學生張月娥表示：「高女很難考，跟日本人考不簡單呢！她們有保障名額，錄取 100 名裡面，大概臺灣人只有三十多名，其他都是日本人。不好考，考中了大家都很高興。」她也回憶考前補習情形，便提到入學考試並不好考，需要考前透過參考書、字典或考古題來準備。賴淑娟、張美鳳訪問，《宜蘭女聲：阿媽的故事【教育篇】》（宜蘭：宜蘭縣縣史館，2014 年），頁 146。

高雄高女的臺籍考生減少，反而是屏東高女的臺籍考生逐年增加，推斷這有可能是在地女性學生多了一個選擇，臺籍學生轉而報考屏東高女所致，不過這僅是推測，必須進一步確認高雄高女學生每年有多少比率來自屏東地區，才能說明有多少有意報考高雄高女的屏東學生，可能在屏東高女成立之後轉而選擇報考屏東高女。不過囿於時間與資料，本文尚無法處理，此議題留待未來進一步檢證。

高雄高女日籍學生的報考人數則相對穩定，不受屏東高女設校的影響。



表 2：1935-1941 年屏東高女及高雄高女日、臺籍報考人數及錄取人數一覽表

年度	屏東高女						高雄高女					
	臺人			日人			臺人			日人		
	報考人數	錄取人數	錄取率	報考人數	錄取人數	錄取率	報考人數	錄取人數	錄取率	報考人數	錄取人數	錄取率
1924	尚未設校						88	21	23.86%	132	91	68.94%
1925							57	15	26.32%	103	83	80.58%
1926							54	15	27.78%	119	81	68.07%
1927							63	15	23.81%	116	82	70.69%
1928							54	15	27.78%	147	89	60.54%
1929							54	11	20.37%	147	89	60.54%
1930							40	10	25.00%	149	86	57.72%
1931							39	10	25.64%	151	91	60.26%
1932	142	24	16.90%	112	76	67.86%	47	8	17.02%	158	93	58.86%
1933	92	46	50.00%	72	57	79.17%	25	6	24.00%	143	94	65.73%
1934	106	35	33.02%	89	65	73.03%	24	12	50.00%	146	112	76.71%
1935	125	31	24.80%	100	74	74.00%	25	12	48.00%	155	94	60.64%
1936	131	36	27.48%	87	70	80.46%	27	8	29.63%	158	96	60.76%
1937	180	37	20.56%	96	69	71.88%	34	12	35.29%	163	90	55.21%
1938	205	32	15.61%	125	75	60.00%	37	7	18.92%	233	111	47.64%
1939	215	34	15.81%	120	76	63.33%	37	7	18.92%	185	103	55.68%

（二）本籍

接著，讓我們來看看屏東高女歷屆學生都是哪裡出身的菁英。

表 3、4 分別為屏東高女各年度臺籍、日籍學生本籍區域一覽表。從表 4 可知，接近八成的學生都是高雄州在地出身，這個比率在 1935 年時甚至超過八成。若細看學生本籍分布於高雄州下哪些地方，則發現以屏東市最多，鄰近屏東市的屏東郡、東港郡次之，旗山郡、鳳山郡、潮州郡則旗鼓相當，來自高雄市的學生僅個位數，這可能是由於高雄市早已設立高雄高女供在地女性就讀的緣故。來自恆春郡的學生也不多。至於其他州，以臺南州最多，但也僅緩步增加至一成左右。

我們要如何解釋屏東高女的臺籍學生絕大多數為本地學生的現象呢？首先，屏東高女的創校，本來就是屏東士紳基於地方女子教育的需求，呼籲多年後的成果，隨著公學校畢業人數逐年增加，在地就學需求愈發強烈，屏東高女成立之後，立刻滿足了在地女性的升學需求。其次，縱使開明的父母同意女兒在小公學校畢業後繼續升學，考量到遠赴他地求學的教育成本，沒有相當經濟條件的家庭也無法負擔。再者，參考宜蘭高女首屆學生林環的說法，長輩們都有「女孩子出外會學壞」、會被拐的觀念，即使經濟上過得去，也未必會同意女兒遠赴他地讀書。⁸⁸因此我們可以理解，考量到在地社會的女子教育需求、教育成本多寡，以及上一輩的觀念，屏東高女的學生絕大多數來自在地社會。

而表 4 的數據顯示，屏東高女日籍學生的本籍主要皆在九州地方，包含大分、宮崎、福岡、佐賀、長崎、熊本、鹿兒島及沖繩，除了首屆學生中本籍在九州的學生比率接近四成之外，其餘各年度均在五成上下。其次是來自山梨、長野、新潟、岐阜、靜岡、愛知、富山、石川、福井及三重的中部地方，雖然出身中部地方的學生僅次於九州地方，但比率約僅占日籍學生總人數的一成左右，遠不及來自九州地方的學生。表 5 是 1930 年國勢調查中，高雄州在臺日人本籍人數與比率，從表中可知，高雄州下無論哪個郡，皆有半數左右的在臺日人本籍在九州地方，全州的比率也是如此，這和屏東高女學生的本籍比率大致相同，可見屏東高女日籍學生也如實反映了在地的在臺日人本籍比率。⁸⁹

⁸⁸ 賴淑娟、張美鳳訪問，《宜蘭女聲：阿媽的故事【教育篇】》，頁 22。

⁸⁹ 臺灣總督官房臨時國勢調查部，《昭和五年國勢調查結果中間報（高雄州屏東郡）》（臺北：臺灣總督官房臨時國勢調查部，1933 年），頁 40。

表 3：屏東高女各年度臺籍學生本籍一覽表

	年度	1932	1933	1934	1935	1936	1937	1938	1939	1940	1941	1942	1943	1944	1945
臺北市	小計	1	1	1	1	1	1	0	0	3	3	2	2	0	0
	百分比	4.2%	1.9%	1.2%	0.9%	0.8%	0.8%	0.0%	0.0%	2.1%	1.9%	1.2%	1.4%	0.0%	0.0%
新竹州	小計	0	2	4	5	6	5	3	6	5	5	7	3	2	2
	百分比	0.0%	3.7%	4.9%	4.5%	4.7%	3.8%	2.2%	4.3%	3.5%	3.2%	4.1%	2.1%	1.9%	3.9%
臺中州	小計	1	0	0	0	0	0	1	1	1	2	4	4	5	3
	百分比	4.2%	0.0%	0.0%	0.0%	0.0%	0.0%	0.7%	0.7%	0.7%	1.3%	2.3%	2.8%	4.8%	5.9%
臺南州	小計	2	5	6	7	13	14	16	19	17	17	19	15	10	5
	百分比	8.3%	9.3%	7.3%	6.3%	10.2%	10.6%	11.8%	13.5%	11.9%	11.0%	11.1%	10.4%	9.5%	9.8%
高雄州	高雄市	2	3	4	6	7	3	2	3	4	7	6	5	4	1
	屏東市	7	14	19	25	26	28	32	31	30	31	35	30	21	12
	旗山郡	0	0	0	3	3	5	9	8	9	11	10	8	7	3
	岡山郡	2	2	4	6	2	4	2	2	4	9	13	12	9	3
	屏東郡	2	2	8	11	11	19	16	15	17	12	14	13	9	5
	鳳山郡	1	2	3	7	8	7	10	9	10	14	13	11	8	3
	東港郡	3	11	16	19	25	24	23	26	24	25	28	23	15	7
	潮州郡	1	5	9	11	12	9	7	8	9	10	12	11	9	5
	恆春郡	1	3	4	4	4	3	3	3	2	1	1	1	1	1
	小計	19	42	67	92	98	102	104	105	109	120	132	114	83	40
	百分比	79.2%	77.8%	81.7%	82.1%	77.2%	77.3%	76.5%	74.5%	76.2%	77.4%	77.2%	79.2%	79.0%	78.4%
其他	小計	1	4	4	7	9	10	12	10	8	8	7	6	5	1
	百分比	4.2%	7.4%	4.9%	6.3%	7.1%	7.6%	8.8%	7.1%	5.6%	5.2%	4.1%	4.2%	4.8%	2.0%
總計		24	54	82	112	127	132	136	141	143	155	171	144	105	51

表 4：屏東高女各年度日籍學生本籍一覽表

	年度	1932	1933	1934	1935	1936	1937	1938	1939	1940	1941	1942	1943	1944	1945
北海道地方	小計	12	14	13	21	17	20	20	22	25	29	35	32	23	13
	百分比	15.8%	11.1%	7.6%	8.9%	7.0%	7.7%	7.7%	8.3%	9.1%	8.8%	9.8%	11.0%	11.3%	12.1%
關東地方	小計	9	11	14	18	18	23	19	19	25	25	29	20	11	6
	百分比	11.8%	8.7%	8.2%	7.6%	7.4%	8.9%	7.3%	7.1%	9.1%	7.6%	8.1%	6.9%	5.4%	5.6%
中部地方	小計	8	18	19	28	33	29	29	27	27	41	54	47	34	20
	百分比	10.5%	14.3%	11.1%	11.8%	13.6%	11.2%	11.2%	10.2%	9.8%	12.4%	15.1%	16.2%	16.7%	18.7%
近畿地方	小計	2	1	4	8	14	16	16	17	15	21	18	10	9	2
	百分比	2.6%	0.8%	2.3%	3.4%	5.8%	6.2%	6.2%	6.4%	5.5%	6.4%	5.0%	3.4%	4.4%	1.9%
中國地方	小計	8	9	22	27	26	30	33	32	32	35	32	24	15	8
	百分比	10.5%	7.1%	12.9%	11.4%	10.7%	11.6%	12.7%	12.0%	11.6%	10.6%	8.9%	8.3%	7.4%	7.5%
四國地方	小計	6	6	9	11	12	12	12	11	9	16	18	17	13	4
	百分比	7.9%	4.8%	5.3%	4.6%	4.9%	4.6%	4.6%	4.1%	3.3%	4.8%	5.0%	5.9%	6.4%	3.7%
九州地方	大分	2	3	5	6	6	9	10	14	14	11	12	7	4	3
	宮崎	0	2	2	3	6	6	7	9	7	12	13	8	5	3
	福岡	3	3	7	15	18	15	14	10	12	13	18	16	12	8
	佐賀	2	8	12	16	16	18	17	20	21	24	25	18	11	5
	長崎	6	7	9	11	6	8	10	8	10	17	19	18	14	6
	熊本	5	12	20	27	31	33	29	37	35	38	35	27	17	9
	鹿兒島	11	26	29	35	30	33	35	32	36	40	41	36	26	13
	沖繩	1	5	5	8	7	5	7	6	7	8	9	7	7	4
	小計	30	66	89	121	120	127	129	136	142	163	172	137	96	51
	百分比	39.5%	52.4%	52.0%	51.1%	49.4%	49.0%	49.6%	51.1%	51.6%	49.4%	48.0%	47.2%	47.1%	47.7%
其他	小計	1	1	1	3	3	2	2	2	0	0	0	3	3	3

	百分比	1.3%	0.8%	0.6%	1.3%	1.2%	0.8%	0.8%	0.8%	0.0%	0.0%	0.0%	1.0%	1.5%	2.8%
總計		76	126	171	237	243	259	260	266	275	330	358	290	204	107

表 5：1930 年高雄州各郡在臺日人本籍人數及比率一覽表

地方		高雄市	岡山郡	鳳山郡	旗山郡	屏東郡	潮州郡	東港郡	恆春郡	總數
北海道	人數	80	2	2	3	48	3	9	0	147
	比率	0.52%	0.17%	0.11%	0.25%	0.84%	0.33%	1.16%	0.00%	0.53%
東北	人數	610	141	102	107	318	128	71	103	1,580
	比率	3.95%	11.86%	5.79%	8.79%	5.56%	14.17%	9.11%	12.12%	5.67%
關東	人數	1220	120	145	106	492	63	106	96	2,348
	比率	7.90%	10.09%	8.23%	8.71%	8.60%	6.98%	13.61%	11.29%	8.43%
中部	人數	1635	161	181	150	657	104	72	85	3,045
	比率	10.59%	13.54%	10.27%	12.33%	11.48%	11.52%	9.24%	10.00%	10.93%
近畿	人數	1521	48	137	62	706	42	45	44	2,605
	比率	9.85%	4.04%	7.78%	5.09%	12.34%	4.65%	5.78%	5.18%	9.35%
中國	人數	2315	156	166	127	756	89	93	73	3,775
	比率	15.00%	13.12%	9.42%	10.44%	13.21%	9.86%	11.94%	8.59%	13.55%
四國	人數	1083	38	63	49	264	41	47	31	1,616
	比率	7.02%	3.20%	3.58%	4.03%	4.61%	4.54%	6.03%	3.65%	5.80%
九州	人數	6973	523	966	613	2480	433	336	418	12,742
	比率	45.17%	43.99%	54.82%	50.37%	43.35%	47.95%	43.13%	49.18%	45.74%

（三）出生地

接下來我們來看學生的出生地，請見表 6。

在日籍學生的部分，每年約有七成的學生是在臺出生，也就是所謂的灣生，僅有一至二成的學生是在日本本國出生後來到臺灣，事實上，如果再仔細地觀察她們的「渡臺年月日」，便能發現這一至二成的非灣生裡，還有一部分是雖在日本本國出生，但幼時就隨家人來臺，而非在入學屏東高女前才來臺灣。換句話說，屏東高女的日籍學生絕大多數都是沒有日本本國生活經驗、在臺灣甚至屏東出生、成長的在地人。

另外還有少數學生在暹羅（泰國）、柔佛（英領馬來）或朝鮮出生，但人數極少。雖有部分學生未登錄出生地，人數也不多。

1921 年出生於暹羅的高橋二三子祖父為臺灣銀行暹羅盤谷（曼谷）支店長高橋求身，父親為高橋近信，該支店創立於 1919 年，支援當地日人經商的金融需求，1925 年終止業務。⁹⁰高橋二三子於此間出生，1933 年高橋近信任臺灣銀行屏東支店長，⁹¹故同年高橋二三子從千葉高女轉入屏東高女，1937 年高橋近信轉任臺灣銀行福州支店長而離開屏東，高橋二三子同年再轉至都城高女。

另一位則是 1941 年入學的鈴木起三。她出生於 1927 年，父親為熱帶特用樹種栽培事務所主任鈴木梓，另一位保證人為熱帶特用樹種栽培事務所首任所長佐佐木舜一。該事務所成立於 1941 年，位於屏東市，⁹²鈴木起三應是父親因公前往柔佛期間出生。而 1942 年入學的新田多惠子父親則是新田太郎屏東陸軍病院長，⁹³叔父為屏東農業學校教諭新田勉，出生於滿洲。1936 年屏東新設陸軍病院，新田太郎擔任院長，⁹⁴1937 年新田多惠子隨父親至屏東赴任而渡臺，不過在學期間轉出至他校，未於屏東高女畢業。

而臺籍學生的部分，若扣除未登錄出生地的學生，幾乎所有學生都是臺灣出生，這也是非常合理的現象。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在他地出生的臺籍學生雖然人數僅數人，但和在他地出生的日籍學生有一個顯著的差異，那就是臺籍學生在中國廈門、福州、汕頭出生。

⁹⁰ 名倉喜作，《臺灣銀行四十年誌》（東京：株式會社臺灣銀行，1939 年），頁 23。

⁹¹ 不撰著人，〈臺灣銀行 幹部異動 二十五日發表〉，《臺灣日日新報》1933 年 7 月 26 日，日刊 8 版。

⁹² 臺灣總督府熱帶特用樹種栽培事務所，《臺灣總督府熱帶特用樹種栽培事務所事業概況書》昭和十五年版（屏東：臺灣總督府熱帶特用樹種栽培事務所，1940 年），頁 1。

⁹³ 新田太郎，〈謝狀〉，《臺灣愛國婦人新報》87 號（1937 年 1 月），頁 13。

⁹⁴ 不撰著人，〈吉野丸遅れて入港〉，《臺灣日日新報》1936 年 8 月 14 日，日刊 11 版。

四位在中國出生的學生分別為 1922 年出生、1935 年入學屏東高女的劉椿茂、劉萱茂（應為雙胞胎）、1925 年出生、1938 年入學的劉並茂三姊妹，以及 1927 年出生的劉惠兒。

劉椿茂、劉萱茂及劉並茂三人的名字組合起來便是「椿萱並茂」，父母取名之用心由此可見一斑。其父劉德和為廈門日本總領館巡查部長，1937 年以前長年旅居廈門，劉萱茂甚至自小就讀於福州的日本人小學校，直至 1937 年母親始帶著女兒轉學回到屏東小學校尋常科就讀。

吳惠兒的父親為吳克己，克己為屏東知名的基督教家族吳葛的四男。克己畢業於總督府醫學校之後，前往日本留學，此後服務於福州博愛醫院，1929 年病逝於汕頭。

⁹⁵吳惠兒為其旅居汕頭期間所生。



⁹⁵ 不撰著人，〈屏東特訊／吳氏歸省〉，《臺灣日日新報》1925 年 7 月 21 日，夕刊 4 版。不撰著人，〈屏東街出身者。臺灣總督府技師汕頭博愛會醫院外科醫長從七位醫學士吳克己氏〉，《臺灣日日新報》1929 年 3 月 15 日，夕刊 4 版。

表 6：各年度臺、日籍學生出生地一覽表

年度	日籍								臺籍								合計
	本國	比率	臺灣	比率	他地	比率	不詳	比率	本國	比率	臺灣	比率	他地	比率	不詳	比率	
1932	21	27.63%	54	71.05%	0	0.00%	1	1.32%	0	0.00%	24	100.00%	0	0.00%	0	0.00%	100
1933	30	23.81%	94	74.60%	0	0.00%	2	1.59%	0	0.00%	54	100.00%	0	0.00%	0	0.00%	180
1934	34	19.88%	131	76.61%	1	0.58%	5	2.92%	0	0.00%	81	98.78%	0	0.00%	1	1.22%	253
1935	36	15.19%	181	76.37%	1	0.42%	19	8.02%	0	0.00%	106	94.64%	3	2.68%	3	2.68%	349
1936	25	10.29%	165	67.90%	1	0.41%	52	21.40%	0	0.00%	116	91.34%	3	2.36%	8	6.30%	370
1937	29	11.20%	177	68.34%	0	0.00%	53	20.46%	0	0.00%	120	90.91%	3	2.27%	9	6.82%	391
1938	38	14.62%	173	66.54%	0	0.00%	49	18.85%	0	0.00%	124	91.18%	4	2.94%	8	5.88%	396
1939	49	18.42%	168	63.16%	0	0.00%	49	18.42%	1	0.71%	118	83.69%	1	0.71%	21	14.89%	407
1940	59	21.45%	192	69.82%	1	0.36%	23	8.36%	3	2.10%	123	86.01%	2	1.40%	15	10.49%	418
1941	73	22.12%	229	69.39%	1	0.30%	27	8.18%	5	3.23%	134	86.45%	2	1.29%	14	9.03%	485
1942	83	23.18%	253	70.67%	2	0.56%	20	5.59%	4	2.34%	150	87.72%	1	0.58%	16	9.36%	529
1943	65	22.41%	203	70.00%	1	0.34%	21	7.24%	4	2.78%	136	94.44%	1	0.69%	3	2.08%	434
1944	51	25.00%	138	67.65%	1	0.49%	14	6.86%	2	1.90%	99	94.29%	0	0.00%	4	3.81%	309
1945	27	25.23%	69	64.49%	0	0.00%	11	10.28%	0	0.00%	48	94.12%	0	0.00%	3	5.88%	158

（四）居住地

表 7 為屏東高女各年度臺、日籍學生居住地一覽表。

從表 7 可知，日籍學生以居住在屏東市者最多，除了設校第一年（1932）佔約四成之外，其餘各年度均在四成至五成之間，不少年度超過半數的日籍學生住在屏東市。居住於屏東市內的臺籍學生比率雖然從初期的五成五至近六成逐漸減少為四成至四成五之間，但仍以居住於屏東市者為最大宗。若搭配後文對於學生出身家庭背景的分析，會發現日籍學生多數出身官公吏的家庭，臺人則以從事商業者為多，這些特質都反映在學生的居住地區上，屏東市係為官公吏密集且商業繁盛之地，再加上屏東高女位於屏東市，考量到就學的便利性，有近半數甚至超過半數的臺、日籍學生居住於屏東市內並不難理解。

此外還有幾處值得我們注意。第一，居住於高雄市的日籍學生在創校之初佔了 14.47%，但其比率隨即驟降，1933 年雖尚有 10.32%，然接下來的每一年均未達一成且逐年減少。至於來自高雄的臺籍學生人數都不多，大約皆維持 5% 上下，直至日治時期結束，皆未曾超過一成。屏東高女成立之初，當局曾發出提醒，若報考屏東高女經錄取，不可再報考高雄高女，由於兩校招生時間相近，當局的提醒等於告訴考生兩校只能擇一報考。或許是因為這個緣故，第一年招生時有不少來自高雄的考生報名，第二年開始，來自高雄市的學生人數開始下降，趨於穩定保持在不到一成，顯示屏東高女創校以後，主要仍以屏東地區的學生為招生對象。

其次，1940 年以後，居住於東港郡與潮州郡的日籍學生比率增加，臺籍學生部分則是來自東港郡者大致持平，來自潮州郡者增加。究其原因，臺灣西部幹線鐵路在 1941 年延伸至枋寮，提升了潮州、東港一帶的交通環境，也提高了就學的便利性，可能是因為鐵路通車的緣故，造成來自潮州郡及東港郡學生的學生略為增加。

第三，1933 年至 1944 年間，儘管人數不多，均有幾位從澎湖遠赴屏東來就讀的日籍學生，居住於澎湖的臺籍學生人數同樣不多，主要是在 1936 年至 1944 年赴屏東就讀。由於 1943 年以前，澎湖並無高女，因此女性若完成小公學校學業後，若要繼續升學，就必須渡海到本島來報考、就學。1943 年，澎湖廳設立馬公高女，有心升學的女性不須再遠赴臺灣讀書，觀察屏東高女的澎湖學生，人數在日治末期極少，1945 年甚至沒有來自澎湖的日籍學生。可見至少到了一九三〇年代，女子高等教育的需求旺盛，地方上若無可供升學的學校，有意進學的女性只好選擇報考鄰近的高女，然而一但各州廳陸續出現地方所屬的高女，女學生便會各自就近就讀當地的高女，由於全臺各地的高女均依循相同的法規所設立，無論是從哪一所高女畢業，畢業生都擁有相

同的學歷與資格的，若選擇在地的高女就讀，無論是時間或金錢，都可有效節省就學的成本，除非遇有特殊的情況，實無必要特別報考遠地的學校。

第四，來自岡山郡及恆春郡的學生比例極低。1932 年屏東高女創校時，岡山郡包含岡山街、阿蓮庄、路竹庄、湖內庄、彌陀庄、左營庄、楠梓庄、燕巢庄、田寮庄。1940 年左營庄併入高雄市，1943 年楠梓庄分割併入高雄市、岡山街、燕巢庄。這些地區今日皆屬於高雄市所轄，在日治時期，岡山郡也緊鄰高雄市，推測學生於小公學校畢業後，若有意繼續升學，可能會優先考慮報考高雄高女，而非地理位置較遠的屏東高女。不過這個推測需要進一步檢證高雄高女學生的出身背景才能驗證。

另外，至於恆春郡，這除了是因為它的地理位置較遠之外，推測可能也與恆春郡內有極大面積屬於「蕃地」有關。如前所述，1941 年〈國民學校令〉發布以前，原住民學童就讀的是蕃人公學校或蕃童教育所，無論是學制、學科、教育目的或使用的教科書，均與日人學童及漢人學童不同。且成績優秀的學生在畢業後會直接被學校延聘而留校服務，升學機會與意願皆不高，故來自恆春的學生中，日籍多於臺籍，若進一步檢視學生族群背景，便會發現其中無一是原住民。



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

KAOHSIUNG MUSEUM OF HISTORY

表 7：各年度臺、日籍學生居住地一覽表

年度	1932		1933		1934		1935		1936		1937		1938		1939		1940		1941		1942		1943		1944		1945	
	日 人	臺 人	日 人	臺 人	日 人	臺 人	日 人	臺 人	日 人	臺 人	日 人	臺 人	日 人	臺 人	日 人	臺 人	日 人	臺 人	日 人	臺 人	日 人	臺 人	日 人	臺 人	日 人	臺 人	日 人	臺 人
高雄市	11	1	13	2	15	3	21	7	23	6	23	5	18	4	12	4	13	6	19	10	22	11	16	10	9	8	2	3
比率(%)	14.47	4.17	10.32	3.70	8.77	3.66	8.86	6.25	9.47	4.72	8.88	3.79	6.95	2.94	4.51	2.84	4.73	4.20	5.76	6.45	6.14	6.43	5.52	6.94	4.41	7.62	1.87	5.88
屏東市	31	14	64	30	95	44	124	53	134	58	139	60	145	60	149	65	146	62	178	64	199	76	161	63	116	45	62	26
比率(%)	40.79	58.33	50.79	55.56	55.56	53.66	52.32	47.32	55.14	45.67	53.67	45.45	55.98	44.12	56.02	46.10	53.09	43.36	53.94	41.29	55.59	44.44	55.52	43.75	56.86	42.86	57.94	50.98
旗山郡	6	0	9	1	11	1	14	4	13	5	15	7	14	11	15	10	17	10	21	9	20	6	17	4	12	3	5	1
比率(%)	7.89	0	7.14	1.85	6.43	1.22	5.91	3.57	5.35	3.94	5.79	5.30	5.41	8.09	5.64	7.09	6.18	6.99	6.36	5.81	5.59	3.51	5.86	2.78	5.88	2.86	4.67	1.96
岡山郡	2	0	2	0	2	2	3	4	1	5	2	4	2	3	5	3	3	4	3	7	2	8	1	7	1	5	0	1
比率(%)	2.63	0	1.59	0	1.17	2.44	1.27	3.57	0.41	3.94	0.77	3.03	0.77	2.21	1.88	2.13	1.09	2.80	0.91	4.52	0.56	4.68	0.34	4.86	0.49	4.76	0	1.96
屏東郡	1	2	4	2	5	7	5	10	4	10	5	14	8	13	9	11	12	13	8	13	9	13	7	12	5	9	5	4
比率(%)	1.32	8.33	3.17	3.70	2.92	8.54	2.11	8.93	1.65	7.87	1.93	10.61	3.09	9.56	3.38	7.80	4.36	9.09	2.42	8.39	2.51	7.60	2.41	8.33	2.45	8.57	4.67	7.84
鳳山郡	6	2	10	3	12	4	19	8	20	10	20	11	18	14	19	12	24	13	27	17	24	16	17	14	13	10	6	4
比率(%)	7.89	8.33	7.94	5.56	7.02	4.88	8.02	7.14	8.23	7.87	7.72	8.33	6.95	10.29	7.14	8.51	8.73	9.09	8.18	10.97	6.70	9.36	5.86	9.72	6.37	9.52	5.61	7.84
東港郡	4	1	4	6	10	9	16	12	15	15	18	17	16	18	17	18	22	19	29	18	30	19	24	16	15	11	7	4
比率(%)	5.26	4.17	3.17	11.11	5.85	10.98	6.75	10.71	6.17	11.81	6.95	12.88	6.18	13.24	6.39	12.77	8.00	13.29	8.79	11.61	8.38	11.11	8.28	11.11	7.35	10.48	6.54	7.84
潮州郡	2	1	5	6	5	7	11	8	13	12	18	9	21	8	22	11	20	10	22	10	34	14	29	12	21	9	15	6
比率(%)	2.63	4.17	3.97	11.11	2.92	8.54	4.64	7.14	5.35	9.45	6.95	6.82	8.11	5.88	8.27	7.80	7.27	6.99	6.67	6.45	9.50	8.19	10.00	8.33	10.29	8.57	14.02	11.76
恆春郡	2	1	2	3	5	3	7	3	9	3	12	2	11	3	8	3	6	2	3	1	5	0	5	0	2	1	2	0
比率(%)	2.63	4.17	1.59	5.56	2.92	3.66	2.95	2.68	3.70	2.36	4.63	1.52	4.25	2.21	3.00	2.13	2.18	1.40	0.91	0.54	1.40	0	1.72	0	0.98	0.95	1.87	0
臺北州	2	0	2	1	1	1	3	2	2	1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比率(%)	2.63	0	1.59	1.85	0.58	1.22	1.27	1.79	0.82	0.79	0.39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新竹州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比率(%)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臺中州	0	1	0	0	0	0	4	0	3	0	2	0	1	0	0	0	0	0	1	1	1	2	1	2	1	2	0	1
比率(%)	0	4.17	0	0	0	0	1.69	0	1.23	0	0.77	0	0.39	0	0	0	0	0	0.30	0.54	0.28	1.17	0.34	1.39	0.49	1.90	0	1.96
臺南州	6	1	6	0	5	1	5	1	2	1	1	2	1	1	2	1	1	0	2	0	1	0	1	0	0	0	0	0
比率(%)	7.89	4.17	4.76	0	2.92	1.22	2.11	0.89	0.82	0.79	0.39	1.52	0.39	0.74	0.75	0.71	0.36	0	0.61	0	0.28	0	0.34	0	0	0	0	0
花蓮港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比率(%)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臺東	1	0	1	0	1	0	1	0	0	0	1	0	2	0	3	0	3	0	3	0	2	0	0	0	0	0	0	0
比率(%)	1.32	0	4.17	0	0.58	0	0.42	0	0	0	0.39	0	0.77	0	1.13	0	1.09	0	0.91	0	0.56	0	0	0	0	0	0	0
澎湖	0	0	1	0	2	0	1	0	2	1	2	1	1	1	3	2	5	2	8	3	5	3	4	2	3	1	0	0
比率(%)	0	0	4.17	0	1.17	0	0.42	0	0.82	0.79	0.77	0.76	0.39	0.74	1.13	1.42	1.82	1.40	2.42	1.94	1.40	1.75	1.38	1.39	1.47	0.95	0	0
其他	0	0	1	0	1	0	1	0	1	0	0	0	0	0	0	0	2	1	5	1	4	2	4	2	3	1	0	1
比率(%)	0	0	4.17	0	0.58	0	0.42	0	0.41	0	0	0	0	0	0	0	0.73	0.70	1.52	0.54	1.12	1.17	1.38	1.39	1.47	0.95	0	1.96
不詳	2	0	2	0	1	0	2	0	1	0	0	0	1	0	2	1	1	1	1	1	0	1	3	0	3	0	3	0
比率(%)	2.63	0	1.59	0	0.58	0	0.84	0	0.41	0	0	0	0.39	0	0.75	0.71	0.36	0.70	0.30	0.65	0	0.58	1.03	0	1.47	0	2.80	0
小計	76	24	126	54	171	82	237	112	243	127	259	132	259	136	266	141	275	143	330	155	358	171	290	144	204	105	107	51

（五）轉出入退休學

接著我們觀察學生轉出、轉入、退學及休學的情形。

各年度《臺灣總督府學事年報》登載屏東高女轉入情形，但年報裡僅註記轉入生人數，並未登錄轉出及休學的人數，未能完整反映學生異動的情形，因此校方保存的學籍資料仍有其參考價值。

表 8 為屏東高女各年度臺、日籍學生轉出入退休學人數一覽表。從臺、日籍學生的異動率來看，整體而言，臺籍學生的異動人數遠遠低於日籍學生，除了第一年的轉退學人數比率較高之外，其餘各年度均低，其中甚至有幾個年度全無異動。相反地，日籍學生的異動率每年度均在一成上下，只有最後兩個年度（1944、1945）較低，不過 1942 年之後，因學籍卡的謄錄未能落實，無法確認再學與否的學生人數增加，僅能從學籍簿保存情形推估可能在學（學籍卡未被抽存至除籍簿，或核對畢業生臺帳），故 1944、1945 年度的異動率可能未能完全準確表現真實情形，僅供參考。

若進一步細究臺籍學生的異動原因，會發現初期學生因為死亡或結婚而退學，僅有零星個案因為家境不佳而休、退學，中止學業；其後異動的原因多是因為轉至日本內地或其他地區，儘管轉換學校，卻仍能持續學習。至於日籍學生，雖然也有少數學生因健康情形不良或家境不佳等不可抗力的理由而休、退學，但絕大多數異動的原因是轉至島內其他地區，其次為轉至日本內地各地高女。如果配合後文統計的學生父兄職業來綜合觀察，輔以學籍卡上的註記來看，日籍學生的父兄從事官公吏的比率極高，學生通常為了配合父親轉調他地而轉至島內其他高女，或是因為父兄死亡、保證人或戶主變更而轉學或返回日本內地，顯示父兄的角色仍相當程度地左右了屏東高女學生的教育環境。然而無論是哪一種情況，學生都不因轉學而中斷學業。

表 8：各年度臺、日籍學生轉出入退休學人數一覽表

				1932	1933	1934	1935	1936	1937	1938	1939	1940	1941	1942	1943	1944	1945	
入校	臺人			1	0	0	0	0	1	0	0	0	0	1	3	0	0	
		小計		1	0	0	0	0	1	0	0	0	0	1	3	0	0	
	日人			6	3	10	8	11	3	5	15	9	9	11	3	0	0	
		小計		6	3	10	8	11	3	5	15	9	9	11	3	0	0	
	合計			7	3	10	8	11	4	5	15	9	9	12	6	0	0	
離校	臺人	休學	體弱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家庭因素	0	1	1	0	1	0	0	0	0	0	0	0	0	0	
		退學	死亡	2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結婚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家境不佳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其他	0	0	1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不詳	0	0	0	0	1	0	0	1	0	0	0	0	0	0	0
			轉出	轉至內地	0	0	0	0	0	0	0	2	1	1	0	0	0	0
		轉至島內		0	0	0	0	2	0	0	1	1	2	0	1	1	0	0
		家境不佳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不詳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小計			3	2	2	1	4	1	0	5	2	3	0	2	1	0
	日人	休學	體弱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不詳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退學	家境不佳	2	1	0	1	1	0	0	0	0	0	0	0	0	0	0
			家庭因素	0	0	0	0	0	1	2	0	0	1	0	0	0	0	0

			體弱	0	0	0	0	0	0	1	0	0	0	0	1	0	0	
			死亡	0	0	0	0	1	1	0	1	0	0	0	1	0	0	
			不詳	2	1	1	4	0	0	2	1	0	2	1	0	0	0	
		轉出	轉至島內	1	12	5	5	15	18	6	9	10	13	11	8	2	2	
			轉至內地	3	6	5	3	5	3	5	7	2	6	3	0	0	0	
			轉至他地	0	0	0	1	1	0	0	0	3	0	0	0	0	0	
			不詳	0	1	5	2	0	0	0	1	1	0	2	0	0	0	
		不詳	不詳	0	1	1	0	1	2	0	0	2	1	5	8	2	0	
		小計			8	22	17	16	24	25	17	19	18	23	22	18	5	2
		合計			11	24	19	17	28	26	17	24	20	26	22	20	6	2
總計			18	27	29	25	39	30	22	39	29	35	34	26	6	2		
臺人在學人數			24	54	82	113	127	132	136	141	143	163	171	144	105	51		
異動率			16.67%	3.70%	2.44%	0.88%	3.15%	1.52%	0.00%	3.55%	1.40%	1.84%	0.58%	3.47%	0.95%	0.00%		
日人在學人數			76	126	171	236	243	259	260	266	275	322	358	290	309	107		
異動率			18.42%	19.84%	15.79%	10.17%	14.40%	10.81%	8.46%	12.78%	9.82%	9.94%	9.22%	7.24%	1.62%	1.87%		

（五）家庭背景/家長職業

最後是分析屏東高女學生的出身家庭背景。

本文使用學籍卡所登錄的學生家長職業來進行分析，以父親職業為優先，若無登錄父親職業，則以兄長、祖父或叔父的職業次之，再其次為母親職業。

選擇以這樣的序列來分析學生家長職業有兩個理由。其一，學生入學時，學籍卡上需登錄戶主及兩位保證人的資料，而大多數學生的戶主或保證人之一就是父親，若因父親死亡、長居外地等原因而無法擔任戶主或保證人時，則另由祖父、叔父或兄長擔任戶主或保證人，只有極少數的個案為母親或義父擔任戶主或保證人，因此父親的背景資料相對明確而完整，足資判斷學生的出身，並依這樣的順序來統計分析。

其二，如前所述，屏東高女學生經常隨著父兄的轉職或死亡而異動學籍，顯示日治時期家庭內父兄的角色仍對女兒或姊妹的受教情形具備相當程度的影響力。

本研究的統計結果請參見表 9。表 9 共將學生家長的職業分成商業、官公吏、軍職、農業、會社員/受雇者、醫療業、法律相關職業、新聞媒體業、貸地業/貸家業/貸付業、宗教人員、金融業、勞動製造業及其他等十三大類，另有無職及不詳。商業係指從事各種商業買賣者，諸如材木商、醬油商、菸酒食鹽賣捌人、精米商、肥料商等；官公吏則指在政府機關服務者，如街庄長、役場書記、警察官吏、公立學校教師、鐵道站員等。會社員/受雇者則指在製糖會社等民間企業受雇者；醫療業主要為醫師及產婆；法律相關職業係為律師及代書人；貸地業/貸家業/貸付業為地主或房東，以出租土地或房屋賺取租金，或放貸收取利息者。此外，勞動製造業主要為各種請負業（承包商）或生產製造者，如土木請負、印刷業、罐頭製造、運送業、寫真業者等，其他則包含飲食業、料理業、旅宿業、學生等服務業或不屬於前述各行業類別者。

必須說明的是，學籍卡資料亦有其限制。由於每位戶主及保證人僅能登記一項職業，因此無法呈現當事人身分的多樣性，可能造成偏誤。例如登記為從商者可能身兼地方上的保正或組合理事，而身為醫師也可能具備宣教師的身分，況且有些人即使登記其職業為農業或商業，事實上他們也不是一般的商人或務農者，而擁有其他更為人知的響亮職銜，例如 1935 年入學的陳文里，父親陳總鎮登記職業為「農」，實際上他是九塊庄助役，也是農會總會代表人；⁹⁶又如 1938 年入學的石綿，其父石水在學籍卡上登記為米商，實際上身兼東港信用組合理事，也是東港街協議員。⁹⁷而 1940 年入學

⁹⁶ 臺灣新民報社，《臺灣人士鑑》1934 年版，頁 132。

⁹⁷ 臺灣新民報社，《臺灣人士鑑》1934 年版，頁 97。

的彭靜妙則是彭清泉之女，二二八事件後代表人民與當局協商的高雄知名醫師彭清靠就是他的哥哥。彭清泉是醫師，但在彭靜妙的學籍卡父親的職業欄上登記的是貸地業。只是，受限於時間與資料，我們無法一一舉出每位家長職業的多重性，僅能將登記在學籍卡上的職業作為依據來分析其屬性，進一步勾勒學生出身在哪一種社會位階的家庭。

從數據分析上來看，從商的家長比率臺籍多於日籍，每年約有三成的臺籍學生來自經商的家庭，且 1934 年至 1939 年間，來自商人家庭的比率超過三成以上甚至高達近四成。不過這個比率在 1939 年以後開始下降，約維持在兩成上下。從商的日籍家長卻除了創校前三年從商比率微幅高於一成之外，其餘各年度均不及一成，最低時甚至僅佔 3、4%。

從事公職的家長則剛好相反。每年約有三至四成的日籍學生出身官公吏家庭，除了 1934 年的比率微幅低於會社員之外，各年度都是各種職業類別中從業比率最高的，1938 年至 1940 年間官公吏家庭出身的比率甚至逼近半數，非常集中。反觀臺籍家長，屏東高女創校以來直至 1939 年，在公部門就業的臺籍學生的家長比例不高，低時不到 5%，其後雖緩步增加，但仍不到一成，創校當年甚至僅有 1 人擔任基層公職；不過 1939 年首度突破一成之後，很快地就超過二成，此後大致均維持二成左右。

從事軍職的家長也很明顯全為日人。屏東擁有全臺唯一的第八飛行聯隊，因此有些家長擔任軍職，但其中全無臺籍家長，是因為 1945 年臺灣實施徵兵制以前，臺人不具備從軍資格的緣故。

從事農業的家長無論人數或比率均以臺人為多，臺籍部分，務農的家長約佔所有臺籍家長的一至二成左右，不過在一九三〇年代中期之後緩緩減少；相反地，職業登載為農業的日籍家長人數極少，大約僅佔所有日籍家長的 1、2% 左右。

會社員或民間會社的受雇者則是日籍多於臺籍，日籍的比率大約為二成五至三成左右。作為臺灣農業重鎮的屏東，主要的大型農產加工業為製糖與鳳梨罐頭製造，生產鳳梨罐頭的臺灣鳳梨株式會社在行政區上雖然屬於高雄大樹的九曲堂，但實則位於高屏溪畔，從地理位置上看，和屏東僅一橋之隔，這些需要大量人力的農產加工作業提供在地居民龐大的工作機會，不過臺籍勞工似乎並未因此受惠，反而是日籍學生家長中有非常高比例任職於臺灣糖業株式會社及臺灣鳳梨合同會社，其他也有一些服務於臺灣電力株式會社、青果組合等各種民間組織。

至於從事醫師、產婆等醫療工作的家長都不算多，不過從事醫療業的臺籍家長人

數與比率都多於日籍家長。

從事法律與媒體相關行業的家長人數也不多，僅個位數。從事法律相關行業者只有一位臺籍菁英陳金能為執業律師，其餘皆為代書人，或擔任法院書記，陳金能律師為東港人，畢業日本中央大學法科，可惜在二二八事件時遇難。媒體業從業人員均為記者，臺籍僅 1 名，為阮朝日，出身東港阮家，當時為臺灣新民報社社員，長女阮盼於 1935 年入學屏東高女。阮朝日同樣於二二八事件中遇害。

登記為貸地業／貸家業的臺籍家長比率佔了所有臺籍家長的一成五至二成左右，日籍家長卻僅有寥寥數人。要靠出租田地或房產來收取租金維生須擁有私有的田地或住宅，在當地已生活數十年甚至百年的臺籍家庭世代在此拓墾、定居，掌握土地與房產，本來就較日治以後才來到屏東的日人更有這樣的資源，因此不難理解為何身為地主或屋主的臺籍家長比率也遠高於日籍家長。

至於神職人員，無論臺、日籍，人數都很少，主要是屏東吳葛家族的相關成員，如牧師吳媽西、汪培英等人。

金融業、勞動製造業及其他行業的從業者人數也偏少。另有少數家長無職業或職業不詳。

整體而言，無論臺籍或日籍家長，集中於特定業種的現象很明顯，日籍部分，絕大多數家長擔任官公吏或服務於大型會社，佔全體日籍家長的六成以上，從事這些職業的家長比率在 1937 年一舉突破七成之後，直至日治時期結束均未曾低於七成，1938、1939 年該比率甚至超越七成五。相對於此，從事其他行業的日籍家長比率非常低，不少職業的從業者長年均僅個位數甚至是零，日籍學生集中出身於官公吏與會社員家庭的現象可說是相當顯著。

臺籍家長則以從商、貸地與貸屋業較為明顯，一九三〇年代中期以後，務農家庭的比率減少，同時期官公吏家庭的比率增加。而無論臺、日人，出身從事農業、製造業或勞力密集的服務業等一級產業的學生家長比例都不高，顯示屏東高女的學生多數來自中、上層社會的家庭。

學者王御風曾分析 1934、1937 及 1941 等三個版本《臺灣人士鑑》中登錄的屏東地區人物之職業，其結果以產業組合幹部最多，其次為官員，接著依序是醫師、商人、教師、實業家、臺糖、法律從業者、新聞從業者、消防及農業。⁹⁸組合幹部、臺糖員工在本文中被歸類為會社員，官員、教師則屬於官公吏，從屏東女學生家長的職業分析來看，大致上與王御風的分析吻合，可見到了一九三〇年代，屏東在地領導階層

⁹⁸ 王御風，〈日治至戰後的社會領導階層與流動〉，《重修屏東縣志》，頁 66。

已經脫離傳統以農業為主的大地主，成為以商業、官公吏為主力的組成，而屏東高女的學生出身相當程度成為屏東在地領導階層的縮影。同時，一九三〇年代中期屏東地區出身者在獲得新式教育的學歷與知識後，就業時傾向以教師等收入穩定、社會地位較高的職業為優先，因此服務於公部門的臺籍家長比率漸增而務農者比率減少。

另外，有關臺、日籍家長的職業偏重現象，山本禮子曾分析 1938 年彰化高女、高雄高女及 1942 年蘭陽高女三所學校的父兄職業後指出，無論哪一所學校，日籍學生的父兄皆超過五成為官公吏或軍人，其次是會社員或從事商業者，而三校的臺灣人家長則有近三成從事商業，彰化高女的家長有近四成從事農業，另兩校從農的家長人數比率則低；彰化高女、高雄高女的學生家長也有一成餘是醫師或醫業從事者，接著才是官公吏及會社員。她認為這證明了大多數子女的父母從事的是生活安定度較高的職業，且臺、日人之間在職種的選擇上有巨大的差異。⁹⁹山本禮子也曾對有過日治時期高女經驗的臺、日籍女性發送問卷調查，調查中有關父親的職業，臺籍女性的回答同樣是以商業佔 26% 最多，其次是醫師（15%）、製造業（10%）；日籍女性則是官吏、會社員及銀行員佔了六成，從事同樣職業的臺籍家長僅約兩成上下。¹⁰⁰

將之對照屏東高女家長職業，大致上日籍家長還是以官公吏最多，會社員與從業者次之，臺籍家長則是從業者不少，這些趨勢都是一樣的。不過因其歷史發展而以臺籍學生為主的彰化高女有極高比例的家長從事農業則與屏東高女非常不同，顯示各校因其不同的創校緣由、校史脈絡及地區的差異，也反映在父兄職業上。

⁹⁹ 山本禮子，《殖民地台灣の高等女学校研究》，頁 86-88。

¹⁰⁰ 山本禮子，《殖民地台灣の高等女学校研究》，頁 113。

表 9：屏東高女各年度臺、日籍學生家長職業一覽表

		商	官公吏	軍	農	會社員/ 受雇	醫療	法律相關	新聞媒體	貸地業/ 貸家業	宗教	金融業	勞動製造 業	其他	無職	不詳	合計
1932	臺人	7(29.17)	1(4.17)	0(0)	2(8.33)	3(12.5)	1(4.17)	2(8.33)	0(0)	3(12.5)	1(4.17)	1(4.17)	3(12.5)	0(0)	0(0)	0(0)	24(100)
	日人	12(15.79)	26(34.21)	3(3.95)	1(1.32)	21(27.63)	2(2.63)	2(2.63)	1(1.32)	0(0)	0(0)	0(0)	3(3.95)	1(1.32)	3(3.95)	1(1.32)	76(100)
1933	臺人	20(37.04)	4(7.41)	0(0)	6(11.11)	5(9.26)	4(7.41)	1(1.85)	0(0)	7(12.96)	1(1.85)	1(1.85)	4(7.41)	1(1.85)	0(0)	0(0)	54(100)
	日人	17(13.49)	39(30.95)	4(3.17)	3(2.38)	38(30.16)	2(1.59)	6(4.76)	1(0.79)	0(0)	0(0)	1(0.79)	6(4.76)	3(2.38)	3(2.38)	3(2.38)	126(100)
1934	臺人	27(32.93)	4(4.88)	0(0)	15(18.29)	7(8.54)	5(6.10)	1(1.22)	0(0)	14(17.07)	1(1.22)	1(1.22)	6(7.32)	1(1.22)	0(0)	0(0)	82(100)
	日人	23(13.45)	52(30.41)	5(2.92)	4(2.34)	54(31.58)	2(1.17)	6(3.51)	1(0.58)	2(1.17)	0(0)	1(0.58)	8(4.68)	3(1.75)	9(5.26)	1(0.58)	171(100)
1935	臺人	38(33.93)	7(6.25)	0(0)	20(17.86)	9(8.04)	8(7.14)	1(0.89)	1(0.89)	17(15.18)	2(1.79)	1(0.89)	7(6.25)	1(1.79)	0(0)	0(0)	112(100)
	日人	31(13.08)	90(37.97)	6(2.53)	5(2.11)	62(26.16)	4(1.69)	7(2.95)	2(0.84)	2(0.84)	1(0.42)	2(0.84)	9(3.80)	4(1.68)	11(4.64)	1(0.42)	237(100)
1936	臺人	44(34.65)	7(5.51)	0(0)	20(15.75)	10(7.87)	10(7.87)	1(0.79)	1(0.79)	20(15.75)	2(1.57)	0(0)	7(5.51)	1(0.79)	0(0)	4(3.15)	127(100)
	日人	22(9.05)	108(44.44)	7(2.88)	4(1.65)	62(25.51)	3(1.23)	5(2.06)	2(0.82)	2(0.82)	0(0)	4(1.65)	9(3.70)	3(1.23)	9(3.70)	3(1.23)	243(100)
1937	臺人	41(31.06)	9(6.82)	0(0)	18(13.64)	10(7.58)	9(6.92)	1(0.76)	1(0.76)	24(18.18)	2(1.52)	2(1.52)	8(6.06)	1(0.76)	0(0)	6(4.55)	132(100)
	日人	20(7.72)	118(45.56)	6(2.32)	3(1.16)	70(27.03)	3(1.16)	2(0.77)	2(0.77)	3(1.16)	2(0.77)	3(1.16)	9(3.47)	3(1.16)	13(5.02)	2(0.77)	259(100)
1938	臺人	45(31.91)	14(9.93)	0(0)	11(7.80)	14(9.93)	10(7.09)	2(1.42)	1(0.71)	23(16.31)	2(1.42)	3(2.13)	8(5.67)	1(0.71)	0(0)	7(4.96)	141(100)
	日人	13(5.02)	126(48.65)	6(2.32)	3(1.16)	69(26.64)	6(2.32)	4(1.54)	0(0)	1(0.39)	2(0.77)	0(0)	12(4.63)	4(1.54)	6(2.32)	7(2.70)	259(100)
1939	臺人	47(33.33)	19(13.48)	0(0)	9(6.38)	8(5.67)	9(6.38)	2(1.42)	0(0)	26(18.44)	1(0.71)	4(2.84)	5(3.55)	1(0.71)	0(0)	10(7.09)	141(100)
	日人	10(3.76)	130(48.87)	7(2.63)	4(1.50)	72(27.07)	6(2.26)	4(1.50)	1(0.38)	1(0.38)	2(0.75)	0(0)	13(4.89)	3(1.13)	4(1.50)	9(3.38)	266(100)
1940	臺人	38(26.57)	28(19.58)	0(0)	8(5.59)	8(5.59)	11(7.69)	2(1.40)	0(0)	28(19.58)	0(0)	6(4.20)	6(4.20)	2(1.40)	0(0)	6(4.20)	143(100)
	日人	12(4.36)	128(46.55)	8(2.91)	4(1.45)	79(28.73)	6(2.18)	4(1.45)	2(0.73)	2(0.73)	3(1.09)	1(0.36)	13(4.73)	2(0.73)	5(1.82)	6(2.18)	275(100)
1941	臺人	32(20.65)	37(23.87)	0(0)	12(7.74)	12(7.74)	14(9.03)	3(1.94)	0(0)	24(15.48)	1(0.65)	4(2.58)	9(5.81)	2(1.29)	0(0)	5(3.23)	155(100)
	日人	16(4.85)	146(44.24)	17(5.15)	4(1.21)	94(28.48)	6(1.82)	4(1.21)	2(0.61)	1(0.30)	3(0.91)	1(0.30)	20(6.06)	5(1.52)	4(1.21)	7(2.12)	330(100)
1942	臺人	33(19.30)	41(23.98)	0(0)	12(7.02)	16(9.36)	17(9.94)	2(1.17)	0(0)	26(15.20)	2(1.17)	3(1.75)	10(5.85)	5(2.92)	0(0)	4(2.34)	171(100)
	日人	20(5.59)	157(43.85)	23(6.42)	5(1.40)	102(28.49)	4(1.12)	1(0.28)	2(0.56)	2(0.56)	3(0.84)	2(0.56)	19(5.31)	8(2.23)	3(0.84)	7(1.96)	358(100)
1943	臺人	25(17.36)	33(22.92)	0(0)	9(6.25)	16(11.11)	15(10.42)	2(1.39)	0(0)	22(15.28)	2(1.39)	3(2.08)	10(6.94)	5(3.47)	0(0)	2(1.39)	144(100)
	日人	16(5.52)	124(42.76)	18(6.21)	4(1.38)	82(28.28)	3(1.03)	1(0.34)	0(0)	2(0.69)	3(1.03)	3(1.03)	18(6.21)	7(2.41)	2(0.69)	7(2.41)	290(100)
1944	臺人	18(17.14)	23(21.90)	0(0)	7(6.67)	16(15.24)	12(11.43)	1(0.95)	0(0)	12(11.43)	2(1.90)	2(1.90)	7(6.67)	4(3.81)	0(0)	1(0.95)	105(100)
	日人	11(5.76)	83(43.46)	12(6.28)	3(1.57)	51(26.70)	3(1.57)	0(0)	0(0)	1(0.52)	2(1.05)	2(1.05)	12(6.28)	7(3.66)	0(0)	4(2.09)	191(100)
1945	臺人	10(19.61)	9(17.65)	0(0)	3(5.88)	8(15.69)	6(11.76)	0(0)	0(0)	8(15.69)	1(1.96)	1(1.96)	2(3.92)	3(5.88)	0(0)	0(0)	51(100)
	日人	4(3.74)	46(42.99)	6(5.60)	3(2.80)	32(29.91)	2(1.87)	0(0)	0(0)	1(0.93)	1(0.93)	1(0.93)	3(2.80)	4(3.74)	0(0)	4(3.74)	107(100)

五、屏東高女與在地社會的連結

屏東這個位於臺灣最南端的地區，有山、有海、有平原，除了數百年來居住於此地的排灣族、魯凱族等原住民族之外，隨著先民拓墾的腳步，來自漳、泉一代的福佬人、以及嘉應、大埔、潮汕來的客家人，在清治時期先後落腳屏東平原並形成各地的聚落，依其族群、山河、聚落民眾的聚合互動、行政區域的劃分等人文與地理分界，自然發展出在地社會。

另一方面，我們也不能忘記的是，除了在此地綿延百年甚至數百年、由臺人組成的在地社會之外，日治以後，隨著日人的移入，屏東平原上也逐漸建立起由日人構築的人際網絡，他們有的人在郵政、鐵路、學校、州廳及街庄役場擔任各種不同層級的公職，也有的人在製糖會社、第八飛行聯隊服務，更有一些散居於平原各地，以種植菸草為生的移民村民，這些在臺日人網絡的組成，和臺人社會一樣包含各種不同的階層。

本文將分述屏東高女與在地臺人社會與日人社會的連結。

（一）屏東高女與屏東地區臺人社會

學者陳秋坤用四種近代社會民間自主力量的「社會力」來解釋建構屏東地區的權力結構，第一種是土豪家族，此類力量主要是緣於土地拓墾，拓墾家族為了維護公共利益、家族安全或地方治安而擁有私人武力，甚至能夠收取租金，而各拓墾勢力透過聯姻等方式進一步擴大影響力，成為地方上即使是官府也無法忽視的力量。

第二種是客莊「六堆」民團勢力。「六堆」係指清代初期來自廣東潮州府嘉應和大埔等地的客家移民，民眾為因應地方械鬥而自組團練組織，一方面配合官方的要求協助平亂，一方面維持地方治安。第三種是宗教信仰圈的武裝自衛儀式。陳秋坤以福佬人聚落萬丹為例，這裡的居民建立土地公廟、上帝廟（萬泉寺）、祀奉媽祖的「萬惠宮」等地方公廟，同時為了保護街庄商店和住家安全而由各角頭的居民出錢出力排練「宋江陣」陣式，法會期間，則利用上帝公出巡到信仰圈內村庄「遶境」，展示「陣頭」，藉此連結情誼，是宗教祭祀圈與庄民自警武力的結合。

第四種則是恆春半島的土著傳統領域。陳秋坤以 1867 年發生於恆春沿岸的外籍船難羅妹號事件、1971 年的牡丹社事件等外事糾紛為例，從任豬勝束社土目卓杞篤能夠與外國勢力簽訂合約，並經常以領主的姿態巡視漢人村庄，且當

1875 年海關總署計畫在恆春半島鵝鑾鼻建立燈塔時，還曾出資本地原住民購買塔臺基地，認為原住民在當地具有一定地方勢力。¹⁰¹

陳秋坤整理了清治時期統御屏東地區地方勢力的類型與建立過程，說明了早在日治以前，這裡即是由原住民族、福佬人及客家人所盤據的社會結構，而各勢力擁有自己的武裝組織則讓這樣的結構更為穩固。

日治以後，日本殖民者挾帶著優勢武力進入屏東平原，伴隨著日本大型資本的移入，以及民間日人的定居，這片土地上多了另一群居民，在地社會的結構較先前更為複雜。

日本殖民政府入臺後，透過產權登記制度來建立私有產權，瓦解了過往以信仰圈或民團組織所建構起來的在地社會力量，同時透過賦予鄉紳、區街庄長、保正等地方公職來拉攏前清時期已具影響力的地方領導階層，在地社會的權力集團逐漸由信仰圈或民團組織轉變為由傳統士紳或領導者為主的地方家族勢力。此外，陳秋坤也認為，當製糖會社等大型日資進駐屏東平原之後，地方家族資本也會轉投資這些新興事業，形成國家權力與地方資本結合的現象。¹⁰² 因此我們可以看到屏東地區在清治時期因土地開墾、製糖、經商或通過科舉考試獲得功名等，奠定家族事業基礎的大家族頭人，到了日治時期後，陸續被延攬為參事等地方要職，藉由擔任地方社會公職參與公共事務，延續其影響力的現象。

那麼，家族和個人教育之間的關係是什麼呢？家族作為一種條件或資源，不只是經濟條件寬裕，足以支付子女的學資、住宿、交通等相關教育成本，更重要的是，由於保正、庄長、助役或是各組合的代表取締役等家族長輩所承擔的地方要職，以及商業、貸地等家裡所經營的經濟事業，通常由父親、兒子或孫子等男性子嗣所掌理，對於男性子嗣的教育態度有時帶有培育接班人的目的導向，實務上也的確常看到父死子繼或兄故弟承的現象，這反而讓女性子嗣得到自外於家族事業經營的空間，受教育的目的及教育為個人生命所帶來的影響都明顯與男性子嗣不同。

此外，大家族的成員對於新式教育較高的接受度也是另一種的資本，接受新式教育的父母，親身享受到優渥的物質環境、較高尚的社經地位與名聲、較多元的職業選擇等新式教育所帶來的潤澤，也較傾向讓子女接受新式高等教

¹⁰¹ 陳秋坤等著，《重修屏東縣志》，頁 122。

¹⁰² 陳秋坤等著，《重修屏東縣志》，頁 209。

育，即使女兒未來未必成為家族事業的繼承者，但他們依舊願意付出金錢或相對應的資源，讓女兒接受近代教育。徐瑋瑩在〈舞蹈、社會階層與文化資本：臺灣舞蹈藝術拓荒者在日治時期的養成教育〉一文以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文化再製」（culture reproduction）理論來切入，認為家族之於個人發展也是一種重要的資本，而日治時期臺籍舞蹈家的養成與其家庭背景、所屬社會階層與父母文化素養關係密切，他們可分成兩類，一類為商賈或地主家庭出身，一類則為母親具有與舞蹈相關的文化資本。她以舞蹈家李彩娥為例，李彩娥父親為李明祥，李明祥是大地主李金生的長子，留學日本東京及京都，因為家中經濟富裕，生活中的吃穿之物均是舶來品或少見的物品，李彩娥曾回憶，自己上小學時，同學們都走路上學，只有父親堅持讓她坐車，她的母親甚至有專屬的人力車。¹⁰³而李明祥的妹妹就是屏東高女第三屆學生李鸞（1934 年入學）。

回到屏東高女學生的出身來看，確實也可以觀察到這些在地富紳大族的女眷先後入學屏東高女的現象。本文所稱之「家族」，係指族人在日治時期以前即已發跡致富，日治時期維持或進一步擴大其家族事業規模，在地方上具有影響力者。屏東高女做為地方上女子教育最高學府，通常這樣的地方大族，都有一名以上的女性成員就讀於此，因此本文所整理出來的家族中，以有一名以上的家族成員就讀屏東高女者為主，若有姻親關係者亦一併敘明。此外，由於屏東高女的學生絕大多數來自屏東地區，縱使也有學生來自高雄或其他州廳，但人數不多，故本文仍集中討論屏東在地家族。

茲敘述如下：

（一）屏東蘇家

蘇雲梯，字士階，前清廩生，世居屏東頭前溪。1896 年任庄長，1898 年受臺南縣知事磯貝靜藏之聘任阿猴廳參事，經營土地開墾、煉瓦營造及南昌製糖會社等砂糖製造等事業，¹⁰⁴後併入臺灣製糖株式會社。雲梯於 1899 年佩受紳章，列《臺灣列紳傳》阿猴地區第一人。¹⁰⁵其弟為蘇雲從、蘇雲英、蘇雲龍，雲梯、雲從、雲英均在前清時期獲得功名，日治以後，雲英於 1899 年擔任頭前溪庄長，1908 年任阿猴廳參事，1920 年實施州廳制之後，雲英被任命為高雄州

¹⁰³ 徐瑋瑩，〈舞蹈、社會階層與文化資本：臺灣舞蹈藝術拓荒者在日治時期的養成教育〉，《臺灣舞蹈研究》8（2013 年），頁 174-175。

¹⁰⁴ 編者不詳，〈南部臺灣紳士錄〉（臺南：株式會社臺南新報社，1907 年），未標頁碼。

¹⁰⁵ 鷹取田一郎，〈臺灣列紳傳〉（臺北：臺灣總督府，1916 年），頁 321。

協議會員，¹⁰⁶其孫為政治人物蘇貞昌。雲從生子嘉邦，畢業於總督府國語學校，經營「和昌商行」並代理石油業，也參與屏東市協議會員、屏東市會議員等地方公務。¹⁰⁷

屏東高女設校後，1933 年隨即有多位蘇家女性報考入學，她們是蘇朱衣、蘇瑞趾、蘇錦血與蘇採絹。蘇朱衣最初登記保證人為父親蘇雲龍，父親過世後，保證人改登記為兄長蘇嘉欽，蘇嘉欽在地方上擔任保正。錦血父親為蘇坤茂，表哥為蘇嘉泰。採絹則為蘇嘉邦之女。

（二）長治邱家

邱維藩，六堆客家聚落頭人，清治時期林爽文事件時協助官方平亂，事件後請官，平時教練六堆。邱家累世為六堆首班，清治時期曾受五品職銜，是地方上的豪農。1899 年被推舉為保甲局評議員，1900 年擔任麟洛區庄長，1903 年佩受紳章。¹⁰⁸

後人邱鳳揚（1830-1898）在乙未鼎革之時被推為六堆大總理，子元奎、蘭香、元添，孫傳順、求順、福盛。¹⁰⁹傳順之女玉蘭，1942 年入學屏東高女，此外，親戚內亦有曾日妹（1936 年入學）、曾清蓮（1939 年入學）畢業於同校。

（三）屏東戴家

戴連宗（1859-1937），地主，亦擔任保正多年，參與阿猴市場興建等多項公共事務，¹¹⁰子輩有戴福、鳳松（1883-1953）、鳳軟、鳳倚（1888-1959）等人，多受總督府國語學校等近代教育，鳳松經營爆竹、電氣、鴉片販售等業。孫輩大澤、廣澤亦在地方上肩負多項公共事務。¹¹¹鳳松之女柏子、孫女彩琴（大澤之女），以及鳳倚之女雪花（戰時改名田井由紀）分別於 1936 年、1941 年及 1939 年入學屏東高女。另外，鳳松外甥女陳秀燦（陳得之女，1934 年入學）、外孫女鄭淑雲（鄭清廉之女，1940 年入學）、親戚阮妙（另見林邊阮家，1934 年入學）、阮金菊（1938 年入學）亦就讀於此。

（四）屏東鄭家

鄭元奎（1804-1872），前清秀才、鳳山縣貢生，主持地方公共事務。子寬

¹⁰⁶ 編者不詳，《南薰集》（出版地不詳：出版者不詳，1934 年），頁 24。大園市藏，《事業界と人物》（臺北：日本植民地批判社，1930 年），頁 66-67。

¹⁰⁷ 蘇全福，《屏東市人物傳略》（屏東：錦繡中華企業社，2015 年），頁 145。

¹⁰⁸ 鷹取田一郎，《臺灣列紳傳》，頁 321-322。

¹⁰⁹ 松崎仁三郎，《嗚呼忠義亭》（高雄：出版者不詳，1935 年），頁 225-227。

¹¹⁰ 不撰著人，〈阿猴通信／市場之改築〉，《臺灣日日新報》1905 年 8 月 26 日，日刊 4 版。

¹¹¹ 蘇全福，《屏東市人物傳略》，頁 119-120。

柔（1825-1865），日治以後擔任海豐庄長，孫煥文（1853-1903）、煥章（1872-1927），煥文、煥章再生清魁（1882-1924）、清榮（1884-1955）、清濂（1898-1976）、清賢（1907-1997）、清棟等人，子孫多人擔任庄長、保正、屏東街協議會員、公共埤圳議員等公共職務。¹¹²清榮之女利子於 1936 年入學屏東高女，而清濂娶戴鳳松三女戴善為妻，生女鄭淑雲（同上）。

（五）萬丹李家

李家代表人物為李仲義（1854-1936）、李仲清兄弟。仲義讀漢學，後投身實業界，經營「豐昌公司」做糖、米生意致富，曾擔任萬丹庄協議會員，1899 年佩受紳章。¹¹³李仲清娶里港黃家之女黃鶯為妻，生二子明道（1888-1962）、明家（1894-1971），明道畢業於日本同志社中學，為實業家，曾任萬丹庄役場會計、高雄州協議會員、屏東市議會員、屏東株式會社專務和東港殖產株式會社取締役；明家也畢業於日本同志社中學，後返臺入學臺北醫學專門學校，從醫，在屏東開設「德昭醫院」。¹¹⁴明道娶劉富，生女李初雪，為屏東高女第一屆學生（1932 年入學），畢業後赴日就讀同志社英專；李明家則娶林森森為妻，育有一子六女，喜愛音樂的李明家，其女李淑德 1942 年入學屏東高女，後修習小提琴，是戰後臺灣小提琴教育的重要推手，享有「臺灣小提琴音樂之母」的美譽。¹¹⁵族內另有李淑和入學屏東高女（1939 年入學）。

（六）里港藍家

廣東南澳總兵藍廷珍及其族弟藍鼎元的後代，清末至日治初期值藍鼎元第八代嫡孫，排高字輩，代表人物有高川（1872-1940）、高全（1875-1935）、高臨、高日等人，藍家是里港的富家大族，人丁興旺，族繁不及備載。

藍高川，幼習漢學，乙未之後擔任阿緱廳辨務署參事，1899 年授佩紳章，後甚至擔任臺灣總督府評議員等要職，¹¹⁶可說是南臺灣之霸主之一。他有鄭萬、黃鳳、卜春金、日人三池久江（三池ヒサエ）等妻妾多人，¹¹⁷經營製糖及土地事業，非常富有。他與日籍妾室所生之女從母姓，名為三池隆子，1938 年

¹¹² 蘇全福，《屏東市人物傳略》，頁 128。

¹¹³ 臺灣新民報社，《臺灣人士鑑》1934 年版，頁 199。蘇全福，《屏東縣鄉賢傳略（增訂本）》（屏東：錦繡中華企業社，2000 年），頁 20。

¹¹⁴ 臺灣新民報社，《臺灣人士鑑》1934 年版，頁 201。蘇全福，《屏東縣鄉賢傳略（增訂本）》，頁 20、39。

¹¹⁵ 蘇全福，《屏東縣鄉賢傳略（增訂本）》，頁 39。

¹¹⁶ 林進發，《臺灣官紳年鑑》（臺北：民衆公論社，1932 年），頁 6。

¹¹⁷ 藍孟德，《空靈梵音：藍家里港大厝內滄桑三百年》（屏東：屏東縣藍氏宗親會，2013 年），頁 105。

入學屏東高女，她的學籍卡上特別註記「內緣之父藍高川」。藍家中就讀屏東高女的還有藍維雲（1937 年入學），她的父親是藍高月，堂哥是藍家貴。

此外，1939 年入學的蔡連嬌，學籍卡上登記從叔父為藍高全次子藍家聰；1941 年入學的藍幸子則是藍高川次子藍家精之女。尚有藍碧香（1934 年入學）、藍巧治（1935 年入學）及藍碧霞（1937 年入學）等三人登記「藍漏秀」為戶主或保證人，藍漏秀，屏東人，地主，其餘生平不詳，曾參與臺灣地方自治聯盟屏東市支部活動，¹¹⁸可能是藍家遠親，碧香、碧霞為漏秀之女，巧治為漏秀之姪。

（七）佳冬林家

林其忠（1888-1971），及其四弟林其謙（1898-1953）均畢業於總督府醫學學校，從醫，其謙在屏東開設「永和醫院」，另有兄弟其峰、其璋從商。¹¹⁹

其璋的兩個女兒愛嬌、靜子分別於 1932 年、1937 年入學屏東高女，其謙次女月麗則在 1933 年入學，同年其峰之女椿嬌也成為同校學生。

（八）林邊阮家

林邊阮家，阮廷芳（1824-1902）為前清秀才，兼營農業致富，1899 年授佩紳章。¹²⁰生子蘭儒（1853-1921）、達修、達天（1863-1933）、選儒（1869-1949）及鴻儒（1869-1908），蘭儒生子朝吉，朝吉負笈日本後，邀集親族及地方領袖創立「屏東信託株式會社」，並擔任多項地方要職。¹²¹朝吉之女阮妙於 1934 年入學屏東高女。

達天在日治時期擔任林仔邊區街庄長、阿緱廳林仔邊區長、林邊庄協議會員等公職，育有朝英、朝江。選儒長子為朝堪，從醫，曾擔任林邊庄助役、屏東信託株式會社取締役等職。¹²²朝堪生女碧雲，1935 年入學屏東高女。

鴻儒三子為朝日，曾任臺灣新民報社記者，二二八事件時遇難。阮家其於同輩成員尚有朝堪、朝昂、朝漢、朝倫、朝臨等人，家族成員可參見臺灣省文獻委員會所採訪之《屏東縣鄉土史料》。¹²³除了阮妙、阮碧雲之外，阮家子弟阮盼（朝日之姪，1935 年入學）、阮金菊（朝漢之女，1938 年入學）、阮碧蓮（朝

¹¹⁸ 不撰著人，〈屏東自治聯 支部大會 並政談講演〉，《臺灣日日新報》1935 年 11 月 10 日，日刊 8 版。

¹¹⁹ 楊應財總主筆，《佳冬鄉情》（佳冬：佳冬鄉公所，1997 年），頁 243-249。

¹²⁰ 鷹取田一郎，《臺灣列紳傳》，頁 326。

¹²¹ 臺灣新民報社，《臺灣人士鑑》1937 年版（臺北：臺灣新民報社，1937 年），頁 90。蘇全福，《屏東縣鄉賢傳略（增訂本）》，頁 89-90。

¹²² 臺灣新民報社，《臺灣人士鑑》1937 年版，頁 199。

¹²³ 蕭銘祥主編，《屏東縣鄉土史料》，頁 299。

臨之女，戰時改名竹林蓮子，1940 年入學）、阮碧芹（朝昂之女，戰時改名竹林弘子，1941 年入學）等人先後畢業於屏東高女。

（九）車城許家

車城許連升家族。許連升（1857-1930），是車城一帶的富豪與名望家，曾擔任區長、庄長多年。連升子許受全（1895-1962），國語學校畢業後，任教於車城公學校，也經營酒類販賣，並擔任恆春電氣株式會社社長、車城信用組合理事等職，1922 年擔任車城庄役場助役，1927 年任高雄州協議會員。許受全的三個女兒許秀枝、許秀菊及許秀梅分別於 1937、1938 及 1942 年入學屏東高女。

（十）屏東吳葛家族

陳秋坤文章中細數了屏東地區好幾個大家族的來歷，惟未提及屏東地區的大型基督教家族：吳葛家族。

吳葛（1853-1901）的父親吳着（？-1893）是鳳山縣最初的基督教徒，娶劉幼（1833-1911）為妻，兩人生四男三女。長子吳葛（1854-1901），與東港女孩邱銀（1860-1931）成婚後，育有九男七女，長子臥龍（1879-1930）、三男希揚（1883-1950）、四男克己、五男媽西（1887-1973）都是醫師，¹²⁴另有子可己、可免，女兒上愛、上忍（1889-1963）、順規等人，可己、可免經營木材買賣事業，上忍後與南投謝斌結婚，生子謝緯，亦為醫師。¹²⁵吳葛長女吳上愛（1880-1967）嫁給受吳葛栽培的牧師汪培英，生女金蘭、素蘭、紫蘭、蕙蘭，另有兒子數人。

可免的女兒淑美於 1933 年入學屏東高女，同年入學的尚有汪紫蘭；隔年，長子臥龍女璇珠與希揚女茹連同入屏東高女，1938 年則是可己女兒美和入學。

1940 年入學的是克己的女兒吳惠兒，她也是先前提過少數在中國華南地區出生的在學生。畢業於總督府醫學校的吳克己後來到了汕頭行醫，他的女兒吳惠兒因此生於汕頭，不過吳克己於 1929 年病逝於汕頭，¹²⁶因此當惠兒 1940 年入學屏東高女時，戶主登記的是母親吳黃氏英，而黃英也受高等教育，是臺灣首批留學巢鴨高校（明治大學前身）的女學生。

做為屏東知名的基督教家庭，吳葛與劉幼多子多孫，吳家枝葉繁茂，從醫的吳媽西另至旗山宣教，在地方上非常活躍，因此由吳媽西擔任保證人的屏東

¹²⁴ 蘇全福，《屏東縣鄉賢傳略（增訂本）》，頁 48-49。

¹²⁵ 陳金興，《台灣另類牧師、醫師：謝緯》（臺北：草根出版，2010 年），頁 2-5、54。

¹²⁶ 不撰著人，〈屏東街出身者〉，《臺灣日日新報》1929 年 3 月 15 日，夕刊 4 版。

高女學生不計其數。

屏東平原土地移墾史悠遠綿長，各地自然發展出主持地方公共事務的頭人領袖，隨著子孫繁衍、與其他大家族聯姻或事業版圖的擴大而逐漸家族的影響力。由於本文以 1932 年至 1942 年間有一個以上的女性家族成員就讀於屏東高女為條件來篩選各地世家大族，因此不在本文所列者並非指該家族影響力不足，而是其家族成員未有人或僅有一人就讀於屏東高女。就實務上觀察，部分大家族的成員中未有人或僅一人就讀於屏東高女，並不是因為不重視女子教育，理由主要有二，其一，女性成員就學期間早於 1932 年，屏東高女尚未成立；另一個原因是，有些大家族的女性成員會選擇就讀高雄高女、臺南第二高女等較屏東高女早成立的學校，甚至有極少數成員選擇就讀北一高女、靜修高女等北部地區的女子名校，或是在就讀期間轉學至島內其他學校甚至是日本內地。

除了前述的家族之外，還有許多學生所屬的家族雖然不是在日治以前就經商致富或取得功名，經過數代的累積而成為地方領袖，但在日治前後，隨著新局勢的展開而逐漸擴大事業版圖，或是從事醫師、藥商、教育等職業而成為地方上具影響力的一號人物者。如：前文提及、1938 年入學屏東高女的學生石綿，父親為石水（1875-1950），東港街人，8 歲起讀漢文，18 歲繼承父業，經營「豐源號」，曾任東港信用組合理事、東港殖產株式會社重役、高雄州米穀同業組合評議員、保證和東港街協議會員等要職。¹²⁷

屏東望族林英良（1881-1957），經營「慶記商號」，兼營榨油與染布，人稱「萬丹李仲義，阿猴林慶記」，富賈一方。¹²⁸英良之弟英皆（1873-1944）也是實業家。英良長男林仙化（1904-2001），畢業於臺南師範學校，生二女錦綢、錦裡，分別於 1941、1942 年入學屏東高女。英皆生子綿順（1895-1966），畢業於國語學校，服務於阿猴廳，後入實業界，擔任屏東信用組合裡世、屏東商工會評議員等多職。¹²⁹綿順的兩個女兒林柔（1936 年入學）、林鶴妹（1939 年入學）均就讀於屏東高女。

萬丹林耀明（1895-1979），日本東洋商業學校畢業，1920 年被選為屏東信

¹²⁷ 臺灣新民報社，《臺灣人士鑑》1934 年版，頁 97。蘇全福，《屏東縣鄉賢傳略（增訂本）》，頁 12。

¹²⁸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屏東縣鄉土史料》，頁 15。蘇全福，《屏東市人物傳略》，頁 32。

¹²⁹ 蘇全福，《屏東市人物傳略》，頁 35。

託株式會社常務取締役，此後擔任屏東街役場助役、屏東市協議會員等多項公職。¹³⁰其女月蟾（1934 年入學）、月宮（1936 年入學）、月春（1942 年入學）就讀屏東高女，同校之李蓮蕙（1934 年入學）、李蓮心（1936 年入學）、李玉桂（1937 年入學）亦為族親。

施宜（1894-1948）原籍臺南，屏東市人，臺南第一公學校畢業後，在屏東開設「保安藥房」，曾任屏東商公會理事、副會長、屏東信用組合理事、監事、屏東街協議會員等要職。¹³¹施宜育有四子五女，其中施秀雲為 1942 年入學屏東高女的學生。

而戰後接任屏女首任校長李志傳（戰時改日名大武高志，1903-1975）戰前即於屏東高女服務，教授音樂，戰後持續推動屏東地區音樂教育。¹³²他的女兒李琴月（戰時改日名大武貴美）也在 1940 年入學屏東高女。「蕉王」吳振瑞的祖父是前清秀才吳鬱，父親是吳周騫（1885-1960），原是公學校教師，後棄教從商進入三井物產株式會社任職，並擔任高雄州青果組合代表、屏東街協議會員等職。¹³³其女吳君珍在 1941 年入學屏東高女。

許清誥（1900-1977），恆春街人，1918 年畢業於總督府工業講習所，服務於阿猴廳庶務課、高雄州廳等之後辭職，歷任恆春信購販利組合長、恆春電氣株式會社常務取締役、東亞工業株式會社社長等職。¹³⁴其妹許信於 1933 年入學屏東高女。

另外還有一位保證人特別引人注意，那是曾玉英妹。

曾玉英妹，1921 年畢業於頓物公學校（竹田公學校前身），是當地二崙村望族的千金。她自公學校畢業後，經高雄州第一回學事講習會講習，任教母校訓導心得，並於 1924 年結婚，生一子二女。1933 年離婚，同年進入臺大醫學院助產婦速成科，學成返鄉在內埔、萬巒一帶任助產士，並倡議創設萬巒庄托兒所，兼任所長，據稱她「帶來竹田鄉女子接受新教育莫大的旋風」，女子入學比率遂日益提高。¹³⁵

曾玉英妹的兩個女兒清蓮、瑞蓮分別在 1939 年、1942 年入學屏東高女。

¹³⁰ 蘇全福，《屏東市人物傳略》，頁 36。

¹³¹ 蘇全福，《屏東縣鄉賢傳略（增訂本）》，頁 85。

¹³² 蘇全福，《屏東縣鄉賢傳略（增訂本）》，頁 44。

¹³³ 蘇全福，《屏東縣鄉賢傳略（增訂本）》，頁 48。

¹³⁴ 蘇全福，《屏東縣鄉賢傳略（增訂本）》，頁 93。

¹³⁵ 曾純純，《清末到日本時代六堆客家女性社會角色的變遷》，110 年客家委員會補助研究計畫，（新北市：客家委員會，2022），頁 26。

（二）屏東高女與屏東地區日人社會

以上全是針對屏東地區臺人家族所做的整理，然而自然也不能忽略的是日本人的在地社會網絡，以下就針對屏東地區在臺日人社會與屏東高女學生的關係進行分析。

日治之初，因全臺各地武裝抗日勢力不斷，治安狀況不佳，官方並未允許民間日人來臺，當時得以來臺的日人主要為官僚、軍人及僧侶等，不過隨後為了因應在臺日人生活物資的需求，總督府隨即開放既留臺灣的日本人，或隨軍日人向管理單位申請獲准後，可經營商業。

隨著殖民統治者靠著優勢武力逐漸弭平各地武裝反抗勢力而掌握臺灣各地，官方開放民間人士來臺，各項政策先後發布，在臺灣所建立的統治體制逐步確立，移入臺灣的民間日人人數漸多。總之，經統計，度過了日人移入、移入臺灣頻繁的日治初期，到了一九一〇年代日人的移動逐漸趨於穩定，且在職業選擇上，在臺日人長期以來明顯偏重從事官公吏等政府機關的公職人員，以及經商者。¹³⁶

「遠離家鄉的各位，共同以同鄉出身者必須同慰相助。尤其是住在臺灣的大和民族，……環顧國家內外情勢，再想到臺灣民族的特殊性時，吾人並非單單是以生活為目的，我們痛感我們肩負著和日清〔甲午〕、日露〔日俄〕戰爭時的軍隊相同，是站在第一線的戰鬥員之義務。」¹³⁷來到臺灣的日本人們，不像臺灣人在這座島嶼上已落地百年甚至數百年，繁衍出譜系綿長的世代子孫，身為來臺第一代的他們，人數遠不如在地的臺灣人，為了適應南方的風土與生活，體認到在這裡建立彼此之間聯絡機關的重要，進而以原籍所在地為單位，組織各府縣的同鄉組織。

這些同鄉組織大致均以某某縣人會為名，如神奈川縣人會、廣島縣人會、香川縣人會等，但有時也以當地舊名或慣稱來命名，如信濃會（信濃又稱信州，約今之長野縣）、越佐會（指「越後國」與「佐渡國」，約今之新潟縣）、尾張人共和會（尾張又稱尾州，約今之愛知縣西部）、三河鄉友會（主要是今愛知

¹³⁶ 蔡蕙頻，〈一九二〇年代前期臺、日人的政治競合關係〉，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博士論文（2014年7月），頁51-52。

¹³⁷ 香川縣人會，〈本書發刊に就て〉，《臺灣在住香川縣人名簿》（臺北：香川縣人會，1936年4月），書前序。

縣三河地區鄉人)，¹³⁸或是某某縣人同志會等。這些同鄉組織通常以該縣出身的名望家為會長，並選有多位幹事共同推動會務，定期「舉辦新年宴會、家族會等年中行事，完全撤廢官民的上下差別」地聚會，會員之間遇有慶弔則彼此關懷，互相救恤，增進親睦的情感。¹³⁹

由於在臺日人以官僚、公務員為多，他們大多集中於臺北、臺中、高雄等都會區，因此各府縣縣人會的總會多設於臺北，編有會員名簿記錄各地會員資料。不過，部分縣人會因會員人數較多或運作較活躍，除了成立全臺層級的縣人會之外，在各地另設有當地的縣人會，例如在臺的福岡縣人人數眾多，屏東就另外成立有屏東福岡縣人會，並留有登記姓名、本籍（緣故地）、在臺地址與職業的會員名簿。¹⁴⁰

有時縣人會也會推動在臺各地與本籍府縣有關的公共事務，最常見的事務之一便是維護與修整古蹟與紀念碑。縣人會幹部會選擇重要的時間點，向各地會員徵募修建款項，並在完成修建工程後舉辦落成式、竣工式或除幕式等慶祝儀式，或出版修建報告書，報告書中詳載修整緣起、重要日期與修整經過，更重要的是也會列出各地捐款鄉親的名字、職業與捐款金額。無論是這些縣人會聚會等親善活動，或是募款、定期報告修建進度，以及出版成果報告書等，不僅成為各府縣人互動往來的重要媒介，也有助於個人在臺灣落戶成家，隨著第二代「灣生」的誕生而自然生成臺灣鄉土情感之餘，持續凝聚對原鄉的意識，強化甚至是建立其原鄉認同。

屏東地區的日人當然也是如此。例如，1926 年沖繩縣人會發起修築位於屏東車城牡丹社事件的「遭難民墓碑」重修工程，儘管當年在事件中失去生命的 54 人是所謂「琉球藩民」而不是沖繩縣民，但當時沖繩縣人會仍主張「他們所流的淒愴的血與淚是為了國家的珍貴犧牲」，而把這 54 人的姓名鐫刻於墓碑上，則是「當今吾人身為縣民不得不做之事」，¹⁴¹而屏東地區的沖繩縣人仲村渠德次郎、外間政善、東恩納盛茂、和宇慶雲章等多人，均曾捐款，參與本次沖繩縣人會發起的墓地改建工程。誠然這樣的論述建立在國家政權的歷史詮釋上，但重要的是，不斷強調在臺灣的各府縣人，對於原鄉須懷有堅定不移的認

¹³⁸ 金高佐平，《大臺北民間職業別職員錄》（臺北：臺北民間職業別職員錄發行所，1935 年 3 月），頁 43。

¹³⁹ 作者不詳，《常夏之臺灣》（臺北：常夏之臺灣社，1938 年 9 月），頁 151。

¹⁴⁰ 福岡縣人會，《昭和十二年三月一日現在 臺灣在住 福岡縣人會》（臺北：福岡縣人會，出版年不詳），頁 155-164。

¹⁴¹ 沖繩縣人會，《牡丹社遭難民墓碑改修報告書》（出版項不詳），頁 15-16。

同，以及為國家開拓新地的使命，確實各府縣人會的主調，而這些組織是不見於同時期在臺灣的臺灣人社會中的。

除了縣人會之外，隨著日人社會的建立與細緻化，以及社交團體與活動的活躍，地方社會也可見到另一些規模較小的團體。鍾淑敏指出，在兒玉、後藤整頓臺灣政治之前，在臺日人社會存在（一）工商業團體，（二）內地人組合，（三）訴訟代理人，（四）學友會等四個力量，彼此利益不盡相同，而同類團體內也有因出身背景及主張差異等，而有許多聯合或鬥爭情況。¹⁴²

無論是縣人會，或是各地的商工團體、內地人組合，參與以上這些團體的人，主要仍以男性成員為主，當然，也會有女性為主的團體，高屏地區先後有「臺灣婦人慈善會」、「篤志看護婦人會」及「愛國婦人會臺灣支部」地方支部，以及「高雄婦人會」等地方性婦人團體的成立，它們皆是以地方行政首長夫人為領導者，次級行政官僚的夫人為核心幹部，地方領導人物之女眷則為協力角色，這樣由地方上貴夫人們所組成的團體，基本上可視為是男性官紳社交網絡的延伸。不過因成員高度重疊，這些婦女團體在 1920 年高雄州成立之後，陸續整併入愛國婦人會臺灣支部，成為其高雄州部。¹⁴³整體而言，到了屏東高女成立的一九三〇年代，屏東地區較於專屬於當地的女性團體，由女性組織的社團或聚會亦不特別顯著。

那麼，屏東高女與在地日人社會的關係如何呢？這些日籍學生的學籍卡上均謄有本籍或緣故地，在無論階級而以府縣為單位而組織的縣人會架構下，雖然縣人會的成員仍以男性為主，但屏東高女的日籍學生雖然絕大多數為在臺出生的灣生世代，仍可依其本籍歸屬至所屬的團體中。

再者，前文分析屏東高女父兄執業時，已說明該校學生所出身的家庭，相當程度地反映了當地在臺日人社會，以結論來說，日籍家長以官公吏最多，會社員與從商者次之，光是官公吏與會社員便佔全體日籍家長的六成以上，從事這些職業的家長比率在 1937 年一舉突破七成之後，直至日治時期結束均未曾低於七成，1938、1939 年比率更高，並與王御風等學者研究中所勾勒的在臺日人社會特色吻合。具體而言，屏東高女歷屆學生中，好幾位的父親為地方行政機關首長，如，鳳山街長、甲仙、恆春、燕巢、新園、林園、林邊等各庄長等，

¹⁴² 鍾淑敏，〈日據初期台灣總督府統治權的確立—1895 年～1906 年〉，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89 年 5 月，頁 141。

¹⁴³ 蔡蕙頻，〈美麗的力量：從日治時期高雄地區婦人組織探討婦女社交場域之生成與統合〉，《高雄文獻》第 11 卷第 2 期（2021 年 12 月），頁 41-78。

此外，在州廳、郡役所及街庄役場奉職者（如書記、雇員等）也不少，而擔任各級教師教師，或是從事車站站員（如驛長、議員）、警察（如巡查、理蕃警察）、郵務人員者亦多不勝數，可見屏東高女的日籍學生與在地日人社會的關係相當緊密。

在了解屏東高女學生與在地臺、日人社會的關聯之後，我們要接著探問，擁有屏東高女的學歷，對地方社會或出身家族代表什麼意義？又對家族產生什麼影響呢？

學者陳麗華曾以高屏境內六堆的客籍領袖鍾幹郎為例，說明一位在清、日政權交替之下成長的客籍菁英如何從傳統走向近代的歷程。生於 1886 年的內埔人鍾幹郎，在 1898 年內埔公學校成立之後，離開傳統私塾，進入公學校就讀，成為內埔地區第一代接受近代教育的六堆青年。客家家庭的鍾家，不僅父祖本身即使前清時期獲得科舉功名的士紳階層，作為內埔地區的領袖大族，也具有重視子女教育的家風，願意投注資源於教育上。鍾幹郎入學公學校，一方面反映了鍾家重視教育的傳統，另一方面也帶有願意配合統治者、表達忠誠的意義。¹⁴⁴

後來，像鍾幹郎這樣接受近代教育的臺籍菁英，如內埔的劉鳳崗、鍾立珍、美濃的邱義生、佳冬的蕭信棟等人，後來都陸續服務於官廳、金融機構、教育機關，或是被延攬擔任保正、街庄助役等公職。

他們之所以能夠成為地方上的領袖人物，一方面是源自於清治時期家族在地方上既有的影響力，這也是殖民統治者所著眼之處；另一方面，擁有新式教育的學歷，讓他們在新的時代下選擇職業時擁有更多資源，無論是擔任地方公職，或是成為公學校教師，或是在金融機構得到重要的職位，抑或是轉投資糖業等相關商業活動，都是社會地位不錯且收入穩定的好工作，不僅穩固了家族既有的影響力，也拓展了個人的社交範圍，豐富自我的社經條件。因此，就算日治初期他們尚未完全理解近代教育的意義，但假以時日，他們仍親身感受到近代學歷為他們帶來的那些具體可見的實質好處。

而這樣的現象不僅出現在臺灣人家庭中，即使是日籍學生，也得見同樣情

¹⁴⁴ 陳麗華，《族群與國家：六堆客家認同的形成（1683-1973）》（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5 年 11 月），頁 119-122。

形。由於教師每年會前往學生家庭進行家庭訪問，了解學生的家庭背景、家長的教育態度，或是和家長討論學生在校表現、畢業後的志願等，比較謹慎勤快的教師，會將家庭訪問獲得的心得或重要內容摘錄於學籍資料中。這些註記裡，不乏「家長對教育很熱心」、「保護者（監護人）對教育相當理解」、「父親熱心教育」等相關註記。

另一方面，公學校畢業，並通過高女入學考試，僅少數人能取得的高女學歷，篩選出女性菁英，完成至少四年的高女教育所取得的畢業證書，不單只是女性個人名列女子學歷菁英集團的表徵，同時也標榜女性的家長在具備相當雄厚的財力之餘，本身也足夠開明，樂於接受文明與近代，女子學歷成為標榜上流階層的識別標記。¹⁴⁵因此，無論就個人就學與就業的正向經驗，或是站在家族名聲與階級標示的角度，新式知識人大多都很樂意並鼓勵自己的女兒就讀高等女學校。而這群在一九三、四〇年代入學屏東高女的學生們，便是出生於一九二〇年代、是鍾幹郎這一輩臺籍菁英子女的世代，高女學歷為她們自身及她們所屬的家庭各自帶來不同意義的影響。此處先闡述對家族的影響，至於對個人的意義，則在下一節中探討。

民俗學研究者池田敏雄曾觀察並記錄臺灣女性的養成。他注意到，傳統的臺灣家庭會特別刻意培養女性在婚前有關裁縫與刺繡技能，特別是刺繡，這項技能不只在未來的婚姻生活中用得上，同時，刺繡的針目計算和運針皆需要大量的細心與耐心，這是女性成為人妻前磨練性格的重要修練，¹⁴⁶是否能夠完美進行針黹手工，往往是評斷一個女人是否是具備女性才能的重要標準，其重要性甚至超越她是否識字。這樣的女性養成，基本上仍是在婚姻的前提下，以養成其未來成為人妻、人母的基本技能為主。

日治初期殖民政府興辦女子教育時，即充分運用了臺灣人格外重視手藝教育的特性。學者洪郁如爬梳日治初期女子教育興起的脈絡，注意到有識者呼籲為了讓臺人女性能夠了解並支持近代教育，官方也應推動女子教育。初期官方以裁縫、刺繡等技藝教育來提高女子入學意願，直到學生的入學意願提高之後，便逐漸降低過去臺灣人所在意的手藝教育，進入以國語教育與婦德養成為主的女子教育階段。¹⁴⁷不過裁縫家事課程依舊受到高女教育者的關心，1934

¹⁴⁵ 洪郁如著，吳佩珍、吳亦昕譯，《近代台灣女性史：日治時期新女性的誕生》（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7年6月），頁166-174。

¹⁴⁶ 池田敏雄，《臺灣の家庭生活》（臺北：東都書籍會社臺北支店，1944年），頁204。

¹⁴⁷ 洪郁如著，吳佩珍、吳亦昕譯，《近代台灣女性史：日治時期新女性的誕生》，頁100-111。

年，總督府文教局召集全臺各高等女學校校長來舉行全島校長會議，諸位校長在會上反映「在一直以來『女學校畢業也派不上用場』的非難之聲中，特別是在最需要有用之人的今日，女學校最需要的『家事裁縫』成為問題是當然的了」，呼籲政府應儘速解決各校家事裁縫師資不足的問題，並提醒教師在從事教學時，應注意與各學科的連結與活用，例如教授烹飪時，不單是傳授料理技術，更要把物理、化學、數學等學科都一併納入考慮，「特別是合於時宜，能夠直接應用於家庭內者」。¹⁴⁸足見即使到了一九三〇年代，家事、裁縫、烹飪等為婚後生活而準備的家庭知能，依舊在高等女學校的課程設計範圍內。直到 1939 年，報紙報導仍以「前途無量 年輕的母親自立」（前途かがやく 若き母巢立つ）來形容屏東高女的畢業式。¹⁴⁹洪郁如也指出，透過手藝教育，過去學習技藝這樣的展現女性修養的傳統「新娘修業」被「學校化」了。¹⁵⁰

而這也意味著，高女學生對於畢業後終將成為妻子與母親的社會角色，是有一定程度的認知的。回顧日治時期，大家族聯姻的例子真是不勝枚舉，像是屏東里港藍家代表人物之一藍高川的長女藍錦綿，就是嫁給基隆顏家顏雲年之次子顏德潤，對藍錦綿一見鍾情的顏德潤，當時還請到板橋林家的林熊徵前去藍家說親。此外，顏雲年的三子顏德修娶的是許丙長女許碧霞，而三女顏緹則嫁給律師陳逸松，五女顏真的丈夫是知名報人與政治人物羅萬俤。

屏東高女的學生中，也有不少人後來嫁給地方上的企業名人或政治人物為妻，例如，前屏東麵粉米穀豆的大賣商葉量材之次女葉月是屏東高女畢業生，畢業後與地方士紳郭天財。¹⁵¹而林乙哲嗣林河興夫人林陳如玉，則是 1934 年入學屏東高女的第三屆畢業生。¹⁵²

1940 年入學的徐蘭芳，父親是高樹庄頭人徐水生，徐水生戰後曾擔任高樹鄉第三屆鄉民代表會主席、屏東縣議會第二屆民選縣議員等職。徐蘭芳畢業後于歸同是高樹望族的楊明祥次男楊宗景，蘭芳本人在戰後也曾擔任屏東縣議會第三、四及六至九屆縣議員，以及高樹鄉婦女會理事長，是婦女界傑出人物之一。¹⁵³

¹⁴⁸ 不撰著者，〈實際に即た 家事裁縫を教へよ 女學校長會議で 論議の的となる〉，《臺灣日日新報》1934 年 5 月 31 日，夕刊 4 版。

¹⁴⁹ 不撰著者，〈前途かがやく 若き母巢立つ〉，《臺灣日日新報》1939 年 3 月 14 日，日刊 5 版。

¹⁵⁰ 洪郁如著，吳佩珍、吳亦昕譯，《近代台灣女性史：日治時期新女性的誕生》，頁 100-111。

¹⁵¹ 紀展南，《小城故事：阿猴屏東》（臺南：詠采文化藝術基金會，2011 年），頁 156。

¹⁵² 紀展南，《小城故事：阿猴屏東》，頁 158。

¹⁵³ 蘇全福，《屏東縣鄉賢傳略（增訂本）》，頁 87。

屏東李家李明道的長女李初雪是屏東高女第一屆畢業生，畢業後負笈日本就讀同志社女子專門學校英文科，畢業後嫁給畢業於東京帝大的李信福（1915-1996），東京帝大經濟科畢業的李信福在戰後曾擔任屏東中學代理校長、高雄企銀總經理等職，也是地方上知名的領袖人物。¹⁵⁴

此外，屏東鄭家的鄭清賢娶地方望族戴鳳松三女戴善為妻，生女鄭清雲。而林邊阮家阮朝吉之女阮妙從屏東高女畢業後，與屏東望族林英良次男林石城成婚，¹⁵⁵林石城戰後曾任屏東縣第二、三屆縣長，是林家知名人物。

至於曾清蓮後來遠嫁宜蘭醫師陳熙春，陳熙春的父親是戰後首任宜蘭市長陳金波。¹⁵⁶

而基督教信者則常因宗教信仰而結為連理，最知名的就是代表家族的吳葛一家，吳希揚與萬丹李家李仲清的養媳女李嫌結婚，1934 年入學屏東高女的吳茹連是他們的千金。

1942 年，一位關心臺灣民俗的黃啟木在《臺灣公論》上發表文章〈台灣の結婚種々相〉，他認為，臺人女性在選擇婚姻對象時，第一重要的並不是對象或愛情，而是首要考量對方家庭的資產與地位。¹⁵⁷黃啟木的說法或許有些言過其實，但他的看法也透露了至少在日治中、後期，所謂「門當戶對」已經將個人學歷與家庭是否匹配納入考量之中。洪郁如即認為，至少在一九二〇年代中期以後，具有近代學歷也成為同樣接受近代教育的男性選擇結婚對象的理想條件之一。¹⁵⁸

另外，雖然官方在一九二〇年代強調「一視同仁」，但由於戶籍法並未在臺灣實施，臺灣人沒有戶籍、僅有戶口的緣故，即使日本人女性與臺灣人男性結婚，也因臺灣人無戶籍而無法「入籍」，這與當局強調的同化政策是背道而馳的。1932 年，總督府與司法省達成協議，權以戶口調查簿取代戶籍，開啟「內臺共婚」之途。¹⁵⁹屏東高女學生也略為反映了這樣的現象，1938 年入學的三池隆子，其父為藍高全，母親是三池ヒサエ，是藍高川的內緣妻（未有婚約而同

¹⁵⁴ 蘇全福，《屏東市人物傳略》，頁 20。蘇全福，《屏東縣萬丹鄉人物傳略》（屏東：錦繡中華企業社，2019 年），頁 30。

¹⁵⁵ 蘇全福，《屏東縣鄉賢傳略（增訂本）》，頁 125。

¹⁵⁶ 王瑞瑤，〈用吃愛台灣·人物—89 歲阿嬤訴愛 從道早安開始〉（<https://reurl.cc/Nx03Zn>），檢索日期：2025 年 8 月 5 日。

¹⁵⁷ 黃啟木，〈台灣の結婚種々相〉，《臺灣公論》第 7 卷第 8 號（1942 年 8 月），頁 52。

¹⁵⁸ 洪郁如著，吳佩珍、吳亦昕譯，《近代台灣女性史：日治時期新女性的誕生》，頁 258-261。

¹⁵⁹ 栗原純，〈台湾における戸籍制度〉，《中国研究月報》第 60 卷第 11 號（2006 年 11 月），頁 47-49。

居)，學籍資料上註記三池隆子不知父母關係，因而未稱高川為父。1939 年，三池隆子轉學至福岡筑紫高女。



六、高女教育對個人生涯之影響

擁有高女學歷，對當事人的人生產生什麼影響呢？

曾純純曾研究六堆地區客家婦女的社會參與情形。她研析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等檔案資料後發現，從清末到日治時期，六堆一帶客家婦女逐漸擁有管理財產的自主權，而日治時期女子教育施行後，提高女性社會參與的可能性，她們有些人成為職業婦女，成為眾人羨慕的對象。¹⁶⁰

而有關日治時期職業婦女出現的時代背景，學者游鑑明指出，官民一同努力之下，在臺灣婦女之間行之有年的纏足風氣逐漸廢除，為接下來女性擴大活動範圍提供有利的條件；殖民政府興辦女學，則擴大了女性知識領域與生活空間，再加上社會上鼓勵就業的風氣漸盛，女性就業漸成趨勢。¹⁶¹

隨著社會發展，新興職業也陸續出現，這些職業大致可分成勞動與服務性質的職業（如女工、褓姆等），以及憑藉腦力與技術的職業（如產婆、車掌、教員、看護婦等）。¹⁶²

擁有高女的學歷，除了能彰顯家族的社會地位，以及提升個人的婚配條件之外，無論是就學、就業或結婚，當事人在畢業後的人生選擇也更加寬廣多元。以下是屏東高女在 1937 年舉行第二屆畢業典禮時，《臺灣日日新報》對畢業生動向的報導：

屏東高等女學校第二回卒業式。十七日午前九時半舉行。內海知事。土居教育。西元文書兩課長。宗藤市尹。川添飛行聯隊長。其他來賓。及父兄百餘名參列。本年卒業生九十五名。其中志望入上級學校十名。補習科二十五名。就職教員其他二十二名。以外三十八名。¹⁶³

以下為 1941 年第六屆畢業典禮的相關報導：

屏東高女第六回卒業式，自十二日上午十時於同校講堂，在赤堀知事、山本教育課長、大關市長及其他多名官民父兄的參列之下舉行，高丸校長對九十四名畢業生頒發畢業證書，對十一名頒發全勤獎（皆勤精勤賞）後禮成。順帶一提，本屆畢業生中，從事家事者有十六名，官廳會社事務員者十名，教員三十六名，繼續升學者（上級學校志望者）三十

¹⁶⁰ 曾純純，〈清末到日本時代六堆客家女性社會角色的變遷〉，110 年客家委員會補助研究計畫，計畫編號 HAC-110-IR-0024-02。

¹⁶¹ 游鑑明，《日本殖民下的她們》（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2022 年 10 月），頁 44-57。

¹⁶² 游鑑明，《日本殖民下的她們》，頁 67-69。

¹⁶³ 不撰著者，〈屏東高女 舉卒業式〉，《臺灣日日新報》1937 年 3 月 19 日，日刊 12 版。

這兩篇報導前後差了四年，但兩篇都提到該年度畢業生已有些人選擇升學、擔任教師、進入官廳或會社服務，或是從事其他工作，取得高女學歷的畢業生，出路較過往更為多元。

表 10 為依目前所見的各年度《臺灣總督府學事年報》，針對屏東高女畢業生所做的 1936 年及 1937 年畢業生動向統計，這兩個年度分別是該校第一、二屆畢業生。

表 10：屏東高女 1936、1937 年畢業生畢業後狀況一覽表

年度/民族 畢業後的狀況		1936		1937	
		臺人	日人	臺人	日人
升學	升專門學校	0	4	5	2
	升師範學校	-	-	0	1
	升其他學校	3	0	0	1
就業	奉職官公署學校	14	3	7	9
	奉職會社銀行	7	0	0	2
	實業界	-	-	0	1
	其他	-	-	0	2
無業及職業不詳		32	14	33	32

從表 10 可知，創校初期，畢業後選擇繼續升學的學生人數不多，臺籍畢業生較多人選擇進入官公署學校服務，而進入官公署學校服務也是相對較受到日籍畢業生喜愛的職業選項。由於高女畢業後經考試通過可取得公學校教師的資格，因此這些選擇進入官公署學校服務的畢業生，大多數應是成為小公學校教師。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這份調查結果中，無論臺籍或日籍學生，人數最多的是「無業及職業不詳」。如同先前所述，屏東高女學生不少人出身地方上經濟條件相對富裕的大家族，或是父兄從事公職，在經濟條件相對穩定無虞之下，一方面，她們在畢業後沒有求職的動機與迫切需求；另一方面，1928 年成立的臺北帝大，截至日治時期結束，僅有零星數位女性入學，可說是幾乎沒有女性

¹⁶⁴ 不撰著人，〈屏東高女卒業式〉，《臺灣日日新報》1941 年 3 月 13 日，日刊 4 版。

就學的空間，由於高女畢業生若要繼續升學，只能選擇報考 1931 年成立的臺北女子高等學院，或是乾脆遠渡重洋到日本本國繼續就學。然而，前者並非依據〈專門學校令〉所設置的女子專門學校，不僅修業年限較短，畢業生也無法自動取得中等學校的任教資格，¹⁶⁵對高女畢業生不具吸引力。此外，該校被戲稱為「新娘學校」，課程偏重家政學，而在臺灣，高女畢業的學歷已被視為不錯的婚配條件，再加上該校位於臺北，屏東高女的畢業生若要北上求學，還有租屋或生活費，求學成本相對較高，以及要離開家鄉遠赴臺北就學，這些都讓家長對於讓女兒報考臺北女子高等學院感到興趣缺缺。

因此，若因個人追求學問的人生目標而繼續求學，畢業生選擇前往日本本國報考專門學校、師範學校或其他學校，不過，這樣一來，取得學歷的成本也會提高非常多，若非畢業生本人向上攻讀更高學歷的動機非常強烈，家庭的經濟條件也能支應，本人也足夠優秀，能夠在競爭激烈的人學考試中脫穎而出，否則赴日求學也是一個門檻很高的選項。

可惜我們無法得知第三屆以後的畢業生都從事哪些工作，或是有多少人順利實現升學的夢想，又有多少人結婚走入家庭。不過，日治時期的學校裡，教師會至學生家中進行家庭訪問，藉以了解學生的家庭狀況以及在家表現，也會和家長討論學生在校表現與學習勤惰等。也有部分教師會詢問學生的志願，並將結果登載在學籍卡上。這個統計有一個缺陷，那就是根據學籍卡所記載，只有轉入學的學生留有志願的紀錄，一般學生則無。儘管數據不夠完全，此處仍列出參考。據統計，學籍卡上記載志願的學生共有 83 名，統計如下。

表 11：屏東高女學籍簿所載學生志願統計一覽表

志願 \ 民族		臺人	日人	合計
升學	上級學校入學希望	5	12	17
	升演習科/補習科	0	6	6
	升師範學校	0	2	2
	升女子大學	0	1	1
	升其他學校	0	3	3
就業	教員	4	21	25
	齒科醫	0	1	1

¹⁶⁵ 洪郁如，〈臺北女子高等學院〉，《臺灣學通訊》第 94 期（2016 年 7 月），頁 18-19。

	洋裁教師	0	2	2
	其他	0	2	2
其他	結婚/從事家務	3	21	24

其中，以有志成為教師者，共 25 人，若一併考量有意繼續升學者中，有人想進入補習科、演習科或師範學校就讀者，那麼以教育為業的人數將多於升學者。這樣的結果與 1936、1937 年的統計結果相當吻合，由於高等女學校畢業後通過考試可取得小公學校教師的資格，因此以就業來說，成為教師仍是最多人的首選。

其次為考慮畢業後結婚者，共 24 人，她們多半想成為忠良或堂堂正正的日本婦人。

想繼續升學的學生的學生也不少，其他的則有想成為女醫師、舞蹈家、洋裁教師或從事音樂工作者，成為職業婦女是高女學生重要的選擇。

為了盡可能地具體了解屏東高女的就業情形，我們也嘗試透過查找《臺灣總督府職員錄》來了解屏東高女畢業生的實際就業情形。各年度《臺灣總督府職員錄》所記載的為該年度在各個公部門服務的職員名錄，不含民間企業的人事資料，依舊難以掌握畢業生於民間機構就業的情形。雖其有所侷限，但至少能了解其進入公部門服務的比率。

由於高等女學校修業為四年，畢業後取得高女學歷，可至公家機關求職；若畢業後再進入補習科修習一年，通過檢定考試之後即可取得至公學校任教的資格。不過，可惜屏東女中殘存僅僅數人的補習科學籍資料，未能進一步核對補習科畢業生從事教職的情形，故本文一併從《臺灣總督府職員錄》來推敲。

日治時期女性取得教師資格的管道不只一種，若循高女本科及補習科的管道取得教師資格共需五年，因此判斷自 1932 年入學至 1939 年入學的學生有可能在畢業後執教鞭，1940 年之後則將在畢業當年或畢業前夕面臨日治時期結束而未能順利進入杏壇。

1932 年至 1939 年入學學生共有 898 人。將其逐一查找各年度職員錄，並比對年份與活動地區，排除可能為同名同姓者後，進入學校及各公家單位服務的屏東高女畢業生有 317 人，佔總人數的 35.30%，換句話說，三分之一的畢業生在取得學歷之後成為在公家機關工作的職業婦女，雖目前尚難掌握畢業生於民間企業就職的情況，但若將之納入考量，畢業生就業情形可謂十分活躍。

進入公部門服務的 317 人之中，高達 242 人成為學校教員，佔總畢業生人數的 26.95%，更佔擔任公職的畢業生的將近八成。1937 年中日戰爭發生後，不少男性較原被徵調上戰場，1943 年又因義務教育的實施，造成大量的教員缺額，¹⁶⁶此時正好屏東高女學生陸續畢業，作為屏東地區培養女性師資的機關，屏東高女畢業生有不少人在取得教師資格後，陸續進入公學校任教。

其他進入公家機關服務的畢業生，較多的是在郵局擔任通信事務員，共有 14 人。通信事務員即電話交換手（電話接線生），日治時期電話事業屬於遞信事務，地方上的電話交換事務由郵局經管，在自動電話尚未普及時，電話交換手必須能以臺、日語與撥、接電話雙方應答，並快速拔插電話線以接通電話。早期曾以男性為主，後來逐漸由女性擔任，是份需要反應正確且動作敏捷的職業。部分屏東高女畢業生選擇以此為業。

此外，其他屏女畢業生就職的公務機關遍及殖產局熱帶特用樹種栽培事務所、天然瓦斯研究所、屏東市役所、高雄州港務部、氣象臺、遞信部、專賣局等單位，也有少數人在學校擔任雇員，或另外接受訓練而成為醫院的看護婦。

無論是成為教員，或在公家機關服務，317 名之中有 271 人服務於高雄或屏東的學校或單位，在地就業的比率高達 85.49%。游鑑明研究發現，各地進行教員分發時，通常對於女教員的分法有較多考量，除了就在學成績優劣進行分發之外，公學校是否有女學生，或是交通是否方便等條件，都列為教師分發時的指標。¹⁶⁷屏東高女學生明顯的特色之一為大多數是地方出身，因此除了因結婚等特殊因素而前往外地任職之外，考量到住宿需求、通勤成本等因素，大多數畢業生仍留在屏東一帶就職，或是到鄰近的高雄地區工作。

換句話說，屏東高女不僅肩負起培育屏東地區女子頂尖教育的重責大任，對於在地職業婦女的養成，也有莫大的貢獻。

高女教育也是女性自我發展的重要基石，資賦優異且家庭經濟行有餘力者，得以在此之上發展個人興趣。最知名者之一為小提琴家李淑德。

李淑德是李明家的次女，自幼天資聰穎，興趣多元，音樂、美術、體育，樣樣專精，根據記載，淑德自屏東榮小學校畢業後，即以極優秀成績考入屏東高女。她的父親李明家本身即具音樂專長，也是曼陀鈴演奏家，淑德承襲父志，展現對音樂與藝術的天賦。據說她在屏東高女就學期間，上課時必帶一支

¹⁶⁶ 游鑑明，《日本殖民下的她們》，頁 103。

¹⁶⁷ 游鑑明，《日本殖民下的她們》，頁 113-114。

小提琴與畫筆畫紙，課餘時間非常熱心指導低年級生拉小提琴。¹⁶⁸戰後致力於臺灣小提琴教育的李淑德，也是小提琴家林昭亮、胡乃元等人的老師，素有「臺灣小提琴教母」的美譽，2015 年獲第二屆教育部藝術貢獻獎終身成就獎，2017 年獲頒「二等景星勳章」，表揚其對臺灣音樂教育的貢獻。¹⁶⁹此外，她在 1946 年代表屏東縣參加省運的標槍項目，打破紀錄獲得冠軍。

就《臺灣總督府職員錄》所刊載的資料，屏東首屆學生在 1937 年開始就業，無論是擔任教職，或是進入公部門任職，其職業生涯多是一至三年，這與一九二〇年代西南卷平的觀察相吻合。¹⁷⁰當然，一個人能力的養成與社會地位的建立，並不會隨著政權更迭而消失殆盡，也有人一路從畢業後就工作到 1945 年戰爭結束，尤其是獲得教師資格，戰前即已進入學校執教鞭的教師們，有機會在戰後透過資格轉換繼續從事教職，例如里港藍家後代的藍維雲，在畢業後於 1942 年擔任里港國民學校助教、訓導，直至戰後；¹⁷¹而出身林邊阮家的阮妙，戰後曾任屏東縣婦女會常務理事、臺灣省婦女會理事、婦聯會屏東縣分會主委、私立東大中學董事長，是屏東知名女傑。¹⁷²屏東高女的學歷，對她們日後的發展有推波助瀾之效。

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
KAOHSIUNG MUSEUM OF HISTORY

¹⁶⁸ 紀展南，《小城故事：阿猴屏東》，頁 159。

¹⁶⁹ 蘇全福，《屏東縣萬丹鄉人物傳略》，頁 36。

¹⁷⁰ 此處轉引自游鑑明，〈日據時期公學校女教師的搖籃：臺北第三高等女學校〉，《臺灣光復初期歷史》（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1993 年 11 月），頁 368。

¹⁷¹ 藍孟德，《空靈跫音：藍家里港大厝內滄桑三百年》，頁 215。

¹⁷² 蘇全福，《屏東市人物傳略》，頁 46。

七、結論

本文旨在透過屏東女中所典藏的日治時期學籍簿來勾勒屏東高女的學生組成，並嘗試進一步說明該校學生與地方社會之間的關係。在闡述日治時期女子教育的發展及屏東高女的設校過程後，筆者取得屏東女中校方同意，實際整理該校日治時期學生學籍簿，逐一建檔後進行分析。

整體而言，作為屏東地區女子教育的頂點，屏東高女的日籍學生每屆皆約占三分之二，臺籍學生佔三分之一。本籍方面，臺籍學生多數是屏東本地出身，而日籍學生本籍以九州地區最多，但觀其出生地，明顯可知她們多數是在臺出生的灣生。

此外，無論臺籍或日籍，她們絕大多數來自地方上層社會家庭，日籍家長的職業以擔任地方公職者為多，臺籍家長從商或具地主身分者比例較高為特色，不過後期擔任公職的比率攀升，顯示具近代教育經驗的家長比率增加之後，以其學歷從事教職等公職成為臺人社會的趨勢。

最後，本文試圖從學生的出身來說明屏東高女與在地社會的關係。臺籍學生不乏出身地方大家族者，她們的家長多半自身即擁有近代教育的經驗與學歷，並藉以謀得社會地位與收入均佳的職業，或是獲得人脈等資源，因此他們對於子女的教育採取樂見其成的支持態度。

此外，屏東高女的學歷也為就學者個人的人生帶來重要的影響，這類影響可分三類說明。首先，部分的學生選擇在畢業後繼續升學，無論是就讀補習科，或是至臺灣其他地區甚至負笈日本本國就學，屏東高女的經驗與學歷都是她們向上求學的重要基石。

其次，由於日治時期臺灣女性的就學率不高，就學管道也有限，高女學歷在臺灣已相當亮眼，即使學生畢業後未選擇繼續升學，無論是選擇就業或結婚，屏東高女的畢業證書也是她們可運用的資源，尤其是查閱各年度《臺灣總督府職員錄》後可知，歷屆畢業生中，超過三分之一進入公家機關服務。且高女是當局補充女教員的重要來源之一，只要在學期間修習教育課程，畢業後就能取得小公學校的教員資格，因此在所有服務於公家機關的畢業生中，選擇執教鞭、進入小公學校任教者高達近八成。

第三，屏東高女的求學經驗也為學生提供了自我能力探索的環境。部分學生在學期間盡情發展自己的興趣，養成特定能力，畢業後仍持續耕耘，假以時日不但在達成個人的自我成就，其影響力甚至擴及地方社會，直到戰後仍持續

在教育或政治等領域有所貢獻。

本文所使用的史料為屏東女中所典藏之學籍簿，雖為珍貴的一手史料，但以統計數字來勾勒學生的樣態，不得不承認仍有其限制，難以呈現校園生活、學生個人的人脈建立與往來交際。諸如，屏東高女兼有臺籍及日籍學生，她們又多屬上層社會，屏東高女是否成為這群受近代教育的新女性往來互動的交集場域呢？她們在校期間是否存在民族的差異而彼此競爭？還是會因其皆來自屏東地區、擁有共同的生活經驗而消弭民族界線？由於屏東女中未留存日治時期的畢業紀念冊等相關資料，這些問題只能留待未來對畢業生進行深度口述訪談後進一步探究。

此外，依屏東女中在戰後初期所登錄的屏東高女卒業生臺帳，所登錄的日治時期畢業生人數共 1,011 名。屏東女中楊榮豐校長惠知日籍校友在戰後被遣返回日本後，仍組織同窗會繼續活動，過去曾與校方長年保持聯絡，但近年聯繫已停止。筆者曾於 2025 年 2 月及 5 月去信聯繫日人牧野幸子，牧野女士的母親牧野キク（舊姓高須賀）曾任屏東高女日本同窗會會長，透過牧野幸子女士的協助，希望能夠對牧野キク進行口述訪談。

然而，牧野女士表示，早年母親曾數次對她提起協助創校前期興建校方校舍等年輕時在屏東高女就讀的種種回憶，也曾回到屏東高女探訪，或參與同窗會活動，與校友保持聯繫，不過隨著成員年事日高，校友會目前已停止運作，母親因近百歲，居住於安養院，聽力與記憶力皆嚴重退化之下，對於往日記憶已無法復述，因而婉拒訪談邀約。至於其餘校友，由於校友會已停止運作多年，彼此也失去聯繫。

至於臺籍畢業生，也組織校友會與屏東女中密切聯繫，參與校慶活動。不過校友會中已無日治時期畢業的校友，由戰後屏東女中畢業生所組成。

時間是歷史研究最大的敵人，雖然很可惜地，我們已經錯過了對校友進行口述訪談的黃金時機，不過校友會於戰後仍持續活動數十年一事，也證明了無論是日籍或臺籍學生，個人在畢業之後，透過參與同窗會組織與母校持續保持聯繫，成員之間也彼此交流回憶與情感，定期聚會，足見同窗會組織在畢業生個人與母校之間扮演重要的橋梁角色，也在一定程度上延續了畢業生對屏東高女的認同。已經終止活動的屏東高女同窗會在過去如何運作？是否出版相關刊物？日籍校友們如何透過這些活動構築怎樣的校園回憶與個人認同？這些也是後續可以持續關注的研究議題。

最後是屏東高女與其他學校的橫向比較。受限於時間與篇幅，本文主要集中於利用屏東女中保存的屏東高女學籍簿來勾勒日治時期學生的樣貌，雖對學生的組成與背景有初步的整理與描述，但未來若能進一步與同州的高雄高女學生進行比較，或許更能凸顯屏東高女的特色。此外，在日治時期，多數地區招收男學生的中學校創校年份早於當地的高女，但屏東高女卻剛好相反，屏東高女在 1932 年設校六年之後，當局才在 1938 年創設屏東中學校（今國立屏東高中）。何以屏東高女的創校遠早於屏東中學校的設校，這也是值得未來持續探討的有趣議題。



徵引書目

一、專書

- 大園市藏，《事業界と人物》（臺北：日本植民地批判社，1930年）。
- 山本禮子，《植民地台湾の高等女学校研究》（東京：多賀出版，1999年）。
- 加藤春城，《臺灣教育沿革誌》（臺北：臺灣教育會，1939年）。
- 名倉喜作，《臺灣銀行四十年誌》（東京：株式會社臺灣銀行，1939年）。
- 池田敏雄，《臺灣の家庭生活》（臺北：東都書籍會社臺北支店，1944年）。
- 作者不詳，《常夏之臺灣》（臺北：常夏之臺灣社，1938年9月）。
- 李建嶠總編輯，《國立彰化女中九十週年校慶特刊》（彰化：國立彰化女子高級中學，2009年）。
- 沖繩縣人會，《牡丹社遭難民墓碑改修報告書》（出版項不詳）。
- 松崎仁三郎，《嗚呼忠義亭》（高雄：出版者不詳，1935年）。
- 林進發，《臺灣官紳年鑑》（臺北：民衆公論社，1932年）。
- 金高佐平，《大臺北民間職業別職員錄》（臺北：臺北民間職業別職員錄發行所，1935年3月）。
- 姚聰榮主編，《淡江中學校史》，（臺北：臺北縣私立淡江中學，1997年）。
- 洪郁如著，吳佩珍、吳亦昕譯，《近代台灣女性史：日治時期新女性的誕生》（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7年6月）。
- 紀展南，《小城故事：阿猴屏東》（臺南：詠采文化藝術基金會，2011年）。
- 香川縣人會，《臺灣在住香川縣人名簿》（臺北：香川縣人會，1936年4月）。
- 素水生，〈高雄中學校の懷古〉，《高雄州時報》，30期（1933年）。
- 高雄州，《昭和六年高雄州管内概況及事務概要》（高雄：高雄州，出版年不詳）。
- 許雪姬、吳美慧，《一輩子針線・一甲子教學：施素筠女士訪問紀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14年）。
- 許聖迪，《帝國最南—高雄高等女學校》（高雄：行政法人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2017年）。
- 陳金興，《台灣另類牧師、醫師：謝緯》（臺北：草根出版，2010年）。
- 陳麗華，《族群與國家：六堆客家認同的形成（1683-1973）》（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5年11月）。
- 游鑑明，《日本殖民下的她們》（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2022

年)。

著者不詳《昭和十三年度高雄州立屏東農業學校一覽表(昭和十三年四月末日現在)》(出版項不詳)。

間宮定吉，《臺灣改姓名の相談 改姓名に伴ふ 名義書換書式》(臺南：南方堂，1941)。

楊應財總主筆，《佳冬鄉情》(佳冬：佳冬鄉公所，1997年)。

福岡縣人會，《昭和十二年三月一日現在 臺灣在住 福岡縣人會》(臺北：福岡縣人會，出版年不詳)。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屏東縣鄉土史料》(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6年)。

臺灣教育會，《臺灣學事法規》(臺北：帝國地方行政學會，出版年不詳)。

臺灣新民報社，《臺灣人士鑑》1934年版(臺北：臺灣新民報社，1934年)。

臺灣新民報社，《臺灣人士鑑》1937年版(臺北：臺灣新民報社，1937年)。

臺灣總督官房臨時國勢調查部，《昭和五年國勢調查結果中間報(高雄州屏東郡)》(臺北：臺灣總督官房臨時國勢調查部，1933年)。

臺灣總督府內務局文教課，《臺灣總督府學事第二十一一年報》(臺北：臺灣總督府內務局文教課，1925年3月)。

臺灣總督府內務局文教課，《臺灣總督府學事第二十二年報》(臺北：臺灣總督府內務局文教課，1926年2月)。

臺灣總督府內務局學務課，《臺灣總督府學事第十七年報統計書》(臺北：臺灣總督府內務局學務課，1934年5月)。

臺灣總督府內務局學務課，《臺灣總督府學事第十八年報統計書》(臺北：臺灣總督府內務局學務課，1921年7月)。

臺灣總督府文教局，《臺灣總督府學事第二十四年報》(臺北：臺灣總督府文教局，1927年10月)。

臺灣總督府文教局，《臺灣總督府學事第三十一年報》(臺北：臺灣總督府文教局，1934年5月)。

臺灣總督府熱帶特用樹種栽培事務所，《臺灣總督府熱帶特用樹種栽培事務所事業概況書》昭和十五年版(屏東：臺灣總督府熱帶特用樹種栽培事務所，1940年)。

編者不詳，《南部臺灣紳士錄》(臺南：株式會社臺南新報社，1907年)。

編者不詳，《南薰集》（出版地不詳：出版者不詳，1934 年）。

蔡蔚群，《追尋北一：台北第一高女的光與影》（臺北：蔚城，2025 年 4 月）。

賴淑娟、張美鳳訪問，《宜蘭女聲：阿媽的故事【教育篇】》（宜蘭：宜蘭縣縣史館，2014 年）。

鍾清漢，《日本植民地下における台湾教育史》（東京：多賀出版，1993 年）。

藍孟德，《空靈跫音：藍家里港大厝內滄桑三百年》（屏東：屏東縣藍氏宗親會，2013 年）。

蘇全福，《屏東市人物傳略》（屏東：錦繡中華企業社，2015 年）。

蘇全福，《屏東縣鄉賢傳略（增訂本）》（屏東：錦繡中華企業社，2000 年）。

蘇全福，《屏東縣萬丹鄉人物傳略》（屏東：錦繡中華企業社，2019 年）。

鷹取田一郎，《臺灣列紳傳》（臺北：臺灣總督府，1916 年）。

二、期刊論文

黃啟木，〈台灣の結婚種々相〉，《臺灣公論》第 7 卷第 8 號（1942 年 8 月），頁 52-54。

黃文榮、蘇佩儀、葉羿姝、何明明、吳宛蓁、黃巧蓓，〈戰後嘉義女中的發展（1945~1974）〉，《嘉義市文獻》，24 期（2016 年 3 月），頁 195-219。

黃文榮，〈日治時代嘉義高等女學校初探〉，《嘉義市文獻》，21 期（2012 年 7 月），頁 33-70。

許聖迪，〈老照片看地景—日本時代高雄州立高雄高等女學校的校園景觀〉，《高雄文獻》，2 卷 4 期（2012 年 12 月），頁 145-153。

許聖迪，〈從哈瑪星到苓雅寮：高雄高等女學校校地變遷與寄宿舍〉，《高雄文獻》，6 卷 3 期（2016 年 12 月），頁 39-59。

許佩賢，〈從學籍簿看日治末期公學校女生的學習狀況—以新竹公學校 1942 年學籍簿為中心〉，廖志堅總編輯，《從清代到當代：新竹 300 年文獻特輯》（新竹：新竹市文化局，2018 年），頁 146-164。

金湘斌、張文威，〈天然足世代的興起：臺灣女子體育運動的歷史新頁（1915~1928 年）〉，《體育學報》50 卷 4 期（2017 年 12 月），頁 469-486。

栗原純，〈台湾における戸籍制度〉，《中国研究月報》第 60 卷第 11 號（2006 年 11 月），頁 47-49。

洪郁如，〈臺北女子高等學院〉，《臺灣學通訊》第 94 期（2016 年 7 月），頁 18-

19。

作者不詳，〈高雄噂の噂〉，《實業之臺灣》，13 卷 8 期（1921 年 8 月），頁 34。

徐瑋瑩，〈舞蹈、社會階層與文化資本：臺灣舞蹈藝術拓荒者在日治時期的養成教育〉，《臺灣舞蹈研究》8（2013 年），頁 165-193。

新田太郎，〈謝狀〉，《臺灣愛國婦人新報》87 號（1937 年 1 月），頁 13。

川上蒼村，〈面白き二州の對比 臺南州=高雄州〉，《實業之臺灣》，12 卷 10 號（1920 年 10 月），頁 52-56。

瀧澤佳奈枝，〈植民地期臺灣における「女性像」の形成—第三高等女学校における技芸教育からの一考察〉，《臺灣教育史研究會通訊》，30 號（2003 年 12 月），頁 2-9。

瀧澤佳奈枝，〈植民地臺灣における技芸教育—臺北第三高等女学校を中心に〉，《臺灣教育史研究會通訊》，40 號（2005 年 9 月），頁 20-27。

卓姿均，〈日治時期臺灣高等女學校之設置〉，《臺北文獻（直字）》，204 期（2018 年 6 月），頁 103-145。

著者不詳，〈州治概況並預算大要說明〉，《高雄州時報》，23 號（1932 年），頁 2-22。

張至琦、向薇潔、呂明秀，〈日本時代的淡水中學校與淡水高等女學校—純德女籃發展之歷史〉，《高應科大體育》，4 期（2005 年 9 月），頁 36-53。

陳建森，〈臺東高女三女將與臺東女子軟式網球運動(1940~1961)〉，《臺東大學體育學報》，16 期（2012 年 6 月），頁 21-38。

陳秋坤等著，《重修屏東縣志》（屏東：屏東縣政府，2014 年）。

津田勤子，〈一位「新女性」的梦想與糾葛—以三高女校友陳勤的生命故事與文藝作品為中心(1922~2017)〉，《臺北文獻（直字）》，204 期（2018 年 6 月），頁 147-185。

富島元治，〈所感〉，《實業之臺灣》，13 卷 6 號（1921 年 6 月），頁 12-13。

李昭容，〈彰化高女：日治時期中臺灣臺籍女性菁英的搖籃(1919~1945)〉，《臺灣文獻》，72 卷 3 期（2021 年 9 月），頁 193-236。

林玟君，〈日治時期的臺灣高等女學校學生與臨海教育〉，《師大臺灣史學報》，11 期（2018 年 12 月），頁 55-97。

林初梅，〈臺灣鄉土教育思潮中的「日本」：鄉土教材及教科書如何詮釋「日本統治下的臺灣」？〉，《臺灣學誌》，2 期（2010 年 10 月），頁 107-125。

游鑑明，〈日據時期公學校女教師的搖籃：臺北第三高等女學校〉，《臺灣光復初期歷史》（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1993 年 11 月），頁 365-435。

蔡元隆、陳佳慧，〈日治時期嘉義中學校與嘉義高等女學校校歌、校徽的符號意象及其教育意涵之分析〉，《新生學報》，24 期（2022 年 3 月），頁 93-110。

蔡蕙頻，〈美麗的力量：從日治時期高雄地區婦人組織探討婦女社交場域之生成與統合〉，《高雄文獻》第 11 卷第 2 期（2021 年 12 月），頁 41-78。

三、報紙報導

不撰著者，〈高雄州管内の旺盛なる向學心 現在中等學校に在學せる者 四百五十名の多きに達す 先づ中學校を急施せふ〉，《臺灣日日新報》，1920 年 12 月 8 日，日刊 4 版。

不撰著者，〈損害四萬圓中學豫定の屏東元郡役所焼く 六百坪の建物烏有に歸し 蕃人一名危篤、傷者四名 蕃公が臺灣酒を酌んだのが原因〉，《臺灣日日新報》，1921 年 10 月 19 日，日刊 7 版。

不撰著人，〈阿緱通信／市場之改築〉，《臺灣日日新報》1905 年 8 月 26 日，日刊 4 版。

不撰著者，〈臺南高女問題 南部請願者之困惑〉，《臺灣日日新報》，1917 年 2 月 4 日，日刊 5 版。

不撰著者，〈臺南高女試験 應募者百五十名〉，《臺灣日日新報》，1917 年 5 月 6 日，日刊 7 版。

不撰著者，〈請設女學將為陳情〉，《臺灣日日新報》，1918 年 7 月 2 日，日刊 5 版。

不撰著者，〈高雄と中等學校 初年度經費四十五萬圓〉，《臺灣日日新報》，1921 年 6 月 24 日，日刊 1 版。

不撰著者，〈前途に曙光を認めた高雄州の中等學校 校舍は新に建築か〉，《臺灣日日新報》，1921 年 9 月 8 日，日刊 4 版。

不撰著者，〈高雄中學新建地〉，《臺灣日日新報》，1921 年 10 月 31 日，日刊 5 版。

不撰著者，〈中學設立期成運動 建設費は負擔すると屏東有志者の陳情〉，《臺

《臺灣日日新報》，1921 年 11 月 3 日，日刊 7 版。

不撰著者，〈高雄の高女 新設は可能〉，《臺灣日日新報》，1923 年 8 月 21 日，日刊 2 版。

不撰著者，〈新設の中等學校 豫備金の責任支出で 新學期から開校すべく奔走中〉，《臺南新報》，1924 年 3 月 4 日，日刊 2 版。

不撰著者，〈屏東特訊／吳氏歸省〉，《臺灣日日新報》1925 年 7 月 21 日，夕刊 4 版。

不撰著者，〈屏東商工會 臨時總會〉，《臺灣日日新報》，1927 年 4 月 27 日，夕刊 4 版。

不撰著者，〈屏東運動設置中等學校〉，《臺灣日日新報》，1927 年 5 月 3 日，日刊 4 版。

不撰著者，〈州立屏東農學校 來る十日開校式舉行 屏東街の祝賀準備〉，《臺灣日日新報》，1927 年 9 月 5 日，夕刊 2 版。

不撰著者，〈屏東街出身者。臺灣總督府技師汕頭博愛會醫院外科醫長從七位醫學士吳克己氏〉，《臺灣日日新報》1929 年 3 月 15 日，夕刊 4 版。

不撰著人，〈屏東街出身者〉，《臺灣日日新報》1929 年 3 月 15 日，夕刊 4 版。

不撰著者，〈屏東街に 女學校新設運動 地方の結束如何に依り或は實現に至らむ〉，《臺南新報》，1930 年 5 月 20 日，夕刊 1 版。

不撰著者，〈屏東街新設 女學校運動 視地方結束如何 或能至其實現〉，《臺南新報》，1930 年 5 月 21 日，夕刊 4 版。

不撰著者，〈屏東地方民の女學校設置運動 隣接各街庄の賛同を得て 近く陳述に著手〉，《臺灣日日新報》，1931 年 4 月 2 日，日刊 5 版。

不撰著者，〈屏東運動設女學校 向知事陳情〉，《臺灣日日新報》，1931 年 4 月 17 日，日刊 4 版。

不撰著者，〈屏東女學校の設置運動 三郡下代表より 請願書を提出〉，《臺灣日日新報》，1931 年 6 月 20 日，日刊 5 版。

不撰著者，〈屏東女學校設置運動〉，《臺灣日日新報》，1931 年 6 月 21 日，日刊 4 版。

不撰著者，〈屏東の女學校設置請願問題〉，《臺灣日日新報》，1931 年 6 月 26 日，日刊 5 版。

不撰著者，〈屏東街代表出北 向關係當局陳情 新設女學校、設置法院支部、

下淡水溪架橋問題》，《臺灣日日新報》，1931年7月30日，夕刊4版。

不撰著者，〈高雄州の 發展策を説く 臺北州知事に 榮轉した平山氏〉，《臺灣日日新報》，1931年9月12日，日刊2版。

不撰著者，〈來年度の督府預算 一億臺を割るは明か 行財政整理により 千五六百萬圓見當を捻出〉，《臺灣日日新報》，1931年10月2日，日刊2版。

不撰著者，〈屏東高女 本年難設 或計上次年度〉，《臺灣日日新報》，1931年10月12日，日刊8版。

不撰著者，〈屏東女學校七年度或得成〉，《臺灣日日新報》，1931年10月28日，日刊8版。

不撰著者，〈高雄州七年度預算查定終了す 決定總額は六年度並か〉，《臺灣日日新報》，1931年11月17日，日刊3版。

不撰著者，〈屏東に女學校新設 來年度州預算に計上決定〉，《臺灣日日新報》，1931年11月27日，日刊3版。

不撰著者，〈臺灣預算有利進行 政局已無可慮 太田總督談〉，《臺灣日日新報》，1931年11月27日，夕刊4版。

不撰著者，〈いよく開設の屏東高等女學校 經費其他の打合へせのため 協議會を開く〉，《臺灣日日新報》，1931年11月28日，日刊3版。

不撰著者，〈屏東協議會 謝當局設高女 議案無異議可決〉，《臺灣日日新報》，1931年12月22日，夕刊4版。

不撰著者，〈高雄設法院女學校 督府計上來年豫算 知事電謝各關係官員〉，《臺灣日日新報》，1931年12月30日，日刊4版。

不撰著者，〈屏東高女 校長決定 大森氏を任命〉，《臺南新報》，1932年6月17日，1版。

不撰著者，〈屏東女學校 開校式と祝賀會 大森初代校長着任〉，《臺南新報》，1932年6月23日，夕刊2版。

不撰著者，〈屏東高等女學校 大森校長既抵在 開校式與祝賀會 定來七月二日舉行〉，《臺南新報》，1932年6月24日，日刊8版。

不撰著者，〈屏東商工會主催 納涼廉賣會 高女開校祝賀のため 豫定より二日間延期〉，《臺南新報》，1932年6月27日，4版。

不撰著者，〈臺灣銀行 幹部異動 二十五日發表〉，《臺灣日日新報》1933年7

月 26 日，日刊 8 版。

不撰著者，〈實際に即た 家事裁縫を教へよ 女學校長會議で 論議の的となる〉，《臺灣日日新報》1934 年 5 月 31 日，夕刊 4 版。

不撰著人，〈屏東自治聯 支部大會 並政談講演〉，《臺灣日日新報》1935 年 11 月 10 日，日刊 8 版。

不撰著人，〈吉野丸遅れて入港〉，《臺灣日日新報》1936 年 8 月 14 日，日刊 11 版。

不撰著者，〈屏東高女 舉卒業式〉，《臺灣日日新報》1937 年 3 月 19 日，日刊 12 版。

不撰著者，〈前途かがやく 若き母巢立つ〉，《臺灣日日新報》1939 年 3 月 14 日，日刊 5 版。

不撰著者，〈屏東高女卒業式〉，《臺灣日日新報》1941 年 3 月 13 日，日刊 4 版。

四、檔案

「高雄州立屏東農業學校設置ノ件（高雄州）」（1928-01-01），〈昭和三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十五年保存第十卷司法文教〉，《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7377006。

「臺灣公立高等女學校ノ名稱、位置、修業年限及設立團體名中追加」（1932-04-19），〈昭和 7 年 4 月臺灣總督府報第 1503 期〉，《臺灣總督府(官)報》，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71031503a001。

「大森丈之助外十三名」（1932-06-19），〈昭和 7 年 6 月臺灣總督府報第 1551 期〉，《臺灣總督府(官)報》，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71031551a004。第 3 頁。

五、學位論文

許峰瑞，〈1922 年至 1945 年臺灣高等女學校圖畫教育研究〉，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藝術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0 年。

陳昱苾，〈蘭陽女中之校史與校友生命史(1938-1968)〉，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2017 年。

游鑑明，〈日據時代臺灣的女子教育〉，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

文，1987 年。

蔡雅薇，〈日治時期臺灣高等女學校的制服〉，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8 年。

蔡蕙頻，〈一九二〇年代前期臺、日人的政治競合關係〉，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博士論文，2014 年。

鄭莘蓓，〈日治時期臺灣女子的中等教育－以臺南高等女學校為例〉，國立嘉義大學應用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22 年。

鍾淑敏，〈日據初期台灣總督府統治權的確立—1895 年～1906 年〉，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89 年 5 月。

瀧澤佳奈枝，〈日治時期臺灣的技藝教育－以臺北第三高等女學校為中心〉，淡江大學日本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 年。

蘇信宇，〈臺灣日治時期中學校與高等女學校建築之研究〉，國立成功大學建築學系碩士論文，2000 年。

蘇嘉惠，〈日治時期臺北州立高等女學校建築初探〉，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建築系碩士論文，2017 年。

六、其他

王瑞瑤，〈用吃愛台灣·人物－89 歲阿嬤訴愛 從道早安開始〉

(<https://reurl.cc/Nx03Zn>)，檢索日期：2025 年 8 月 5 日。

國立屏東女中網站 <https://www.ptgsh.ptc.edu.tw/home>。

曾純純，〈清末到日本時代六堆客家女性社會角色的變遷〉，110 年客家委員會補助研究計畫，計畫編號 HAC-110-IR-0024-02。